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0.1>

9 772096 337193

2019/1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征稿重点

一、参考选题

1. 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建设研究
2. 统一战线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范畴研究
3. 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的多学科阐释研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5. 统一战线与共同体建设研究
6. 统一战线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研究
7. 统一战线与总体国家安全研究
8.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统一战线前瞻研究
9. 新时代提高统一战线质量研究
10.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统一战线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11.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多党合作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12. 统一战线历史/思想史研究
13. 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研究
14. 新时代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典型案例的理论研究
15. 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16. 新时代中国反分裂斗争研究
17. “九合一”选举后的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发展研究
18. 统一战线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19. 对西方有关国家污名化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回应研究
20. 国外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稿件要求

1. 内容要求。导向正确，观点明确，逻辑清晰，论述完整，尤其欢迎学理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原创性、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成果。

2. 规范要求。论文须为原创，反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论文的重合率低于15%，每篇论文参考文献不少于15条，尤其欢迎包含完整精确文献述评的研究成果。

3. 体例要求。论文字数不少于10 000字，体例参照《〈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4. 投稿方式。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邮政编码：400064；通讯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统一战线学研究》开放获取地址：

<http://www.cqztb.gov.cn/portal/list/index/id/56.html>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9 年第 1 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编 委：王英津 冯玉军 朱陆民 齐鹏飞
许建英 严安林 李金河 李春玲
李路路 杨 恕 肖存良 吴志成
邹平学 沈桂萍 宋 俭 张献生
张 峰 陈先才 范柏乃 罗振建
周 勇 周淑真 袁廷华 莫岳云
钱再见 殷啸虎 郭春生 黄天柱
蒋 锐 蒋德海 韩云波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 长：夏晓华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汪守军
编辑部主任：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9年第1期（总第13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3卷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征稿重点

专题：统一战线思想研究

05 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科学指南 / 邱乘光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22 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 吴桂韩

专题：港澳台统战工作研究

32 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与深化路径 / 邹平学 冯泽华

43 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 杨立宪

——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

52 台湾地区2018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之民意解析及启示

/ 严 峻

60 政党建设视角下新党的兴衰历程 / 陈先才 翁明源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中国终身教育学术研究数据库总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基础理论

- 66 统一战线与人的全面发展 / 贺善侃
——关于统一战线功能的哲学反思
- 72 “培根”与“养心”：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研究 / 钱再见

统一战线工作

- 80 将民营企业家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 / 蒋德海
- 88 参政党网络影响力研究：基于796家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数据的
实证分析 / 张天舒 张栩栩 蒋 锐

国际统一战线

- 95 新中国70年对外援助理念的发展、继承与创新 / 屈彩云
- 106 非政府论坛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论析 / 林逢春
——以世界华商大会为例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19 No.1(Sum No.13) Vol.3

- 05 Scientific Guidelines for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_Learn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DI Chengguang
- 22 Major Innov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Theory in the New Era WU Guihan
- 32 Experience, Challenge and Deepening Path of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Macao
ZOU Pingxue&FENG Zehua
- 43 Promoting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on the Basis of Development _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Strategic Thought on Taiwan Strategy YANG Lixian
- 52 Public Opinions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Nine-in-One" Election and "Referendum" in China's Taiwan in
2018 YAN Jun
- 6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y Construction
CHEN Xiancai&WENG Mingyuan
- 66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an _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Fun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HE Shankan
- 72 A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New Era QIAN Zaijian
- 80 Liberate Private Entrepreneurs From Criminal Legal Risks JIANG Dehai
- 88 Research on the Web Influence of the Participating Parties _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796 The
Official WeChat Public Numbe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ZHANG Tianshu&ZHANG Xuxu&JIANG Rui
- 95 The Developmen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Foreign Aid Concep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QU Caiyun
- 106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Diplomacy i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 Non-governmental Forum
_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LIN Fengchun

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科学指南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邸乘光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科学指南。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从根本上说是由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是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需要，是适应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需要。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是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的统一战线；是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的统一战线。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的统战工作方针、构建科学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统战工作法规制度、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落实各领域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统战工作；重要思想；科学指南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05-17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01

作者简介：邸乘光，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上海唯实文化研究所特聘专家，安徽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安徽省宣传文化系统“六个一批”（社科理论类）拔尖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研究”（13BDJ037），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AHSKZX2018D01）

引用格式：邸乘光. 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5-21.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是否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需要巩固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时代课题，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在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新时代为何还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把统一战线奉为“法宝”，并置于“三大法宝”之首。他郑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由革命统一战线发展和转变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又说“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2]，继续强调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3]⁹⁰多年来，统一战线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一些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不那么重视了，工作不那么投入了，甚至在思想上行动上产生了一些不全面甚至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时代统战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居于什么地位、是否还需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科学回答。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2]⁵⁷⁷“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4]“要着力推动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5]

（一）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决定了新时代仍须高度重视统一战线

党的十九大郑重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丝毫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完成，而只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不懈奋斗。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之所以还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从根本上说是由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统一战线是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为共同的政治目的而结成的联盟^[6]。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2] 562}“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2] 556}统一战线工作领域广泛，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大关系”领域。统一战线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就在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是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政治优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继续解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2]

（二）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需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新时代要有新目标，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即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即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推进伟大事业，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是我们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基本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在序言中明确规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又是我们国家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同时也是全国人民在新时代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发展实际出发，提出和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8]。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形成共识、凝聚人心，而且需要集中智慧、汇聚力量。

统一战线历来是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服务的。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国上下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合力。这就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调动起来，步调一致、齐心协力开拓前进。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应该也完全能够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作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具体分析指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8] 304}因此，“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 70}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三）适应我国发展内外环境深刻变化需要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9]；从内部环境来看，“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10]。这些既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同时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内外环境。特别是“三个更加多样”的内部环境，更是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变化、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变化，使统战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

首先是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所有制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模式，形成和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方针。“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2 700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 500 万户，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11]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成为日益庞大、

日益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从总体上说，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自身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不断增强。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四个自信”方面存在信念动摇、信任下降、信心减弱、信誉降低的问题，需要积极引导和化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严肃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促进“两个健康”方面责任重大。要做好新时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工作，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促进“两个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

其次是社会阶层更加多样。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业态以及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社会基层人士）大量出现，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四个群体。根据中央统战部调研数据，2016 年底，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 7 200 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比为 95.5%，约 6 900 万人^[12]。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科技发展，新业态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涵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充，数量也将持续增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团结凝聚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 12 类统战工作对象^①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不仅提到“新的社会阶层”，强调“要注重各类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而且还专门就如何做好“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等专业人士”“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群体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新时代，要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充分发挥他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

再次是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进入 21 世纪，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意识形态工作面临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问题上，一些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时有出现。同时，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放大了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面临种种挑战。统一战线领域大家多、专家多、名家多，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方面肩负重要责任。统一战线成员与社会各方面成员的思想是相互影响的，很多党外代表人士起着“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如果他们的思想出了问题，不仅会动摇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而且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13]。因此，要高度重视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引导工作，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不断增进共识，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也给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战工作面临许多新形势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客观

① 《条例》规定的 12 类统战工作对象包括：1. 民主党派成员，2. 无党派人士，3. 党外知识分子，4. 少数民族人士，5. 宗教界人士，6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7.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8. 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9. 香港同胞、澳门同胞，10. 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11. 华侨、归侨及侨眷，12. 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

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如何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扩大团结面,凝聚正能量,是必须回答好的一个重大课题。”^[10]这一重大课题的原则性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必须紧紧围绕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适应新时代我国发展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

二、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在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凝心聚力,就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这不仅决定了新时代是否需要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而且也决定了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一) 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

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既定发展战略及其在 21 世纪的具体实施情况,正式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4]。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称为“中国梦”,同时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提,作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他明确指出:“这一目标,既是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也把每个人、每个家庭、各方面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结合起来了。”“这是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15]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当然也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不仅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之奋斗,而且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就是要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凝心聚力。

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影响和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部构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的使命任务,必然赋予新时代统一战线性质新的内涵,并引起其内部构成发生相应变化。众所周知,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党的目标任务和党对统一战线的要求不同,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是不同的,从而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部构成也不完全一样。总的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结成的统一战线,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广泛的阶级联盟。就其性质来说,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或革命统一战线。就其内部构成来说,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4 个阶级的联盟。当然,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由于革命形势和具体任务的变化,统一战线的性质及内部构成也不完全一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任务的变化,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我国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统一战线成为政治联盟,其性质则为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阶级关系状况的重大变化,提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报告

明确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6]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16] 890}这表明，进入21世纪，我们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内部构成又由原来“三者”联盟演变为包括“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内的“四者”联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为此进行新的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其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部构成也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条例》明确规定：统一战线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2] 539}。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也载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7]。这表明，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已由“四者联盟”扩展为“五者联盟”，而且已经发展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鲜明旗帜，赋予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性质新的内涵。

（二）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的统一战线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不仅影响和决定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性质和内部结构，而且也影响和决定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作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新时代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也是新时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在逻辑就是：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为“引领”（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双轮”或“两翼”（根本动力和法治保障），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关键”（政治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逐步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而且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重申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出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总要求，以保证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十分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把一切力量都凝聚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懈奋斗。”^[18]在新时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新时代所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其在功能作用上的新要求，就是必须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统一战线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直接地联系起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统一战线“要着力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8] 24}。此后，他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研究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19]。因此，从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作用上说，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就是能够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的统一战线。

（三）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作用，是通过积极的统战工作、全面落实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来发挥和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这些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20]《条例》明确规定：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2] 540}。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和《条例》这一明确规定，既是对新时代统战工作主要任务的科学概括，也是对新时代统一战线提出的目标要求。

首先，要能够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需要最大限度地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出来。统一战线要肩负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的使命任务，首先必须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的关系，确保统一战线自身保持一个良好的局面。具体地说，就是要能够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落实“三个服务”任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的先决条件。因此，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首先是能够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地方的统一战线。

其次，要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根本的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落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使命任务，也必须落实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自身的优势，把统一战线各界智力凝聚起来、创造活力激发出来，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调动起来，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助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应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功能和优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统一战线，即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战线。

再次，要能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新时代统一战线作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既包括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全体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也包括大陆范围外以爱国、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政治基础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巩固和发展这样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优势，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应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功能和优势，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的统一战线，即能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统一战线。

复次，要能够促进祖国统一。香港、澳门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目前还没有与大陆实现统一。因此，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包括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仅要以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基础和保障，而且也需要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携手努力。巩固和发展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新时代统一战线，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和优势，有利于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

展的统一战线，应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功能和优势，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服务的统一战线，即能够促进祖国统一的统一战线。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还从各个方面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基本特征。一是范围更加广泛。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通过最广泛联盟的建立，扩大朋友圈，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变化的实际，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纳入统一战线，使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更加广泛。二是视野更加宽广。新时代统一战线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大陆范围内以社会主义为思想政治基础的联盟、大陆范围外以爱国主义为思想政治基础的联盟，而且还应建立和巩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纽带的国际统一战线，包括“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8] 542}。三是关系更加和谐。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谐是整个社会团结和谐的重要基础。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一些矛盾和问题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到统一战线“五大关系”之中。新时代统一战线将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四是工作更加包容。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又“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2] 562}。他特别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要发扬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优良传统，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不断增进思想共识、加强合作共事。要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能容人之短、容人之失、容人之异，善于求同存异、求同化异。这些既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基本特征，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目标要求。新时代需要巩固和发展的统一战线，就是范围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宽广、关系更加和谐、工作更加包容的统一战线。

三、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一战线这个法宝非但不能削弱或弃置，而且还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深刻的回答。

（一）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首要的一条。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统战工作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8] 303}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

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求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真正把统战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考核内容，纳入宣传工作计划，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明确党的领导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明确，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8] 303}同时，还要注意把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与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统一起来，既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在过程中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8] 303}要改变“不会领导”的问题，特别是要注意克服“不重视思想政治引导，对党外人士思想活动不关注”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盛气凌人，要党外人士绝对服从自己，甚至把民主党派组织当成下属单位，对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包办代替”这两种影响统一战线健康发展的现象。

加强和改善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做好统战工作的能力。统战干部不仅要发扬优良作风，做到诚恳谦和、平等待人、廉洁奉公，真正赢得党外人士尊重和认同；而且要深入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精通统一战线历史，做到心明眼亮，同时还要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努力成为行家里手。

（二）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

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和永恒主题。要做好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4]。在我国，人民政协是最主要的统一战线组织。大团结大联合作为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人民政协要坚持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2] 68}。

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肩负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的使命任务，团结的面宜宽不宜窄，团结的人宜多不宜少，团结的程度宜深不宜浅。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必须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发展成为“五者”构成的广泛联盟。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就要照顾同盟者利益，关注统一战线成员思想和精神需求，求同存异、增强包容性，为扩大共识创造条件。要积极为党外人士发挥作用搭建舞台，做到用好一个人、赢得一片人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力量会不断出现，团结联合的工作永远在路上。要把新的社会群体及时纳入工作视野，拓宽团结联合的覆盖面，不断把各种力量聚拢到党的周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三）坚持正确的统战工作方针

统一战线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结成的政治联盟，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多样性。如果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多样性，那就没有必要搞统一战线了；如果只有多样性而没有一致性，统一战线也就建立不起来。正所谓“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统一战线本身固有的特性。当然，统一战线的这种一致性和多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虽会有所不同，但却是始终存在的。在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过于追求一致性，或者过于放任多样性，结果都会动摇统一战线的

基础，危害统一战线。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8〕303}《条例》进一步将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确立为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这是对统一战线 90 多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为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基本遵循。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关键在于坚持求同存异。”^{〔8〕304}求同，就是要不断增进一致性，“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8〕304}。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要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引领，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形成致力于实现共同奋斗目标的强大合力。存异，就是要尽可能地包容多样性，团结更多的统一战线成员。统一战线内不同社会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统一战线要在坚持一致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8〕304}，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当然，包容多样性也是有政治底线的。这个政治底线就是不能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8〕304}他还把统一战线比喻为以一致性为圆心、以多样性为半径的圆：“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8〕304}只有牢牢把握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才能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四）构建科学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统一战线面广、线多、人众、事杂，单靠统战部门一家的力量肯定是难以做好工作的。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统一战线不统一”、统一战线各领域各自为政的现象，以及新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思路和要求。他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20〕}。在这个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政策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统战部作为党委主管统战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党委统战工作的参谋机构、组织协调机构、具体执行机构、督促检查机构，担负着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重要职能，在实际工作中不仅要多给党委出主意，而且要加强同其他部门和方面的联系沟通，更好发挥参谋、组织、协调、督促的作用。各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增强统战意识，搞好分工协作。

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既是提高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统一战线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和工作机制。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和社会性特征日趋明显，许多具体工作艰巨而复杂。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党进一步推进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建设和完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思路和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优化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机关党建、教育培训等部门职责配置，加强归口协调职能，

统筹本系统本领域工作”^[21]；实行“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宗教工作”“统一管理侨务工作”^[22]。这既是加强党对统战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也将进一步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强大合力。

（五）完善统战工作法规制度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加大法规制度建设力度，完善统战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在规范和协调政党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20]。在规范和协调民族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10] 150-151}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10] 154}。民委委员制度在民族工作方面起到了联席会议的作用，要坚持好、健全好。地区和部门间的民族工作协作机制也要强化起来。在规范和协调宗教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10] 164}“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10] 170}在规范和协调阶层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阶层关系协调，“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3]。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3] 97}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而更加有利于促进阶层关系的和谐。在规范和协调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尊重宪法以及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4]。“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利益。”^[24]做好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切实维护台胞合法权益”^[25]，“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2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从理论上强调完善统战工作法规制度，而且在实践上积极推进统战工作法规制度建设，先后颁布或修订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法规。比如，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条例》（2015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5年），关于促进群团工作健康发展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2015年），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6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2017年），关于做好宗教工作、推进宗教事务管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宗教工作的意见》(2016年)和《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2017年修订、2018年2月起施行),等等。这些党内法规制度(含政策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实施,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六) 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做好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必须重视方式方法,创新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不仅从总体上要求新时代统战工作要讲究方法,而且还多角度、多方面地提出和阐明了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

首先,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科学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是做不好的。”^{[10] 139}统战工作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要做好这项工作,自然也就需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做好统战工作所需要的“很强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其中就包含着“掌握统战工作的个中门道”、善于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

其次,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特殊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2] 561}统战工作不仅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既要做好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又要靠政策来调节各种关系、解决各种问题,而且工作对象具有一定特殊性,需要“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做统战工作,要会跟党外人士谈心交心。不能官腔十足,照本宣科,说完就走人,要少些程式化,多些人情味,让党外人士感觉自己不是外人。要根据不同的统战对象,“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方式方法”^{[10] 135}。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提到:“值得重视的是,当前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群体,但不少还没有纳入我们的工作视野,牵不上线,对不上话,做不进工作。”^{[2] 561}如何与这些新群体牵上线、对上话、做进去工作,这也需要特殊的方式方法。

再次,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需要创新和改进方法。在谈到人民政协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联系群众能力,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畅通和拓宽各界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2] 71}在谈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他又强调:“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这样才能把党外知识分子这个阵地守好。”^{[10] 134}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做统战工作要善于联谊交友。这是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他明确指出:“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党政领导干部、统战干部要掌握这个方式。”^{[8] 304}统战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交朋友的面要广,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要想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8] 305}。

(七) 落实各领域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政策性强,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很多都要靠政策来调节。”^{[2] 560}同时,他还列举了“有的同志不学习、不熟悉统战政策,遇到问题荒腔走板、动作变形”的现象并提出了批评。这实际上也就提出了贯彻落实各领域、各方面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要求。

关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

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此，要“完善工作机制，搭建更多平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2] 70}。同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20]

关于少数民族人士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0] 150}。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坚持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讲政治原则、讲政策策略、讲法治规范。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少数民族代表人士，有的是历史形成的，有的是时势造就的，在群众中影响大，一定要团结在我们身边，做到政治上尊重、工作上关心、生活上关照，发挥好他们咨政建言、协调关系、引导群众、化解矛盾的作用。”^{[10] 158}

关于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宗教工作的本质就是群众工作。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护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政教分离，防范外国势力干预和支配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10] 172}“要努力培养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的积极作用。”^{[10] 165}

关于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必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10] 133}当前，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内部构成更加多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多是知识分子。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7]对广大知识分子，重要的是团结，同时要加强引导，特别是加强政治引导和政治吸纳，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28]。

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8] 363}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要对有贡献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适当政治安排，坚持标准、严格程序、认真考察，做好综合评价，真正把那些思想政治强、行业代表性强、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推荐出来。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4]。

关于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留学人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生力量。“留学人员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要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10] 135}党和国家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健全工作机制，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搭建创新平台，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23] 61}。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要发挥群众性、高知性、统战性的特点和优势，做好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把广大留学人员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

关于港澳台同胞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4]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扩大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亲情福祉，在新时代携手同心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篇章。”^[29]

关于侨胞和归侨侨眷统战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广大海外侨胞一定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10] 125-126}“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10] 143}要加强

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和支持祖（籍）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6．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6．
-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3．
-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 [5]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N]．人民日报，2015-02-13（1）．
- [6] 邸乘光．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历史考察[J]．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2（2）：48-57．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N]．人民日报，2018-03-22（1）．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7．
- [9] 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4-06-04（2）．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8．
- [11]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N]．人民日报，2018-11-02（2）．
- [12] 王海磐．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 200万人[N]．光明日报，2017-01-06（1）．
- [13] 张裔炯．新形势下发展统一战线的根本遵循[N]．人民日报，2015-09-05（1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
- [15]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 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07-09（1）．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12．
- [17]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年10月24日通过）[N]．人民日报，2017-10-29（1）．
- [18] 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26日）[N]．人民日报，2016-04-30（2）．
- [19]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64．
- [20]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21]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8-03-05（1）．
- [22]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N]．人民日报，2018-03-22（1）．
- [2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96．
- [24]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N]．人民日报，2014-11-10（3）．
- [25] 习近平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7-05-25（1）．
- [26]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7-02-18（1）．
- [27]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强调 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N]．人民日报，2017-03-04（1）．
- [28]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当代党员，2018（19）：4-11．
- [29] 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N]．人民日报，2018-07-14（1）．

责任编辑：林华山

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吴桂韩

（中共中央统战部 研究室，北京 1008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性、独特创造性、深远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国情和重要优势，深刻阐明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深刻阐明了民族工作关乎大局的重要思想，科学提出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新论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课题，科学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进步的新任务新要求，突出强调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要求，突出强调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突出强调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重要要求。

关键词：统一战线；民族工作；民族理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05-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完善发展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战略和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开拓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更加宽广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基本国情、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顺应人民期待，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以宏阔深远的历史视野、世界眼光、战略视野深刻洞察民族问题，深入研究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对民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科学判断民族工作所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性、独特创造性、深远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方向和道路、理论和政策、制度和法律、工作和实践等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民族工作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特点和规律等的认识。这不仅实现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贡献了最新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而且坚定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引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成为新时代正确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

学术界高度重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李贽、金炳镐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科学、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9.01.002

作者简介：吴桂韩，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处长、副教授，博士。

引用格式：吴桂韩. 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1): 22-31.

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现阶段民族工作的前提、基础、道路、方向、增量、途径、关键等一系列基本问题^[1]。乌小花、郝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包括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财富和优势的理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理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理论、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理论^[2]。周大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述有：中国民族工作成功论、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论、取消民族区域自治说法休矣论、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三交”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唯一途径论、法律面前没有特权论、民族工作久久为功论等^[3]。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创新性和时代性的研究还不充分。笔者从以下八个方面探讨新时代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一、着眼中华民族的悠久发展史和灿烂文明史， 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国情和重要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鲜明指出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明确指出了多民族、多文化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和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等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全党全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和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为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根基。

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祖先自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共同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高度，阐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明确指出我国 56 个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我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入主中原，建立的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承袭中原王朝的正统。这一历史演进的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是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因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的正确民族观。

从中华文明来看，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风俗异同、经济文化水平发展高低，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和优秀成果。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一个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我国多民族、多文化的强大互补性、巨大兼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 56 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各民族之间互济互补、互惠互利日益增强。历史表明，我们伟大的祖国是 56 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 56 个民族共同来开创。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激发中华民族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稳固基石。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各民族自己的梦。

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来看，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大一统

格局成为历史的主流和各民族的共同意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捍卫祖国统一,各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共御外侮,凝结成一个密不可分、休戚与共、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扶持下,策划、制造“西藏独立”、“东突厥斯坦”、伪“满洲国”等分裂行径,中国各民族也进行了坚决斗争。可以说,对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强烈认同和高度自觉,是深深浸入中华民族血脉和灵魂的政治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百经沧桑而不衰、历经磨难而自强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不仅结下了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深厚道义和情感,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更加深入人心、坚如磐石。

站在我国历史发展全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4]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他还回顾了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治理体系,强调了中国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的政治智慧,认为“这种维护一统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深厚历史底蕴的基因传承,也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在机理。

二、着眼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和经验, 深刻阐明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如何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不同国情的国家有不尽相同的治理理念、方略、道路、制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上各种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思想泛滥,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美国种族冲突、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等都与复杂的民族问题有关。随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抬头,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十分复杂。近代以来,在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化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不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而且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道路。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来将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依据各个时期的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关系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意识形态和民族宗教问题等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进而企图达到分化中国的目的。2008 年拉萨“3·14 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7·5 事件”后,有关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苏联模式”的自我贬低之声不胫而走:有的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造成了民族隔阂,提出了全面“去政治化”、讨论“第二代民族政策”;有的主张取消民族身份,通过忽略差异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有的认为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已经过时,鼓吹要搞西方国家那一套民族政策等。彻底清除各种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本清源、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民族工作做得是成功的。他指出:“处理民族问题,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搞西方国家那一套,走的是自己的路。”^[5]我国民族工作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就在于我们找到并坚持了适合我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民族工作做的都是最成功的,没有必要妄自菲薄”^{[5] 55}。在这次会

上，他还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首次进行阐述，为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正确政治方向。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充分彰显了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

三、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刻阐明了民族工作关乎大局的重要思想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始终是涉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全局的大问题，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6]

从区域战略地位看，我国民族地区是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既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又面临发展滞后的特殊劣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集这么多的‘区’于一身，足以说明民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只有了解了这个‘家底’，才能真正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民族工作有多重要，做好民族工作有多不容易。”^[4]此外，他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还指出：“做好新疆工作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必须从战略全局高度，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建久安之势，成长久之治。”^[7]他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8]他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内蒙古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早付诸实施的地方，地处祖国北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内蒙古的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做好了，在全国、在国际上都有积极意义。”^[9]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从新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民族地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的特殊地位，深刻揭示了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特殊意义。

从民族关系重要性看，现阶段，我国民族关系大局是好的，民族团结的基础是稳固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是我国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上蔓延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对我干扰增加；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破坏我国现代化建设、遏制和打断我民族复兴步伐的战略图谋加剧。与此同时，当今中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在内外因素因素影响下，我国民族关系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国内涉民族因素的负面舆情和案（事）件易发多发，“三股势力”及其暴恐活动仍处在活跃高发阶段。历史表明，民族问题有相当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甚至政局的不稳。

从新的时代环境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少数民族有 1 亿多人，处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必须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看到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必须深刻把握民族工作“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正视新情况新挑战，不断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四、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科学提出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新论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课题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总目标，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10]“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4] 152}他还把民族团结提到新的高度，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必须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深刻认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族团结说到底是人人与人的团结，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必须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深刻认识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深刻认识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深刻认识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必须依靠包括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各族人民，不能不加区别地把特定少数民族群众同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划等号，不能采取针对特定少数民族群众的歧视性措施和选择性执法，避免对广大少数民族群众造成感情伤害；深刻认识加强民族团结是一项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的工作，必须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坚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注重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

围绕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课题，强调了增强“五个认同”的现实要求。他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 157}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命题，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治理民族事务的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创新，体现了高度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必须看到，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团结和谐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同时，民族复兴也面临着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严重考验。比如，西方敌对势力大力鼓吹“民族自决”，煽动边疆地区民族分裂，鼓动策援“疆独”“藏独”“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这些分裂势力大都是将其地方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凌驾于国家认同之上。面对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敌对势力越是想借民族、宗教问题做文章，我们就越是要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11]“民族分裂势力越是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我们越要加强民族团结，筑牢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7]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要义是坚持“五个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深刻认识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国家，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共有的大家庭，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

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观念。要既尊重各民族差异性，又增进各民族共同性，把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传承、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创新。要看到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

五、着眼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 科学提出了促进民族地区共同繁荣进步的新任务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性机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备更好的社会条件。党和国家明确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是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民生为首要任务，以脱贫攻坚为重点，以教育、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着力点，以促进市场要素流动与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贯通为途径，把发展落实到解决区域性共同问题、增进群众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上，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地区特点的科学发​​展路子^[12]。

一是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突出强调“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一些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实现与全国同步小康的目标难度较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拉大趋势长期得不到扭转，就会造成心理失衡乃至民族关系、地区关系失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必须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按照中央要求，必须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好中央、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加大各方面支持力度和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集中力量扶贫攻坚，发挥民族地区特殊优势，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

二是紧紧围绕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突出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各族群众过上好日子；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键是帮助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根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完善差别化支持政策，完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加大银行、证券、保险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力度；要支持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投入要向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要多措并举扩大就业，促进农牧民就业和稳定持续增收；要加快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建设交通、水利、信息、能源、科技、环保、防灾减灾等项目；要进一步加强对口支援和帮扶，帮扶资金主要用于民生、用于基层。

三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突出强调要“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法治对民族关系的引领作用，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有不少是由于群众不懂法或者不守法酿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带着‘民族’字样，但不都是民族问题。”

“不能因为当事人身份证上写着‘某某民族’就犯嘀咕、绕着走，处理起来进退失据。”^{[4] 154} 基于此，必须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对极少数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犯罪分子，对搞民族分裂和暴恐活动的犯罪分子，不论什么民族出身、信仰哪种宗教，都要坚决依法打击。

四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斗目标，突出强调“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尊重民族差异、包容文化多样，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去粗取精、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积极做好双语教育、信教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工作；要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水平。

五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奋斗目标，突出强调“继续在民族地区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民族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水系源头区、生态脆弱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这一特点决定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的特殊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要求民族地区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继续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落实好生态补偿机制，率先在民族地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提高持续发展能力；重视利用独特地理风貌和文化特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

六是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强调“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都要搞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如今，我国 2.2 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中近 1.9 万公里在民族地区，138 个边境县（区、市）中 109 个在民族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民族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大后方、边陲、末梢，推向了最前沿、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民族地区将成为支撑和拓展国家发展的新空间，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后发优势的地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最终还是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必须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搞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通过市场机制与沿海地区连接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6]。党和国家大力支持民族地区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在口岸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六、着眼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突出强调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经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不懈探索，最终将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使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构想变成现实。

1945 年 10 月，党中央在《关于内蒙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在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7 年 5 月 1 日，我国建立了第一个相当于省级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内蒙古的成功实践，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正式确认了新中国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我国先后又成立了新疆、广西、宁夏、西藏4个自治区，建立了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实施了覆盖71%的少数民族人口、64%的国土面积的民族区域自治。

作为一项伟大创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是“飞来峰”，而是中华政治文明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民族地区，大都在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治理体制，比如秦汉时期的属邦属国、唐代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等。但这些制度是“老办法”，实质是“怀柔羁縻”，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沿用到民国时已经失效。我们党发明在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充分考虑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构成特点，既继承了“天下一统”“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合理性，又前所未有地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立国根本原则，既体现了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维护，又体现了对各民族多元性的尊重，有利于各族人民把爱祖国与爱家乡、爱中华民族与爱本民族有机结合起来，使各民族凝结成牢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对苏联模式、任何形式民族自决的摒弃。民族区域自治从一开始就是针对联邦制的分裂弊病提出的，后来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从中国实际出发、以苏联为鉴进行反思和超越。1946年2月，党中央明确要求内蒙古工作，根据和平建国纲领中关于民族平等自治的要求，不应提独立自决口号。在起草《共同纲领》和《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一再告诫，苏联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不利于防止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挑拨离间。

环顾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不仅没有给世界提供解决民族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且普遍陷入了“多元主义失败”的困境。一些国家特别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倒使国内民族问题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断言“所有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将步苏联的后尘”。而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经受住了西化、分化的考验，而且还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民族团结，根本在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我们党采取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新办法，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政策创新发展，不是搞民族政策升级换代、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而是要在坚持中创新、在完善中发展；要把《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落实好，加强对规范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在新时代，必须全面贯彻实施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重要法治保障；必须根据实践需要，加强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建设，修订完善有关民族工作的法规条例，完善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具体措施和办法，确保《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必须加强对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依法保护各民族平等权利，坚决依法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七、着眼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空前活跃新趋势， 突出强调了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明确要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3]。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点和规律的新认识，是指引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实践论”和“方法论”。

回顾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实现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在全国 2.45 亿左右流动人口中，有超过 2 000 万是少数民族。其中，到东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经商务工求学，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意味着民族工作在全社会拓展。

必须看到，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互鉴、优势互补。新时代把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重大任务来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繁荣的内在动力和历史大势的深刻把握，对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基本方向和必然趋势的深刻把握。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出发点是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落脚点是既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又要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原则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现阶段，通过交往交流促进交融，不是要取消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更不是要消灭哪个民族，既不能持消极论、无所作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乱作为。

同时，还要看到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由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利益诉求等方面差异，往往容易出现矛盾纠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给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提出新课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城市，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针对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方式和管理体制表现出不适应的问题，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少数民族需求滞后、少数民族遵守城市管理规章的意识需要加强等问题，党和国家强调要以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抓手，把着力点放在社区，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要以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为重点，既不能搞“关门主义”，也不能放任自流，而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要以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为核心，依法管理城市民族事务，引导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

八、着眼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地区繁荣稳定， 突出强调了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的重要要求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是总结民族工作实践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4] 159}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关键是完善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通力合作的民族工作格局，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民族地区要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富裕一方、团结一方、安定一方的坚强战斗堡垒，使每一名党员都成为维护团结稳定、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面旗帜。此外，要坚持好、健全好民委委员制度，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要强化地区和部门间的民族工作协作机制，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干部是重要桥梁和纽带。”^{[4] 160} 实践表明，许多事情由少数民族干部去办，少数民族群众更容易接受；关键时刻由少数民族干部出面，效果会更好。解决现阶段少数民族干部结构不尽合理、政工型干部偏多、专业技能型干部偏少等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大力培养、大胆选拔、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保持干部队伍合理结构。由于民族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把握民族关系、看待民族问题，做到讲政治原则、讲政策策略、讲法治规范。民族地区的好干部要做到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

从现实情况看，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安全十分重要。特别是在与多国接壤、有着较强文化宗教认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形势更为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工作说到底是要做人的工作，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要深入细致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坚决克服和防止简单化、片面化，坚决克服和防止忽左忽右、摇摆不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多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平时多走动、多沟通、多了解信息，发挥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同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统统往民族问题上靠；在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时要看到人民内部、同志之间真正能上升到主义层面的分歧并不多，要防止无限上纲上线，把“两种主义”变成内耗工具；内地维稳工作要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切忌把一个民族整体作为防范对象，切忌采取简单化、伤害民族感情的做法。

参考文献：

- [1] 李赞，金炳镐. 习近平新时期民族工作理论解析 [J]. 青海民族研究，2016（2）：76-80.
- [2] 乌小花，郝因.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解读 [J]. 民族研究，2017（4）：1-10+123.
- [3] 周大鸣. 习近平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研究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9-116.
-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43.
- [5]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53.
- [6]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N]. 人民日报，2014-09-30（1）.
- [7]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 [N]. 人民日报，2014-05-30（1）.
- [8]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N]. 人民日报，2014-08-06（1）.
- [9]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N]. 人民日报，2018-03-06（1）.
- [10] 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N]. 人民日报，2015-10-01（1）.
- [1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9-560.
- [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2014-12-23（1）.
- [1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2017-10-28（1）.

责任编辑：林华山

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与深化路径

邹平学¹ 冯泽华²

(1. 深圳大学 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61;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在“一国两制”实践方面, 澳门与香港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具有自身特色。这表现在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 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地位, 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以及积极推行国民教育等多个方面。新时代, 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国内外激进与分裂势力开始介入澳门治理,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仍需要创造条件, 廉政建设仍需加强, 对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经验的研究不充分等问题。澳门深化“一国两制”实践, 可采取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 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和廉洁政府生成, 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等路径。深化和丰富“一国两制”的澳门实践及其理论, 有利于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方略贡献经验和智慧。

关键词: “一国两制”; 澳门; 宪法; 澳门基本法; 爱国爱澳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9) 01-0032-11

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学界对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及其深化路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澳门基本法研究权威杨允中教授主要从宏观角度诠释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并对澳门在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出了前瞻性的断思^[1]。内地学者齐鹏飞教授回顾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与政治发展大势, 剖析了“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成功运作的奥秘^[2]。青年学者李晓兵认为, 澳门取得巨大成就的经验在于充分发挥高度自治权的优势且履行应尽的宪制责任^[3]。总体而言, 学界多将港澳实践“一国两制”的情况重叠研究, “重港轻澳”的论述现象普遍存在, 专门研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9.01.003

作者简介: 邹平学,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冯泽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港澳基本法实施的相关机制研究”(14ZDC031)

引用格式: 邹平学, 冯泽华. 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挑战与深化路径[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 32-42.

究“一国两制”实践的高水平成果还不多。多数文章普遍出现在澳门回归祖国15年内，且对近几年来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挑战的研究不多。在新时代如何遵循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以及进一步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尚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一员，澳门同样进入了新时代。尽管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经济体量小，资源缺乏，博彩业一家独大的现状至今尚未打破，但澳门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高，法律制度健全，特别是澳门成功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必将发挥独特的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启动，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的正式通车，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更多的资源与更广阔的空间。2019年是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弱冠”之年，总结成功实践经验、探寻基本规律，对保障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尤为重要。澳门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寻找能够推动自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之路。

港澳的“一国两制”实践既表现出共性的特征，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存在少数人士否定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权、迟迟不能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极端本土思潮抬头甚至“港独”言行蔓延、部分人士反对内地与香港互利合作等问题。与之相比，澳门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成绩斐然。澳门于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便顺利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任务，依法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有效地增强澳门同胞爱国爱澳意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有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谱写了“一国两制”澳门实践的华丽篇章。鉴于此，本文拟总结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主要经验及基本规律，阐释影响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问题，展望新时代助推澳门同祖国同发展、共繁荣的深化路径。

一、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一）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

首先，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是协同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的初衷并非在于取消港澳的高度自治权。恰恰相反，全面管治权的作用在于弥补高度自治权发展中的漏洞，发挥全面管治权修改与解释基本法的作用，完善与基本法相关的实施机制，真正保障港澳的繁荣与稳定，助推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局面的生成。澳门全面准确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在维护中央对澳门的全面管治权与发挥自身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上取得很好的平衡。澳门全社会上下一心，在厘清澳门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与定位后，既有力地遏制了激进本土势力挑战中央权威的萌芽，又有效地发挥了作为特别行政区拥有的独特优势，既有序地推进政制体制改革以完善澳门政治制度，又成功地彰显澳门作为中葡文化交流平台的特色，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健康运行。澳门成为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示范性地区。

其次，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地位。澳门自回归祖国以来，一直将宪法和基本法视作自身的宪制基础，并将维护宪法和基本法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法宝。香港候任议员宣誓风波引发诉讼案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第五次释法维护了国家利益与主权统一，防范了“港独”势力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权力系统。中央对《香港基本法》释法的精神并不止于香港，相关的意蕴仍可适用于澳门。有鉴于此，澳门特区按照“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一贯原则，积极落实中央相关精神，将该原则贯

彻于《立法会选举法》中。澳门对《立法会选举法》及时进行修正,符合国家和澳门社会的整体利益。澳门立法会作为澳门唯一的立法机关,关系着所有澳门居民福祉,“爱国爱澳”理应成为议员的首要条件。有关规定对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阻止分裂势力扰乱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把关作用,有助于优化澳门的法治建设,推动澳门政制的进一步发展,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保障澳门繁荣与稳定。

再次,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在香港展开以行政长官普选为内容的政制发展过程中,部分力量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决定权,肆意争取所谓“公民提名”和“普选国际标准”,却选择性地忽视特别行政区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这既不利于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也不利于推动香港与祖国内地和谐关系的建构。毋庸置疑,港澳虽具有高度自治权,但其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并非独立的政治实体,在法理上仍然需要坚持中央的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不同于香港,澳门在平衡国家利益与澳门居民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早已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率先于香港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2018年10月,随着行政法规《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生效,委员会主席、行政长官崔世安随后主持召开首次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统筹及协调澳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工作。为维护社会福祉、公共安全及秩序等重大公共利益,2018年10月18日,澳门立法会全体会议一般性通过《网络安全法》法案。这将有效地构建澳门的网络安全防范管理体系,提升澳门防范和应对网络安全的能力,更好地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和澳门本地社会公共安全,实现《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关于建设“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的发展目标。澳门政府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为香港履行该责任提供了有益启示,如积极明晰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依法有序地推进立法工作,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机制等。实际上,澳门能够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爱国爱澳传统深厚,基本法权威得到维护,认同和接受中央全面管治权,积极与内地建构和谐的互利合作关系,注意发挥爱国爱澳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推动作用。澳门严格履行基本法的宪制责任,有力地保障了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有效地消解了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形成了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局面。

最后,积极推行国民教育。2007年,香港大学民意网站的调查显示:澳门居民^①的国家认同感高于香港居民,澳门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占96.9%,而香港人认同自己为中国人的占91.7%^[4]。2012年,香港青年协会的一份调查报告再次显示: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71.6%被访问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比例自2009年持续下降;而表示对中国人身份感到自豪的受访青年比例,则从2009年的74.6%大幅下降至40.7%^[5]。有报告进一步指出,在2014年,尽管七成香港人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但以香港人身份优先,只有8.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6]。2016年,香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57%受访者对中国有较强的身份认同,其中95%的人都认同香港身份;认同香港身份的学生中,有64%较认同中国身份,有36%则表示不认同^[7]。可见,港澳虽然都回归了,但两地的人心回归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总体上看,长期的殖民统治致使港澳居民的国民意识淡薄,对国家安全更是陌生。但由于两个地区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内地与澳门、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密切程度不同,香港青年与澳门青年的国民意识有所不同。前述诸多调查与实践表明:澳门居民的国民意识明显比香港居民高。这种判断也可从港澳社会运动的频次和影响得到验证。香港自2003年以来

① 本文的“港澳居民”特指“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港澳青年”特指“港澳青年中的中国公民”。

先后爆发了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反国教运动”“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等一系列在规模及暴力化程度上趋于强烈的社会运动，而澳门的社会运动规模小且数量少，影响力有限。深究其原因，其中一点很明显，两地政府对于加强居民国家认同的宣传教育的投入是不一样的。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澳门居民的国民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中大量融入近代以来国家取得卓越成就的内容，使澳门中小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略祖国的辉煌历程。再者，当《国歌法》列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即启动有关《国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2018年8月，澳门立法会一般性通过修改《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法案。该法将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内容，要求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此外，升挂国旗活动也在全澳门学校基本实现全覆盖。然而，香港在本地开展《国歌法》立法的过程并不顺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多向澳门“取经”，积极有序地推行国民教育。

（二）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

首先，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目的。维护澳门繁荣与稳定是《澳门基本法》的立法精神，也是保障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目的。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有效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完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澳门人均GDP排在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仅次于卢森堡、瑞士^[8]。然而，澳门当前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博彩业，发展动力不足，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为此，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澳门重点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力争成为享誉全球的旅游胜地。同时，国家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助力澳门同祖国内地互利合作及同发展、共繁荣。保持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规律之一。

其次，中央的支持以及澳门的能动性发挥，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动力。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成功，与中央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充分发挥能动性密不可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务实施政，积极发展澳门经济，力促社会稳定繁荣，落实了有关惠民政策，保障了广大澳门居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澳门居民的充分肯定。在政制改革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时向中央请求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亦对《澳门基本法》进行了解释，保障了澳门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澳门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发挥独特的制度优势，积极寻找发展机遇，在紧密沿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一正确路线下，与内地尤其是广东建立了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社会民生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在国内乃至海外的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中央的支持下，澳门需要充分发挥能动性，才能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再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前提。《澳门基本法》是保障澳门繁荣稳定、促进澳门迈向腾飞的利器。它在各方的努力下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不仅为谱写“一国两制”亮丽华章提供独特而精辟的路径，也为香港解决类似社会问题提供经验借鉴。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中央充分尊重澳门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尊重澳门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尊重澳门的新闻、言论自由等权利，紧紧依靠爱国爱澳人士，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澳门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充分尊重澳门居民依法表达诉求，确保中央对澳政策有效落地、惠及澳人。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准确贯彻前述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的前提下，成功地实践“一国两制”，助推澳门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可以说，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也是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基本规律。

二、新时代澳门实践“一国两制”面临的挑战

（一）国内外激进与分裂势力开始介入澳门治理

近年来，澳门青年社会运动日益兴起，逐渐渗透至澳门政坛，对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一定的潜在危险。实际上，境外势力干预澳门政制发展的萌芽已经出现，类似香港“泛民主派”性质的“新澳门学社”等团体积极推动澳门“双普选”宣传等工作。据报道，“新澳门学社”的多名成员曾参与“太阳花”“占中”等运动，相关成员还在国际上鼓吹他们在澳门推动“本土化”运动的经验。这令不少澳门市民担忧^[9]。2017 年 9 月，曾多次公开支持“占中”的苏嘉豪当选澳门立法会议员。当时，苏嘉豪年仅 26 岁，是澳门史上最年轻的议员。他的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立法会的面貌，预示澳门政局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苏嘉豪自履职以来，我行我素，多次举行非法集会，宣传与《澳门基本法》不相符合的激进思想。澳门立法会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中止涉嫌非法集会被起诉的苏嘉豪的议员职务^[10]。

澳门青年参与激进社会运动，实质上也与中美关系存在一定的关联。首先，在澳门博彩业中，美资的逐年渗入日益冲击了澳资主导博彩业发展的现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这些资本的渗入，在澳门的政治话语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若澳门话语权不倾向于美资企业的利益，那么，美资自然会通过一些方式蛊惑不明真相的青年在一定范围内扰乱澳门的社会秩序。其次，港台青年受美国一些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资本的支持，逐渐认同所谓的“民主自决”等思想，而港台青年又与澳门青年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在三地青年的日常交往中，澳门青年容易受到这些港台青年不良思想的影响，逐渐对澳门的现状产生微妙的负面认知，从而参与激进社会运动。近些年来，港台社会运动与澳门之间的联动迹象渐趋明显，值得警惕和应对。总体而言，中美关系既合作又对抗，澳门青年问题成为矛盾的一个缩影。这在澳门青年问题中并非主要矛盾，但值得中央和澳门有关部门予以关注，防止其无序演变为类似美国在香港控制青年发展的又一棘手问题。

（二）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仍需要创造条件

澳门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国际自由港，受制于土地面积，不得不长期依赖于博彩业发展经济。也正因如此，澳门的许多产业长期依赖博彩业而发展，无论是商品销售抑或旅游业，均与博彩业脱离不了关系。澳门长期高度依赖博彩业发展经济的局面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扭转，而这种单一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保障经济体获得可持续发展。来澳旅客旅游目的固定化不仅不利于澳门优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更不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政策的有效落实。澳门经济结构的单一不利于青年寻求不同的发展机会，例如部分澳门青年擅长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但澳门这方面的产业比较稀缺。在没有充足的资本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澳门青年往往流向与博彩业有关的岗位。这就容易忽视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潜在人才，对澳门的长远发展是一项重大损失。就业岗位的单一化与澳门青年人才不断涌现间的矛盾是当前澳门需要加快调和的现状。若不能尽快解决这一矛盾，澳门青年可能将通过各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近年来，澳门尽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逐渐走上了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轨道，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目标尚未实现，未来发展任重道远。而且，这种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政治与经济人才供给以及积极有为的创新制度设计。任凭国家如何建构惠澳路径，澳门若缺乏对接的合适路径，则整个国家发展大计不可避免会出现衔接不畅。因此，要拓宽澳门青年的发展道路，大力培养青年政治人才、创业人才，从而保障澳门政局的稳定。总之，澳门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与澳门青年问题的形成具有直接的联系，是澳门青年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成因，中央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必要合力共同解决这一难题。

（三）澳门廉政建设问题

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困扰澳门多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廉政建设。2009年4月，澳门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经澳门终审法院裁定滥用职权、受贿、洗钱、财产申报的虚假声明及财产来源不明等81项罪名成立，判处监禁28年半。2017年7月，澳门前检察长何超明因触犯诈骗、滥用职权、创立犯罪集团等多项罪名被判刑21年等。澳门政坛的腐败问题成为制约廉政建设的“紧箍咒”。澳门民众对腐败问题便颇有怨言，这也成为澳门急需解决的问题。2017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顺应澳门社会发展现状，尤其是吸取腐败案教训，防范立法会选举中出现的腐败问题，特意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增设了保证金制度。该制度旨在提高参选人的公信力，推动立法会选举工作廉洁化、规范化。概言之，新法有助于拆毁贿选空间，清除灰色地带，提升选举质量，夯实法治根基。然而，仅靠法律制度尚不能有效避免实践中公权机关不依法行政和腐败等痼疾，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需要加强法治政府与廉洁政府的建设力度，塑造自身良好形象。

（四）对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经验的研究不充分

相对于《香港基本法》而言，《澳门基本法》的研究成果不多、队伍偏小、影响力不大。部分人倾向于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来评判澳门，而不管是否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由于整体上对《澳门基本法》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理论成果多受《香港基本法》研究的影响，理论思维也只能亦步亦趋，这对澳门的长久发展不利^[11]。“一国两制”作为完成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统合机制，首先针对的是台湾，由于时间节点的机缘巧合而首先适用于香港和澳门。港澳实践“一国两制”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意愿。中央一再强调，“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和保障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12]。这一决断在港澳社会引起较大的共鸣。从社会稳定和国际地位的角度而言，港澳自回归后确实长期保持了繁荣稳定，民众权益得到基本法的有效保障，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尽管香港近年来有扰乱“一国两制”正常运作的各种因素，但它们始终不能成为主流，亦未能根本性改变香港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既然有港澳两座城市同时实践“一国两制”，即不能避免存在比较的空间。一旦出现比较，必然有优劣情况，而这种优劣情况亦直接影响到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正如上文所言，澳门长期以来在“一国两制”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有所“矮化”的，取得的成绩及经验也因为澳门地方狭小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相关研究力量亦随之重香港而轻澳门。正因如此，学界有必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和实施基本法的成功经验给予高度重视，政府也应大力支持学界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实施基本法情况展开研究，同时还要重视对制约澳门长远发展潜在问题和挑战的研究。总之，加强《澳门基本法》研究是保障澳门繁荣稳定的重要议题。澳门有必要系统深化繁荣《澳门基本法》研究的路径。

三、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深化路径

（一）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

在澳门回归前后，中央为了保障澳门平稳过渡而重点对澳门的上层人士和精英开展统战工作，部分中下层人士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得到有效兼顾。20年来，这些统战对象确实有效地保障了澳门繁荣稳定，确保中央治澳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然而，上层人士和精英长期主导澳门政坛，既不利于融入更多的新鲜血液、激活澳门的社会发展动力，也不利于中央在澳门团结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从近年来澳门青年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来看，爱国爱澳青年的人数较少，与澳门“泛民主派”青年

团体的规模形成鲜明反差。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力度欠佳所导致的青黄不接是较为棘手的问题。爱国爱澳力量一直是维护澳门繁荣稳定的中坚力量,在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中央与澳门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培养爱国爱澳青年人才的机制,澳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额又比较少,难以完全兼顾所有爱国爱澳的青年人才。此外,极小部分澳门青年在境外势力的蛊惑下,产生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思想和行为。传统的爱国爱澳力量由于年龄与精力等原因,急需薪火相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既要凝聚已有的爱国爱澳力量,又要加大力度培养新的爱国爱澳力量,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

首先,在文化培育方面,可通过中华文化夏令营、内地学校与澳门学校结为兄弟学校等措施,努力保持新老相接,逐渐促进澳门青年对国情认识良好局面的形成。澳门的中学可与内地的中学建立兄弟学校关系。澳门的中学可定期派出访问团到内地兄弟中学进行交流工作,就国际化教育、合作办学等问题进行磋商。有条件的内地中学也可与澳门的中学合作培养中学生。

其次,在政治培育方面,有两大路径。一方面,中央可在澳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单上纳入更多的中下层青年,激发中下层青年积极拥护中央的热情。具体而言,应由过去重点推荐澳门上层社会人士,逐步转变为适度推荐澳门中下层人士,让更多的澳门中下层人士有机会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实现制度机理上的畅通,初期的推荐范围可包括来内地创业就业、求学具有一定年限的澳门青年,再适时拓宽至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所有澳门青年。国家推荐的方式可包括特聘人大代表、特聘政协委员等方式,也可以鼓励一切爱国爱澳的广大青年踊跃参与人大代表选举活动或自荐为政协委员。另一方面,鼓励澳门居民在内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报考内地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校教师等具有公职人员性质的职业。同时,为了拓展澳门居民在内地的机会,澳门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着手积极就澳门居民报考内地公职人员方面的问题向中央提交提案。当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首次被纳入一些中央决策组织,这为爱国爱澳力量的培养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作为决策机构,可在执行机构中容纳爱国爱澳力量,特别是着重培养新生代的澳门青年。

再次,在军事培育方面,澳门青年服兵役是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链条,也是增强澳门青年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路径^[13]。澳门回归祖国已有20年,青年服兵役的社会基础业已筑牢,若到2047年后再考量宪法义务规范在澳门的衔接问题已为时较晚。目前,建构澳门青年服兵役路径,虽有衔接机制的障碍和人性情感的困窘,但仍是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和机制的重大举措,更是“一国两制”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内地实际上对多数适龄青年服役遵循的是自愿原则,为体现服役群体间的平等性,澳门青年亦可遵循自愿参军的原则。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澳门青年踊跃参军。因此,中央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征询各方意见,打破理论与思想瓶颈,奠定澳门青年服兵役制度构筑的立法根基,从而推动该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增加澳门青年的国民意识,拓宽和稳固澳门爱国统一战线。

(二) 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

近年来,部分澳门青年受到港台激进思想的影响,国家认同感有所下降,个别人通过各种渠道支持“台独”“港独”。这直接折射出维护国家安全不能只靠法律规范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宣传教化增强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感。

首先,强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教育。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纽带,是构成中国人身份的文化根基。培养澳门青少年的民族归属感,中华民族文化的滋养必不可少。澳门要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坚持正本清源、匡正祛邪。开发、设计与运用符合澳门地域特点、文化特

征和思维方式的新载体，避免灌输型的教育，努力做到寓教于无形。一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在澳门各层次学校的教育中深化中国历史教育的普及，弥补澳门青少年对中国历史的缺失，让其更多了解中国历史，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增强其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另一方面，要将学习掌握基本法和国家历史、中华文化的水平作为任用和评价公职人员的重要标准，努力提升澳门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的国家观、大局观和法治观。要坚决纠正一些重要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错误行为。

其次，强化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法治与政治认同教育。法律法规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如若行为跨越法治的边界，则会冲击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要协调好国家利益、区域利益、个人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挖掘民族记忆，增加民族认同感。要在注重法治教育的同时强化政治认同教育。政治认同主要有国家认同、政权认同、主权认同、政策认同，热爱人民、热爱疆土、热爱国旗国歌等。同时，要建设两地青少年的法治交流平台，拓宽交流渠道。例如，建立有关《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探讨的网上交流平台，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开展两地学生定期交流学习，支持两地青年互动，并加强政府层面规范化指引，拓宽交流道路。

（三）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需要重塑自身定位，把握合作时机，积极参与各方合作。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澳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国际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澳门在合作中把握寻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保障繁荣稳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澳门可争取设立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分支机构。当前，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资金平台共有7个：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合作基金和周边友好交流专业基金。多个平台以金融机构的形式在上海设立总部。这不仅依赖于上海的金融实力，还依赖于上海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扩大，类似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也会随之增加。澳门金融业受经济环境的限制，发展一直比较缓慢。与香港相比，澳门金融业的发展长期是一个短板。澳门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抓住“一带一路”设立相关金融机构的时机。在适当之时，澳门可请求中央为兼顾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利用澳门作为中葡交流平台的优势，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类似机构或者分支机构优先在澳门设立。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澳门需要主动出击，增强在建设规划中的话语权，在大湾区中争当重要一极，发出更强的“澳门之声”。具体而言，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心在于经济合作，但世界多个湾区建设的经验一再表明：没有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配套建设，就不可能铸造湾区辉煌。从系统性的角度而言，有些领域尽管表面上不呈现为经济因素，如教育合作，但推进教育合作亦可间接促进经济发展。澳门要争当一极，必然需要与广东、香港加强合作，包括降低相关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主动参与粤港各类合作等。以律师业合作为例，澳门可就粤澳律师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踏出更大的步伐，而非仅呈现出广东律师业的单边开放格局。与此同时，完善区际司法互助机制是一个重要方向。澳门与广东须在司法上做到相互配合、便民高效。在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司法事业的不协调容易增加两地贸易往来的成本，最终有损共同繁荣的进程。因此，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可首先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试点，构筑紧密的区际司法互助机制，特别是在刑事司法互助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治澳工作要勇于正视澳门目前所面临的民生困局。囿于澳门地小人多的现状，澳门居民在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面临困境。解决澳门民生问题是一项重大工程，需要多方持之以恒的沟通

交流。当前，中央可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平台，鼓励澳门居民到内地工作，着重并优先解决澳门居民在内地就业问题，为澳门居民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日后创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中央可大力推动澳门居民在广东置业的政策，让澳门年轻一代有能力购房，促进人心回归。治澳工作需要多方面的交流，涉澳部门需要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定期举办各种座谈会与茶话会，深入了解澳门年轻人对内地的看法或者疑虑，尤其是深入了解澳门年轻人不敢轻易到内地寻求发展的内生障碍。

（四）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和廉洁政府生成

在推进廉政建设方面，澳门可吸取香港和内地近年来防范腐败的宝贵经验。依法行政归根到底即为廉政建设问题。在制定基本法时，澳门效仿香港廉政建设模式，建立廉政公署，向行政长官负责。然而，廉政公署在澳门常遭遇“水土不服”，一些官员间的包庇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澳门有必要从以下两个路径推进廉政建设：

首先，加强公职人员的外部监督尤其是新闻媒体监督力度。澳门相对于香港而言，在新闻媒体监督方面较弱，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效果的评论尚未形成一种“舆论性”监督实效。这是澳门新闻媒体对一些公职人员腐败问题不敢轻易曝光的重要根源。因此，为了加强公职人员的外部监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新闻媒体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力度。同时，要通过一些廉政宣传活动，鼓励澳门居民敢于与腐败行为作斗争，共同建设廉洁澳门。

其次，加强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加强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是防止政府形象恶化的重要防腐剂。尽管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尚未建立有效的公职人员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分离的机制。这导致公职人员的亲朋好友利用影响力进行腐败的行为偶有发生。除了大力支持廉政公署继续依法进行监察外，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所有公权机关内部应加强内部监督，探索公职人员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分离的机制，防止“监守自盗”。

（五）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一国两制”发展至今，挑战甚多，根源在于过度强调基本法上的“两制”，而忽视了宪法和基本法上的“一国”。这些有意割裂的逻辑思维导致高度自治权成为挑战中央全面管治权的“挡箭牌”。宪法作为统合内地与澳门的共同宪制基础，用宪法思维深化澳门与内地的互利合作成为合宪性审查时代下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法宝。

首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查特别行政区法律是否符合宪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从宪法原理的角度而言，“一国两制”的实施绝非为了区隔内地与澳门，更多的是为了两地的融合。因为澳门回归祖国前，内地与澳门事实上即为“一国两制”。澳门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与其他制度隔离。比如，双方均实行市场经济，这就可在经济制度上相互融合，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内地单方面的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而澳门相应行业尚未对门槛进行对等降低。单边的合作注定整体的效益不高，甚至容易引起一方公共资源的流失，从而引起一方居民的不满。中央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推动香港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新平台，即意味着两地需要高度融合，包括法律制度、发展理念方面的融合。因此，探讨澳门与内地的融合问题，应该更多地采用宪法思维，尽可能从主权国家的立场去寻找澳门与内地在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在备案审查机制上以宪法秩序统合内地与澳门生产要素的高速流通，助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方面，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先行在法规备案审查工作中统率广东统一市场要素，逐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为广东与澳门合作奠定经济一体化的根基。另一方面，鉴于宪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探索运用宪法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法

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消除澳门与广东隔离的因素,打通澳门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法制通道。

其次,建立由中央主导的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澳门回归祖国至今仍未建立由中央主导的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澳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司法机关自行对违反基本法的法律进行审查,这就削弱了中央在违反基本法审查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鉴于基本法是宪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必要将涉嫌违反基本法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概言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必要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建立直接的立法备案审查机制以及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具体而言,在立法备案审查机制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机关可直接将制定的法律上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备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过审查后,如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不符合“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特别是含有阻碍内地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文,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应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咨询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后决定是否发回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上,澳门诉讼案件中的原被告、审理法院均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反基本法审查的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申请转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后将相应的意见上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咨询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后将最终的结论函告提请违反基本法审查的主体。

(六) 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

新时代,澳门需在“一国两制”的保障下激活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助推澳门同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使“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此过程中,应繁荣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研究,助力澳门提高竞争力。

首先,加强对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研究和宣传。学界可就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如何适用于台湾的问题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14]。澳门的实践范例可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提供更多的经验。澳门可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在“一国两制”保障下实现繁荣稳定的发展经验。这样可助力消除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一些误解。

其次,澳门高校与内地高校联合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①。法学人才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资源。“一国两制”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当前,澳门的基本法教育资源较为匮乏,师资力量相对不足。澳门高校可与内地有条件的高校联合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负责联合培养的教育部门不仅要加强澳门基本法的基础研究,更要加强澳门基本法的应用研究。有关教育部门在培养澳门基本法研究人才的过程中,要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需要,培养熟悉澳门基本法、具备深厚专业素养的青年研究人才。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法学学子踊跃加入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队伍,负责联合培养的教育部门可加大澳门基本法研究的资助力度。

再次,定期举办专门以澳门基本法为主题的学术论坛。澳门多个高校实际上已经不定期举办与基本法有关的学术论坛。但是,不少参与者经常以香港基本法的视角来研究“一国两制”问题,这对推进澳门基本法的研究颇为不利。澳门高校应更多开展以澳门基本法为主题的学术论坛。

最后,激活“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内在动力。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并非照抄照搬香港模式。这一点从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的条文对比中可以证成。例如,澳门独有的市政机构是香港所没有的。澳门基本法中的市政机构作为澳门的特色,多年来一直未获得重视,相关条款长期处于冻结

^① 例如,澳门大学与深圳大学自2018年8月起联合培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状态。在 20 年来各方的激烈讨论和关注下,2018 年 7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拟成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市政署,以取代当时民政总署的职能。2019 年 1 月 1 日,澳门市政署正式成立。澳门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学界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兴起的澳门学研究,拓宽了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应具有的理论研究地位。这些方面都将进一步丰富澳门模式的理论研究内核,增强澳门法治底色,为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保驾护航。

四、结 语

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大局中,澳门需要时刻居安思危,及时抓住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每一个机遇,积极发挥作为特别行政区、单独关税区与外向型经济体的多重优势。同时,并非任何发展机遇都能适合澳门自身情况。囿于自身实力问题,澳门不可能全面兼顾所有发展机遇,只能深挖自己所需、发挥自身所长。基于回归祖国 20 年以来的成功经验,澳门将以更加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姿态实践“一国两制”,丰富发展“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基本方略贡献源源不断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 [1] 杨允中. “一国两制”实践论 [M]. 澳门: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16.
- [2] 齐鹏飞.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 李晓兵. “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施生动实践 [N]. 法制日报, 2014-12-16 (11).
- [4] 宋小庄, 孟东. “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特点 [C] // 杨允中. “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 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09: 44-45.
- [5] 香港青年协会. 香港青年趋势分析 2013 [M]. 香港: 香港青年协会, 2013: 153.
- [6] 吴希同. 香港困局背后的本土意识 [EB/OL]. (2014-11-28) [2018-08-20].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2_115872.html.
- [7] 民调: 逾三成香港中学生存在“国民身份危机” [EB/OL]. (2016-12-05) [2018-08-21]. http://www.guancha.cn/local/2016_12_05_382919.shtml.
- [8] 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EB/OL]. (2018-06-04) [2018-09-23].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view=chart&year_high_desc=true.
- [9] 澳门独派分子欲闯立法会 曾参与“太阳花”“占中” [EB/OL]. (2017-09-13) [2018-08-23]. http://news.lfeng.com/a/20170913/51982759_0.shtml.
- [10] 澳门立法会中止苏嘉豪议员资格 曾参与“太阳花运动” [EB/OL]. (2017-12-04) [2018-09-23]. http://www.sohu.com/a/208415661_115479.
- [11] 邹平学, 黎沛文. 《澳门基本法》研究概览 [J]. “一国两制”研究, 2016 (2): 42-55.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13] 邹平学, 冯泽华. 新时代港澳青年服役的统战价值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2): 71-77.
- [14] 习近平.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

杨立宪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北京 100053）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就是要对攸关台湾问题解决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因素进行综合思考、统筹布局，进而作出全盘谋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自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均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进行了战略思考，逐步形成了对台方略。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集中体现为：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对台方略战略思维的凝练，立基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和社会主义本质任务的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主要包括：发展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通过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保障和支撑。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

关键词：两岸关系；祖国统一；对台方略；战略思维；台湾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43-09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方略”，是指方针和策略或方法与谋略。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是指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战略规划与方法谋略。所谓“战略思维”，就是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的一种思维方式。战略思维具有长远性与前瞻性、全局性与整体性、重点性与关键性，以及复杂性、创造性、自觉性等特征。战略思维能力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能力。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才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胸怀大局、审时度势，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切实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和提升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4

作者简介：杨立宪，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研究”（15ADJ001）

引用格式：杨立宪. 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论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43-51.

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论述战略和策略的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战略思维方法，强调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2013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公开提及战略思维。2013 年 12 月，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14 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秉持的高度的战略思维。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就是要对攸关台湾问题解决及祖国统一大业的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因素进行综合思考、统筹布局，进而作出全盘谋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此前，学界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问题的论述均不同程度涉及战略视角，但尚未专门就“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问题开展研究。严安林、童立群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经济路径^[3]，未对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进行界定。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成果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从战略角度进行了解读。郑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宽阔宏大的战略视野、从容自若的战略定力、注重经略的战略运筹、坚决果断的战略魄力、海纳百川的战略胸怀、厚接地气的战略举措以及坚守底线的战略意志等战略思维特征^[4]。孙云、陈沛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台战略思想逐渐形成并完善的“两岸命运共同体”理论，蕴含着深刻的大陆对台“巧实力”战略思维^[5]。柯文认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提出的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的新战略、新思路^[6]。这些研究未充分聚焦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战略思维的核心内涵、具体路径和实践要求。本文将重点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二、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集中体现

自台湾问题形成以来，中共领导人就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只不过各个时期形势不同，面临的任務不同，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也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这些方案在战略思维上具有共同点，概括起来就是：要在坚持自身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发展增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雄厚基础和综合能力，通过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提供保障和支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1949 年以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战略思考成果，对党和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与对台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思想的初步酝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始终将主要精力用于首先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上。例如：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是为了保卫新生政权的安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各项建设，制订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为了争取有利于建设的国际环境；进行各种改革尝试，是为了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等。这期间虽走过一些弯路，遇到一些挫折，但不脱离基本的战略思维，这就是以自强为纲、纲举目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的战略认识更加清晰。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7]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8]。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9]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10]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12]

发展能够增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雄厚基础和综合能力。台湾问题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发展程度与生活水平因素。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毛泽东指出：“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3]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矛盾，但主要矛盾还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不仅军事经济力量不够强，政治文化的吸引力也不够强。因此，要在发展中积累解决台湾问题所需的综合实力，为统一创造必要条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够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胡锦涛指出：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有利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4]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既是人心所向，更是我国在新时期的基本国策与既定战略。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的必然要求，唯有力争并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为和平统一创造必要的条件与时机，假以时日以量变促质变。如果两岸关系始终动荡不安，不仅大陆自身的发展目标无法实现，也必然会影响两岸和平统一。

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保障和支撑。和平统一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和平手段不是万能的。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有时为了和平必须用武。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代表团时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放，用右手大概力量要大一些，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15]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台湾地区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均有一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的统一，企图实现“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所以，我们必须始终做好两手准备，以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为出发点，同时强化军事斗争准备，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不让任何“台独”分裂势力的图谋得逞。

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也是战略思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民族和全体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奋斗。

三、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一）中共领导人关于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的论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据此先后提出了“三步走

发展战略”和“新三步走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对台政策由之前的“解放台湾”调整为“和平统一”，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8] 104}。“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7]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8] 265}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都重申了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和平发展就是党和国家制定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思维。

1995 年 1 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面向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继续长期执行鼓励台商投资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同胞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采取实际步骤加速实现直接“三通”；作为和平统一的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

2008 年 12 月，胡锦涛同志发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该讲话全面总结了 30 年来中央对台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主张。他说：我们一定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该把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作为政治基础，把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协商谈判作为重要途径，把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作为强大动力。为此，胡锦涛提出六项具体政策主张：（1）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2）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3）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4）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5）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6）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14]。这一讲话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两岸关系勾勒出清晰的“和平发展路线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2015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携手实现民族复兴^[12]。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再次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16]

（二）发展是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命题，也是永恒的主题。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基本的条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只有牢牢抓住发展这个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环节，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包括延宕数十年之久的台湾问题的解决。2015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12]。

近代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和改善，但在人均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与中国台湾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201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900 30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2017 年增长 6.6%^[17]。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就 2017 年人均 GDP 比较而言，中国大陆排在世界第 74 位，而美国排在世界第 8 位，中国台湾地区排在世界第 37 位^[18]。

台湾问题的形成肇因于国共内战和美国等国际势力插手，但也与当时两岸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落差、我们尚不具备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有关。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属于发展中国家阶段，而台湾地区已进入后现代发展期。大陆在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人均受教育程度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落后于台湾地区。事实表明，我国距离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解决台湾问题说到底是综合实力的较量，不单是海峡两岸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更是中美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较量。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就容易四分五裂，乃至被国际强权所肢解。要摆脱这种局面，只有而且必须通过发展使自身强大起来，通过发展来解决我们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发展来缩小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发展来创造国家统一的时机与条件。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后才悟出“发展是硬道理”的真谛，中国人民正是在经历了巨大的民族苦难后才深刻理解了这个道理。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抓住了社会运动的本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一旦掌握了这个真理，必然会转化为领导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这决定了各领域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对台工作和对台方略，都要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陆不断发展进步、力量持续壮大，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力量对比差距，已对台湾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围绕台湾问题的战略态势不断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大陆的发展发挥了遏制“台独”图谋、发展两岸关系、抵御外来干涉的基础性作用。事实说明，坚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方向路线正确、上下团结一致、措施得力，一定可以释放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发展能量和后劲，一定可以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目标。

（三）通过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从世界发展史看，传统大国的崛起几乎无一例外要靠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究竟怎么走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有的国家担心中国会步传统大国的后尘，一时间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为此，党和国家明确宣示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两岸关系上则提出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是从顺应时代潮流、站在历史高度、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共同振兴中华的着眼点出发的。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两岸同胞的前途命运归根结底系于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古今中外的

历史和现实表明,家和万事兴。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强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去奋斗、去拼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突出强调两岸同胞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以人为本、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基本理念。

如前所述,台湾问题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这决定了解决台湾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必须从增强大陆自身综合实力、缩小两岸差距、开展两岸民间交流、拉近两岸心理距离、重塑两岸命运共同体入手。凡此种种均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过程来创造条件,需要两岸同胞团结奋斗。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平统一是成本最小、后遗症最少的选择,自然而然的是首要及明智的选择。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深刻揭示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决定着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台湾的前途、两岸的未来均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提出了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基本方略,即以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为政治基础,以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协商谈判为重要途径,以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为强大动力,以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为必要条件。这一思想包括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主张,如增进政治互信,推进经济合作,加强文化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协商涉外事务和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等。它指明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努力方向和基本内容,既表明了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决心和诚意,同时也考虑和回应了台湾同胞的需求和关切,有利于促进双方共同开辟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

简言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党和政府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作出的战略抉择,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也是贯彻国家和平统一方针的需要。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相辅相成,和平发展是创造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所需条件的必要过程,没有和平发展就不会有和平统一,反之亦然。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将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都落到实处。和平发展阶段的实质是由敌对状态向最终统一目标过渡,是和平统一的起步阶段或低级阶段。和平统一则是和平发展的高级阶段及必然走向。

(四) 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保障和支撑

和平发展、和平统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单有和平的一手准备是不够的,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作后盾和保障,不仅和平统一不可能,和平发展也会面临威胁。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和平与战争的交替史,中国历史上九次大一统均是通过武力征伐才得以实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至今令世人记忆犹新,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历史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所谓“止戈为武”,“为了和平,准备战争”,“能战方能言和”,讲的均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冷战结束后,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综合国力竞争发生重大变化。虽然和平、发展、合作的要求和呼声在上升,但围绕国际秩序、综合国力、地缘政治等的国际战略竞争和矛盾也在滋长。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频仍,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加大,国际军事竞争激烈,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日益明显。

由于中国崛起并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亚太地区现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一些国家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我国周边安全风险呈累积态势,特别是海

上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与此同时，敌对势力加紧进行各种渗透、颠覆和破坏，境内民族分裂势力与境外各种势力的勾连程度不断提升，暴力化倾向不断加剧，使我们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在两岸关系上，无论台湾地区内部还是国际社会，均有一些势力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统一，企图促成“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上述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和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确保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战略顺利实施。但是，我国军事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与国家地位不尽匹配，与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11] 唯有国家军事实力强大，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才能增强，反之亦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事手段是穷尽和平手段之后的最后手段。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8] 86-87}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16] 《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0] 《反分裂国家法》为我们迫不得已时以武止“独”，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

军事手段能否为维护国家安全保底，最终取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军队建设的质量。只有全面实施强军战略，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军队才能有效履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职能使命。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强军兴军的实践，已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性成就。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经并将继续在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反“独”促统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四、保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定力

2005年3月，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极大地震慑了岛内外的“台独”分裂势力。同年4至5月，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泛蓝政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海峡两岸掀起了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舆论热潮。国共两党通过商谈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五项愿景。之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两岸同胞的积极参与下，岛内政局开始发生积极变化。2008年春，国民党在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和地区领导人两场重要选举中获得

大胜，民进党则遭到挫败。该党发动的“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及“入联公投绑大选”也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上台为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带来契机。

基于“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共识，两岸及时恢复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制度性协商，先后签署了 23 项攸关两岸关系发展特别是台湾同胞民生福祉的协议，推动双方的两岸事务部门主管展开直接接触并建立了沟通机制，推动两岸有关公权力部门就若干议题进行直接合作，双方主管两岸事务的负责人先后 7 次会面并互称官衔。2015 年 11 月 7 日，世所瞩目的两岸领导人“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得到两岸同胞的高度称赞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两岸同胞盼望已久的直接通商通航通邮终于得以实现，为促进人财物直接双向的流动，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创造了条件。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陆生赴台学习、陆商入台投资，从无到有且快速发展。两岸还加强了在司法、金融、食品安全、渔船船员劳务、农产品检验检疫、标准计量检验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医药卫生、投资保障、核电安全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2016 年，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再次上台，两岸关系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黑暗期，各项交流不进反退。但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民进党便在“九合一”选举中遭到惨败：在倍受瞩目的 22 个县市长中，民进党由之前的 13 席降到 6 席，国民党则由之前的 6 席增至 15 席，另有 1 席为无党籍；在最重要的 6 个“直辖市”中，国民党、民进党由 4 年前的 1:4 逆转为 3:2，特别是国民党一举夺回了已被民进党控制了二三十年的高雄市。民进党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坚持“台独”意识形态、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使两岸关系严重倒退，使台湾经济民生继续原地踏步，台湾岛内的政争更加激烈。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说明，我们主张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既定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为台湾民众比较反思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提供了鲜活的参考范例。“九合一”选举结果也表明：台湾民众的自主意识空前提升，对两岸关系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清晰。“大陆好，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台湾百姓才会好”的道理，已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所认同。这对民进党当局继续推行“台独”路线构成重要牵制，对美国打“台湾牌”对付中国越来越不利，对两岸关系重回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和平发展深具积极意义。纵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复杂因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和平发展、共创双赢是两岸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还在于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两岸关系将重回和平发展这一正确轨道。

五、结 语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事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及核心利益。台湾问题的形成错综复杂，之所以长拖不决，主要还在于我们自身的综合实力不够强大。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基本内涵，就是要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立足自我，立足发展进步，通过发展增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雄厚基础和综合能力，通过推动和平发展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实现统一提供保障和支撑，进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其核心精神就是：把握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运用各种力量、资源和条件，矢志不移地致力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是统领对台工作及祖国统一大业的总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具备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基础和条件，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

心和决心。但我们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和挑战，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战略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高举和平发展、和平统一的旗帜，不放弃使用武力，防止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只有这样，大陆才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战胜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 [N]. 人民日报, 2013-01-30 (1).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 [N]. 人民日报, 2013-12-05 (1).
- [3] 严安林, 童立群.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经济路径研究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 (6): 63-68.
- [4] 郑剑. 习近平对台战略思维特征研究 [J]. 台海研究, 2016 (2): 19-26.
- [5] 孙云, 陈沛超. 大陆对台“巧实力”战略的构建——基于“两岸命运共同体”视角 [J]. 台海研究, 2017 (4): 45-53.
- [6] 柯文.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战略与路径——对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核心创见的阐发 [J]. 两岸关系, 2017 (10): 6-9.
- [7]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40.
- [8]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77.
- [9] 江泽民.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97年9月12日) [J]. 求是, 1997 (18): 2-23.
- [10]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2年11月8日) [N]. 人民日报, 2012-11-18 (1).
-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12]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 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5-03-05 (1).
- [13]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22.
- [14] 胡锦涛.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J]. 两岸关系, 2009 (1) 4-7.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 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3.
- [16]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年1月2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1).
- [17] 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2019年1月21日) [EB/OL]. (2019-01-21) [2019-01-22].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1_1645944.html.
- [18] 2017年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 [EB/OL]. (2017-01-21) [2019-01-21]. http://www.8pu.com/gdp/per_capita_gdp_2017.html.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 [20] 反分裂国家法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EB/OL]. (2005-05-08) [2018-12-20].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5-05/08/content_5341734.htm.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 暨“公投”之民意解析及启示

严 峻

(全国台湾研究会, 北京 100084)

摘 要: 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政治生态, 也折射出台湾民意新的发展趋势。民进党在 2018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大败, 反映了台湾民众对蔡英文当局在经济建设、社会改革和发展两岸关系等诸多方面的不满。台湾地区现行选举制度有利于“两大党体系”存在, 但超越蓝绿的台湾选民不断增加。新媒体在形塑和引导台湾民意动能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但依然不能忽视传统地方派系和政党的组织动员功能。此外, 台湾民粹主义在“公投”门槛调降下有进一步攀升的迹象。面对台湾民意的发展趋势, 大陆应继续以两岸经济交流为主要工作抓手, 广泛运用新媒体, 使更多的台湾同胞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台湾民粹主义在“台独”势力鼓动下以“公投”方式冲击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

关键词: 两岸关系; 祖国统一; “九合一”选举; “公投”; 台湾民意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9) 01-0052-08

2018 年 11 月 24 日, 台湾地区进行包括县市长、县市议员在内的 9 项公职选举以及 10 项议题的“公民投票”(以下简称“九合一”选举暨“公投”)。对这次“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折射出的台湾民意进行剖析, 不仅有助于大陆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台湾社情民意, 也有助于大陆更加精准地开展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 从而团结更多台湾同胞共建反“独”促统的统一战线。关于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 学界和新闻界等进行了预测和解析, 其中以新闻报道和评论居多。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揭幕后, 少量学术文献进行了跟进研究。有的学者认为, 选举结果表明, 台湾选民对蔡英文当局的不满表露无遗, 台湾民意再次表现出“求新求变”的特点^[1]。还有学者认为, 选举结果反映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状况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中间选民在“韩流”和网络媒体的催化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板块挪动,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法机构的“二合一”选举结果, 增加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可能性^[2]。这些学

DOI: 10.13946/j.cnki.jcqis.2019.01.05

作者简介: 严峻,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兼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中国法学会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理事、商务部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理事、海峡两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法学博士。

引用格式: 严峻. 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之民意解析及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1): 52-59.

术文献关注了民意因素，但未充分聚焦台湾民意动能的变化及重点论述选举结果对大陆对台工作的启示。本文将以民意视角，解析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的结果和启示。

一、民进党败选折射的台湾民意诉求

台湾地区实行现代西方政治制度，选举是台湾地区民众表达政治意愿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自 2010 年台湾地区修改相关选举制度后，每逢 4 的倍数年进行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立法机构人员一般与其合并选举），再过两年将所有“地方性”公职合并并在一天进行选举。6 个“直辖市”的市长及市议员、16 个县市的行政首长及议员、乡镇市长和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再加上“直辖市”中的原住民区长和区民代表共 9 项公职的选举，俗称“九合一”选举。由于“九合一”选举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后两年半举行，因此往往被视为对台湾当局的“期中测验”。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最重要的“直辖市长”选举上，民进党从原来的 4 席减少为 2 席，而且丢掉了长期占据的高雄市；16 个县市长选举上，民进党从原来的 9 席掉到 4 席；其余公职上民进党也都不同程度地减少席位。这清楚地显示：台湾民众对民进党 2016 年 5 月上台以来的政策和做法是不满意的。

（一）台湾民众对台湾当局的要求越来越集中于经济民生方面

民进党当局无法满足台湾民众的经济需求是其败选的主要原因。台湾自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选举起，到 20 世纪 90 年代开放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2000 年通过选举实现首次政权更替，各种选举一路走来夹杂着国家认同、省籍与族群矛盾、地方派系势力、社会运动等诸多因素。但最近 10 年来，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选举胜败的主要因素。2008 年国民党能取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胜利，除了陈水扁家族贪腐的原因外，台湾民众希望国民党上台后改善两岸关系与台湾经济也是重要原因。2012 年国民党差点败选，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其提振经济的能力有所失望。国民党在 2014 年“九合一”选举及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大败，更是因为民众对国民党在促进台湾经济增长和实现分配正义上的表现不满。民进党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失败，同样主要是因为其无法满足台湾民众的经济需求。数据显示，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率近 3 年平均为 2.33%，为近 30 年来最低且持续下降；2018 年 1 至 9 月全台湾地区公司解散、撤销及废止达 22 276 家，同比增长 26.4%^[3]。许多家庭收入剧减，民众怨声载道。其中 30 岁以下青年人成为台湾“低薪族”的主体，他们从对民进党抱有期待到大失所望。如同 4 年前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同时占据台湾地区领导人位子及立法机构多数席位，既然“完全占据”就应“完全负责”一样，这次台湾民众也认为民进党应该对台湾经济凋敝负主要责任。更令台湾民众愤懑的是，当许多人挣扎于低收入线时，民进党当局的一些裙带关系者却坐享高薪。这加剧了台湾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加重了社会大众对执政当局的反感。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能刮起“韩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高雄“又老又穷”的评价戳到了高雄市民的痛处，其“货卖得出去，人进得来，高雄发大财”的口号则点燃了高雄市民的希望。而“韩流”最终能席卷大半个台湾地区，说明有同样心境的选民远不止在高雄，多数台湾县市的民众都希望用选票改变经济命运。即便政治光谱偏绿的台湾《苹果日报》也在社论中指出：“每次选举结果，都是民意的展现，结果越悬殊，民意就越明确。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文雅点，就是选民告诉政客，‘请你拼经济’，说直白点，就是‘我怕穷（或穷怕了），我想赚钱过日子’！正在检讨败选原因的民进党，有必要正视如此明确的民意。”^[4]

（二）民进党当局的傲慢、躁进与台湾民众对公正、谦卑的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社会如同多数东方社会一样，对执政者在提供公共治理、提升生活品质上寄予较大希望，

但同时经由“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冲刷后对执政者有一种“我才是头家”的心理定式，希望这些靠选票上台的政党和政治人物以谦卑的心态服务大众。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推动的“一例一休”工时制度使劳工和资方同声抱怨，退休年金改革刺激了众多军公教人员，废核等能源政策造成空气污染等问题。台湾社会这种普遍的不满，不仅是因为民进党当局相关决策粗糙，伤害了不同人群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因为蔡英文当局背弃了其上台伊始宣称的“以谦卑的心态多作沟通”的承诺。如果说上述主要事关经济民生的政策推行还只是执政者心态傲慢、施政无能造成社会负面观感，那么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命事件上的霸道表现则让台湾知识分子阶层对学术自由及教育伦理深感忧虑。民进党当局以“促进转型正义”为名对国民党追缴党产及清查档案的做法，更令台湾大众不得不怀疑其真实动机。台湾当局“促转会”成员张天欣的“东厂说”，在很大程度上坐实了这种“民进党为一己之私以公器铲除异己”的猜测。这使广大蓝营支持者乃至不少中间选民坚定了以选票抨击民进党的想法。

（三）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和主张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忧虑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去中国化”动作不断及对大陆的敌视态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台湾民众收获两岸关系红利，而且使其愈来愈担忧台海发生动荡。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双十讲话”中涉及两岸关系方面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台湾当局领导人的讲话充斥着“两国论”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险恶用心。如此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进一步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只会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将台湾带向更加危险的境地^[5]。这更加引发台湾民众的不安。台湾岛内多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九合一”选举提供了他们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说“不”的机会。

二、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所谓民意动能，即民意的汇聚及其所形成的力量。在实行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社会，民意动能在选举中的直观表现是各个政党获得选票的多寡，进而体现为各政党对重要公职的占有以及对公职的占有比例。然而在台湾地区，在相关选举机制作用下，政党对公职的占有量却不能完全反映民众对该党的支持程度。此外，新媒体虽然在引导台湾民意动能上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但传统的党派系等组织在选票动员上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选举机制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在这次九项地方公职中最具指标意义的县市（含“直辖市”）长选举中，国民党从原来的 6 席大幅增长为 15 席，占总席位 22 席近七成，其中包括取得人口前三的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的“执政”权。所以，此次选举应可称为国民党的重大胜利。然而，台湾社会却普遍流传类似“这次是民进党的大败，却不是国民党的大胜”的说法。这一说法的根据主要是国民党对重要公职的大幅获得，未能同时表明台湾民意对国民党的大幅支持。民调显示，选前较长时间及选后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一直维持在 25% 左右。为何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未大幅上升却能收获大量重要公职？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台湾一些公职（尤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区域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都采用“单一席位一轮选举相对多数当选制”。在这种制度下，如果选民厌恶某个大党，往往会将票投给另一个相对不讨厌的大党候选人。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民牺牲周末时间去投票，不希望把选票浪费给比较没希望当选的第三党（派）候选人。这种容易产生“两大党体系”的选举制度被

著名政治学者杜瓦杰 (Duverger Maurice) 推崇为“真实的社会学法则” (a true social law)^[6]。台湾学界则一般称之为容易产生所谓“弃保效应”的“策略性投票”^[7]。正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 除非第三党 (派) 候选人非常优秀与突出, 让选民觉得把票投给他 (她) 不致于浪费选票, 第三党 (派) 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否则, 人们在台湾看到的情况一般是, 选民在讨厌国民党时将票投给民进党, 在讨厌民进党时又将票投给国民党, 国民党、民进党也因此利用了制度的便宜。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 人们认为, 台湾最大的党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 而是“讨厌民进党”。台湾社会这股强烈的“讨厌民进党”的民意动能, 在这种选举制度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民党在县市长席位上的大幅斩获。但也应看到, 国民党一些县市长候选人提出通过改善两岸关系来提振台湾经济的主张, 也是其吸引选民并最终获胜的重要原因。

当然, 这种“单一席位一轮选举相对多数当选制”主要在较大范围选区发挥明显作用, 但在范围较小的选区 (如乡、镇、市、村、里长选举) 中, 非国民党、民进党籍的当选人占了很大比例。这是因为在小的选区里面, 个人或者家族因素在选举中的权重上升, 选民因此有了投给第三党 (派) 候选人并使其当选的理性选择。例如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 非国民党、民进党籍的村里长占总席位的 80.57%, 远远超过国民党、民进党当选人; 乡镇市长选举中, 非国民党、民进党籍当选者也占 40.3%, 略低于国民党籍当选人, 但远高于民进党籍当选人。在采用“多席次单计不可让渡相对多数当选制”^①的县市议员选举中, 非国民党、民进党籍候选人当选者也很多, 这是因为在该选制下候选人只要获得较小比例的选票即可当选, 因此不太需要大党的支持。这说明, 台湾民意动能越来越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忠诚支持者之外的“第三势力”汇聚。韩国瑜整个竞选期间从不穿戴有国民党标识的服装, 就职演说中公开表示“高雄将不属于任何政党”。民进党“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县市长当选人郑文灿、林右昌、林智坚等人, 之所以能在被视“基本盘蓝大于绿”的地方连任, 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上任以来淡化身上的民进党色彩。无党籍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柯文哲在国民党、民进党夹击下依然胜出, 也是由于这种原因。这些现象表明, 在相关选举制度庇护下, “两大党体系”虽然仍有攫取台湾民意动能并继续存活的空间, 但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已经觉察并重视台湾民意动能超越蓝绿、跳脱政党的趋势。“第三势力”“中间选民”在决定台湾政治版图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 新媒体与传统组织混合作用下的台湾民意动能

近年来, 大众传媒方式的快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台湾民众在内全球各地人们的生活。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 新媒体对民意动能的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有研究指出, 早在 2014 年“九合一”选举中, 在新媒体动员下台湾青年选民投票意愿发生较大改变, 6 个“直辖市市长”当选人都是 Facebook 中支持者较多的一方^[8]。随着台湾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人数进一步攀升^②, 新媒体在选举中对民意刺激、引导、扩散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候选人广泛使用 Line、Facebook、PTT 等台湾民众常用的传播平台争取选民的支持。韩国瑜在政党支持有限的情况下能获胜, 除了其“非典型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质及竞选诉求打动选民外, 新媒体对其包装及推销而成功地汇聚民意动能也是重要因

① “多席次单计不可让渡相对多数当选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 简称 SNTV, 即一个选区有多个当选席次, 但选民在选票上只能在众多候选人中圈选其中一人, 由得票领先的前几位候选人当选。

② 台湾总人口仅约 2 300 万。台湾“网络信息中心”2017 年 7 月公布的“2017 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报告显示, 全台 12 岁以上上网人数达 1 760 万。(参见:《2017 年台湾宽带网络使用调查 TWNIC 公布: 全台上网率达 80%》,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724000111-260208>。)

素。统计显示,连柯文哲、蔡英文在 2014 年、2016 年声势最盛时,他们的台湾网络搜索热度也不及韩国瑜的一半^[9]。当然,台湾传统地方派系对选民的组织动员对韩国瑜的选举造势直至胜选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韩国瑜在高雄“三山”选举造势晚会获得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得到地方派系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地方派系的组织动员与新媒体混合产生某种“化学反应”,进一步推高了韩国瑜的声势。在其他县市长选举中,地方派系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例如,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胜选后前往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江启臣^①。另外,政党在选举中的作用虽然在下降,但依然发挥一定的组织保障功能。从这次“九合一”选举可以看出,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仍有浓厚“人情社会”色彩的台湾地区,新媒体和地方派系、政党各有独特功能,它们能否成功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民意动能能否被有效激发、引导。

(三) “公投”门槛调降后的台湾民粹主义运动趋势

2018 年,台湾第一次将“九合一”选举与全台性“公民投票”捆绑进行。“公投”结果是 10 项“公提案”通过了 7 项,这确定了台湾民粹主义的主要运动场域。民粹主义一般被理解为强调平民至上、反对精英掌控政治,但在台湾也有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恰恰表现为相关精英人物操纵民意与民众情绪以达到独裁或者威权统治的目的。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有台湾学者就用“民粹威权主义”一词来形容李登辉操纵民意以达到铲除异己、一人独大的目的。现在在台湾,民粹主义一般表现为民粹主义者在实现其目标的路径或者手段上,选择“直接式的民意展现与决定”而不信任、轻视或者摒弃“代议式民主”,甚至认为在非常时刻可以采取类似“公民不服从”等非常手段。典型事例如 2014 年台湾所谓“反服贸运动”中学生和相关群众冲进“立法院”并长期霸占该机构。不过,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中,多数民众还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对于依法举行的示威游行可以容忍,但对于体制外运动尤其是大规模街头运动则持疑虑态度。在此氛围下,包括台湾在内的相关较发达地区的民粹主义者在多数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法律所允许的手段来表达意愿,而公民投票被视为体制内直接民意的重要诉求方式。

以前,台湾“公投”门槛较高,使台湾那些对代议民主失望的人抱怨难以通过“公投”的方式表达意愿。有研究显示,以前一次全台性“公投”,其发起者需要耗费约 2 000 万元新台币和历时 1 年以上的组织动员方可完成联署^[10]。这使得除了大党外,台湾绝大多数个人和社团都无法做到成功联署。台湾地区自 2004 年开始实施所谓“公投法”,举办过的 6 项全台性“公投”全部由国民党、民进党发起。2017 年底台湾对所谓“公投法”进行修改,提案门槛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人总数千分之五降到万分之一,联署门槛从该人数的 5% 降到 1.5%。这样大幅的门槛调降,极大地提高了“公投”联署成功的概率。2018 年,10 个“公投”提案成功跨过联署门槛,其中只有 3 个由国民党发起,其余 7 个皆由民间团体发起。修改后的台湾所谓“公投法”同时将“公投”通过门槛从原来的选举人总数二分之一同意降为四分之一同意(有效同意票须超过不同意票),且规定 18 岁以上民众即可参加“公投”。此前,全台性“公投”从未有一案通过,但 2018 年“公投”通过率高达 70%,这极大地增加了台湾民粹主义者的信心。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台湾所谓“公投法”第 30 条规定,与“公投”结果相悖的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必须废除,需要立法的必须立法,若无关法规的创立或废除的“重大事项”,则“应由总统或权责机关为实现该公民投票案内容做必要处置”。也就是说,台湾“公提案”通过后不像欧洲某些国家的“咨询性公投”那样仅具有决策参考功能,而是

^① 江启臣系国民党籍台湾“立法委员”,也是台中市地方派系“红派”的头面人物,在动员台中市地方派系帮助卢秀燕当选台中市市长上作出较大贡献。

具有刚性后果^①。这就更容易激起台湾民粹主义者发动“公投”的兴趣与热情。从 2018 年多达 10 项的“公投案”与选举捆绑并且大比例获得通过，可以大体判断：今后“公民投票”将成为台湾民粹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展示场域之一，并且台湾民粹主义运动将在全球民粹主义重新躁动的大背景下利用台湾新的“公投”制度而趋于活跃，而一些原有的体制外、破坏性强的街头抗争将逐渐为台湾社会所摒弃，尽管一些小规模示威游行仍将在一定区域与范围内长期存在。

三、对大陆对台工作的启示

自 1979 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40 年来大陆方面一直秉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工作基本方针。对于如何实现统一目标，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大陆方面从原来的“双重希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当局”）逐步将工作重心锁定在“争取台湾民心”上。党的十九大提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明确了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同时强调坚持反对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和活动^[11]。而这一切不仅需要中国大陆自身进一步发展建设好，也需要大陆方面对台湾民情民意有越来越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进一步争取、团结台湾同胞共建反“独”促统统一战线的角度看，2018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具有如下启示：

（一）多数台湾民众认识到经济民生与两岸关系的重要关联性，大陆对台工作应进一步突出重点、顺势而为

民进党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之所以大败主要是因为其无法提振台湾经济。而民进党当局诸多方面的改革遭到各方批评，从经济角度看也是因为饼做不大却急于操作所谓“分配正义”。在生活品质不断下降的今天，台湾多数民众的心理需求事实上已经回归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说的基本需求层面，对于民进党当局仍然操弄意识形态对立、“历史悲情”、“恐中牌”以及拉拢美国介入选举基本无感乃至反感。而对于台湾经济与两岸关系的关联性，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这也是韩国瑜敢于在原本一直被视为“深绿之地”的高雄公开主张“九二共识”的原因。可以说，“两岸关系不好，台湾经济不会好”这句“九合一”选举中广泛流传的语言正逐渐成为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角度看，台湾经济情势的变化正不断地解构原有的政治板块，越来越多超越蓝绿的所谓“中间选民”其实多数就是经济理性选民。因此，大陆方面要进一步抓住经济这个抓手，除了继续开展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外，还要同一切愿意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县市开展城市经济交流，同时进一步推动“惠台 31 项措施”的落实工作，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使他们深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温暖，从而使认同和主张“九二共识”成为台湾民意主流，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筑牢民意基础。

（二）现代技术与传统组织在引导台湾民意动能上交叉作用，大陆对台工作应进一步加强争取台湾民心的渠道建设

2018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显示，新媒体对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成为形塑、引导台湾民意最主要的方式。这给大陆争取台湾民心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① 但有台湾学者指出，虽然“公投”结果具有刚性效力，但何谓“必要处置”在解释上有弹性空间，“加上除了法律复决案产生即刻的法律效力之外，立法原则或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都是交由相关机关去落实，无疑给了权责机关相当的裁量权”。参见：何展旭《“公投法”的“羞”与“修”》，载《中时电子报》2018 年 12 月 4 日。

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使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少年对于国家、民族、两岸关系的认识,极大突破了台湾岛内教育体系和传统媒体的限制。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编造的所谓“天然独”世代并不存在,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受“台独”思想蛊惑的“后天独”青年。大陆方面今后可以进一步以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帮助其更真切地了解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理解反对“台独”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国家统一事业的必要性^①。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仍应加强与台湾有关政党和精英阶层的联系,使精英在台湾岛内社会发挥以点带面、以点聚面的积极正向功能。此外,应该看到,台湾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西方式选举社会,选举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多数台湾民众对于这一生活方式持正面肯定态度^②。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要予以尊重,也要与台湾同胞坦诚探讨社会治理与制度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12]这些思路及其举措可以使更多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青少年理解大陆政治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与优越性,改变他们中一些人对大陆原有的偏见,也可以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相信国家统一并不会改变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从而促使“一国两制”在台湾岛内“去妖魔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共圆中国梦”的热情参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三) 台湾民粹主义有借助“公投”进一步泛滥的趋势,大陆应特别防范其对两岸关系和台海稳定的冲击

对于台湾纯粹民生问题的“公投”,大陆方面一般不作评论,但对于涉及“主权”“领土”问题的所谓“公投”,大陆方面则应坚决反对。与2018年“九合一”选举捆绑的10项“公投案”中,所谓与2018年“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就涉及“领土变更”和更改“国号”问题。“东京奥运正名公投”表面上看只是要求改变台湾奥运代表团名称,但该提案“理由书”明确表示“台湾”是“国名”,认为该“国”的“领土范围”仅在台澎金马。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要求变更“领土范围”及“国号”的“台独”诉求。虽然该案最后遭到台湾民众的唾弃,但也应该看到,今后类似涉“独”的“公投案”仍然存在被提出甚至通过的风险。虽然台湾所谓“公投法”将涉及“主权”“领土”的“公投”提案排除在许可范围外,但依据修改后的规定,“选举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审议会”,成为“公投”提案的审查机关,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对提案进行实质合法性审查的做法,而往往流于“形式审”。这使一些隐含“台独”意涵的提案容易获得批准^[13]。“喜乐岛联盟”等台湾岛内的“台独”组织正在筹备新的涉“独”“公投”。历史上台湾举行过的6个全台性“公投”中就有4个涉及“主权”问题,而这4个当时未能通过的“公投案”以现在台湾的相关标准都可以轻松过25%的通

① 台湾《远见》杂志的调查统计显示,所谓18至29岁的“天然独”世代10年前认为大陆对台不友善的比例高达50.8%,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但10年后的今天,已经下降至39.8%,成为所有年龄层中最低的;对大陆友善占比也从35.5%增加至40.8%,也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更有超过六成(61.6%)愿意到大陆发展。这显示台湾年轻世代对大陆看法已大不同。参见:刘宛琳《惠台措施民调 年轻人认为大陆最友善 6成愿意去发展》,载《联合报》2018年3月14日。

② 台湾选举中政党及候选人之间恶意攻击的现象虽然至今仍然存在,但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除了一些地方出现边投票边开票情况被质疑是民进党当局有意利用选举制度漏洞耍“奥步”(闽南语,指不正当手段)外,全台整个选举过程大体平稳,台湾舆论对此也基本持正面肯定态度。

过门槛。此次“东京奥运正名公投”也已经过了 25% 门槛，只是在运动员、教练员及其家人和朋友广泛动员下，以及国际奥委会多次发表严正声明的压力下，以不同意票超过同意票的投票结果未能通过（但二者差距在 3 项未通过的“公投案”中最小）。未来如果相关涉“主权”“领土”问题的“公投案”不再与具体特定人群挂钩，那么就有可能在岛内“台独”势力的鼓动乃至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下通过。加之台湾“公投”结果具有必须执行的刚性效力，那么届时涉及“主权”“领土”的“公投”结果就极可能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和平和台海地区稳定。对此，大陆方面应未雨绸缪，团结台湾岛内一切爱好和平、赞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加大宣传力度使广大台湾民众认识这类“公投”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使反对至少是不支持这类“公投”成为台湾稳定的主流民意。

四、结 语

台湾地区 2018 年“九合一”选举暨“公投”结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台湾原有的政治生态，也折射出台湾民意新的发展趋势。台湾地区的新闻报道、民意调查、学术论文等是大陆方面研究台湾民情民意的重要资料，而公职选举、“公投”等政治活动则为大陆方面提供了另一个直接观察台湾民意的窗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要“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14]。要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就需要大陆方面更深入、更真切地了解台湾民情民意。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扎实开展对台工作，反“独”促统统一战线才能更加稳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行稳致远，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才能顺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才能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 [1] 张文生. 2018 年底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评析 [J]. 台湾研究, 2018 (6): 24-30.
- [2] 林冈, 王晓笛. “九合一”选举及其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 [J]. 台湾研究, 2018 (6): 10-23.
- [3] 瞿定国. “九合一”选举民进党为何惨败? [J]. 台湾周刊, 2018 (46): 9.
- [4] 苹论: 选民说得够大声了吧 [N]. 苹果日报, 2018-11-28.
- [5] 国台办: 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的行径, 只能自取其辱 [EB/OL]. (2018-10-10) [2019-01-22].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10/t20181010_12099405.htm.
- [6] 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9. P. 217.
- [7] 王业立. 台湾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社, 1996: 53.
- [8] 李贺. 2014 年台湾“九合一”选举综述 [G] // 周志怀. 台湾 2014.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268-269.
- [9] 管婺媛. 韩流、柯 P “网红”政治操盘内幕 [J]. 商业周刊, 2018 (1620).
- [10] 俞振华. 公民投票案提案审核机制与门槛之研究——以瑞士、美国、意大利、日本、法国法制与运作情形为比较研究 [G]. 台湾地区选举委员会, 2013: 205.
- [1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12]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1).
- [13] 季烨. 台湾地区“公民投票法”修订述评 [J]. 台海研究, 2018 (3): 56-66.
- [14] 吴亚明.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 [N]. 人民日报, 2014-09-27 (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政党建设视角下新党的兴衰历程

陈先才 翁明源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新党曾是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三大政党，在经历短暂辉煌之后就陷入了发展低谷。新党由盛转衰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未能进行有效的政党建设。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定位不清，在代表谁的利益问题上长期摇摆不定；二是理论建设不足，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无法吸引选民；三是组织不力，松散的“柔性政党”架构导致其战力不足；四是能力欠缺，不能适时调整策略，也没积极学习大党的发展经验。近年来，随着新党青年军的崛起以及新党组织建设的逐渐转变，上述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之中。

关键词：台湾地区；新党；政党建设；新党青年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60-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党于1993年成立，脱胎于“新国民党连线”，凭借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和鲜明的统一色彩而迅速崛起，因一度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拿到21个席位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大势力”。但是短暂辉煌之后是长期的沉沦，新党自1997年后开始式微，直到今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该党高开低走到几乎一蹶不振呢？两岸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对新党为何衰落，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因素、资源因素和省籍属性三个方面做了解答。

持制度因素论的研究者认为，台湾地区选举制度不利于第三势力发展。根据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在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只有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才有资格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分配席位。这对小党极为不利。王猛认为“正是不能跨越5%政党门槛，新党、亲民党先后走向了泡沫化”^[1]。更糟糕的是，2005年所谓的“修宪案”将“民意代表”席次减半，将“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进一步限制了小党的发挥。持资源因素论的研究者认为，新党所掌握的资源不足才是其衰微的原因。如罗达菲认为，新党最初的人才资源为其带来了资金、媒体和组织的资源，帮助其实现了最初的扩张。1997年之后，新党的衰微则是由于其人才的遗失和人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06

作者简介：陈先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翁明源，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陈先才，翁明源．政党建设视角下新党的兴衰历程[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1）：60-65．

才资源管理的不善^[2]。王猛也认为,人才和资金上的“短板”限制了新党的组织运作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实力衰落^[1]。持省籍属性论的研究者认为,新党的衰微是因其代表了外省籍、统派。如宁澧认为:新党甫成立,已经被民进党和国民党扣上“外省人的党”“急统派”等大帽子^[3]。茅汉也认为,省籍属性限制了新党的发展,“外省籍在台湾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八,新党的‘民代’提名,外省籍理应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每次都高达八九成”^[4]。

综上,既有研究都没从普遍性的政党发展理论来解释新党的衰微,即便是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提出来的特殊性也不能解释新党发展至今的主要过程。本文试图从政党建设角度出发来探讨新党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其缺乏竞争力的原因。

二、政党建设的重要性

政党建设是指“政党为完成自身的使命而进行领导国家、社会和提高自身生机和活力的理论和实践活动”^[5]。它包括确定自己的定位,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理论,召集具有相同定位和理论信仰的人才建立自己的组织,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宣传组织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一般来讲,根据政党实现建党目的的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分为革命型政党和选举型政党。革命型政党通过发动革命来夺取政权,选举型政党通过参与政治选举来获得政权。一般认为,革命型政党要推翻现有政权,每天都在生死边缘活动,自然应加强自身建设,只有坚定信念、严密组织纪律,才能保障生存;而选举型政党在一些理想化的民主理论当中,是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人自发组成,他们为共同利益自然会紧密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参与选举,并不需要进行自身建设。其实不然,在现代选举政治当中,民众一般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甚至常常被误导,自然也不会很坚定地团结在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周围。特别是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彰显和社会的多样化,政党竞争愈发激烈,各种中小型政党日益崛起,单一的一两个政党把持政局的局面已很难维持甚至已在很多国家被打破。这就要求每个政党必须更有战斗力,改变松散状况,加强自身建设。

政党建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的定位,即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这是党的各项建设的基础,也是政党所有理论和行为的出发点。在现代选举政治中,一个政党必须明确自己代表谁的利益,这个代表不是必须跟别的政党完全一样或完全不一样,必须是基于政党的最初目的,而不是为选举而建党。二是理论建设。一个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政党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来自政党的定位,是政党所有行动的指针。这是战略性的建设。政党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才不至于偏离方向,才更有利于吸引选民、提升战斗力。三是组织建设。一个要在选举中应对自如的政党必须有一个规则清晰、纪律严明的组织。一个纪律松散的政党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选举局势,无法合力对抗其他政党的攻击打压。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政党组织太过松散,党员不受丝毫限制,随时可以加入或退出,那么这个政党就没有凝聚力,对党员就缺乏吸引力和归属感。四是能力建设。一个定位清晰、理论扎实、纪律严明的政党需要有足够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向别的政党取长补短,不断修正自身的学习能力;也包括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高效地服务于自身发展的组织能力;还包括如何参与政治选举,如何运用权力,如何推出政策的政治能力。

上述四个方面的建设是一个政党必不可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90多年,执政了70年,依然在不断地进行自身建设,进行理论创新,开展从严治党。而处于低谷阶段的新党更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崛起。

三、政党建设视角下的新党之过与振兴之道

（一）定位

新党刚成立时的定位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在创党之初，新党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小党”，“承认自己是少数，可预见的将来也会是少数”^[3]。因此，一开始新党成立的目标就不是夺取“执政权”，而是先争取一部分铁杆选民再“徐图大业”。新党一开始的发展策略比较务实：“攻两党^①在安于既得利益而对改革所持的保守态度，拉拢两党尚未或无心关照的第三势力，累积其政治资源。”^[6]新党当时打出的旗号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②，立志做小老百姓的代言人，通过支持统一、反对“台独”，以求争取外省籍和青年人的支持，展现出与当时李登辉的“独台”和民进党的“台独”的鲜明区别。这样精准的定位对成立之初的新党确实形生了重要助力，使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为台湾地区政坛新兴力量，一举取得辉煌战绩。

但是新党的这种表现并没能持续，初尝胜果的沾沾自喜和囿于国民党和民进党营造出来的舆论压力，新党的定位逐渐模糊化。一是大打“反共”旗号。新党在宣言中明确提出要与中国共产党展开谈判，但又因担心被扣上“中共代言人”的帽子而处处“反共”。甚至其召集人王建煊公开宣称：“我们不敌视大陆同胞，我们是敌视它的政权。”^[7]二是淡化“反独”色彩。为获取选举利益，新党一改“反独”主张，竟想和民进党进行“大和解”，声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且新党也愿意和民进党做朋友”^[7]。三是放弃统一主张。1998 年 2 月，以姚立明为主的新党“十人小组”提出“一中两国”，与新党一贯主张的“一个中国”公然对立。尽管此事在赵少康、李庆华等新党领导的反对下很快归于沉寂，但使台湾民众对新党的定位愈发迷惑，而且自那一年起，新党的选举表现就开始一路低沉。四是新党定位的最大问题在于“反李登辉”。新党最初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反对李登辉，所提出的各项政治口号和公共政策也和李登辉针锋相对。“反李登辉”成为其实质上的最大诉求。但是在李登辉退下来后，新党就无人可“反”了。民众发现这个时候的新党与国民党似乎并无二致。至此，新党最初的定位全部崩塌，模糊不清的定位自然难以体现其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区别，也难以吸引选票。

那么，新党现在如何重新定位呢？这就要坚定以下四个层面的定位。一是要坚定统派立场，重新高举“反独促统”的旗帜。在如今民进党大搞“渐进台独”、推动两岸对立的情势之下，新党应以和平为宗旨、以统一为目标，团结支持统一的台湾民众，反对民进党一意孤行的危险行为。根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岛内支持统一的比例开始回升^③。这说明台湾民众不满“台独”的倒行逆施，更加珍视和平。二是要破除省籍壁垒。新党成立之初就被民进党扣上“外省籍”帽子，严重影响其代表性。为破除这一壁垒，新党应更多宣扬统一对维护台湾民众切身利益的好处。不仅如此，它要从台北走出去，在全台湾发展组织、宣扬理念，推行惠及全台湾的公共政策。三是要重视青年世代。创党之初，新党就提出过要吸引青年选民，但后来因为定位的错误而导致选民流失。时至今日，无论是蔡英文的当选、“时代力量”的崛起，还是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的“韩流”现象，都可看出青年人是各政党选票最重要的增长点。根据王瀚的一项研究，台湾地区现在的

① 这里指国民党和民进党。

② 参见新党宣言，<https://new-party.org/%e5%ae%a3%e8%a8%80/>。

③ 参见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1994 年 12 月～2018 年 06 月），<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7>。

青年世代并非民进党所说的“天然独”，而是一群更理性的年轻人。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他们在2016年选择蔡英文只是因为“国民党太烂没得选”，并不代表其支持“台独”^[8]。而这正是新党的机会。时下新党当中的青年军活跃在台湾地区政治的舆论场中，对青年人具有极大吸引力，这是新党未来发展的关键。

（二）理论建设

一个政党要想在政治场域中获得长久支持，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不是凭借个别热点话题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新党针对民进党提出“反台独”，针对国民党提出“反黑金”本也是个不错的方向，只是在其论述过程中，缺乏深刻的理论支撑。在“反台独”上，新党一贯的理由是如果宣布“台独”，台湾人民就会陷入战火。但是如果民进党不推行“台独”或者只维持现状，那么新党“反台独”就缺少了攻击目标。同样，新党之所以提出“反黑金”，是由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凭借“黑金”收买选票。但是随着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完善，“黑金政治”愈发不被民众所感知，新党的这一论述也就欠缺了号召力。因此，这样一种谈不上理论的论述无法使新党具有长久号召力。近年来，新党逐渐开始找寻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自诩为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基于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经济”“新中国”“新民权”的口号。“新经济”是基于民生主义而提出的“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新中国”是基于民族主义而提出的“不做被美日利用的棋子，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两岸合作振兴中华”；“新民权”是基于民权主义而提出的“权能分离”。这三条基于三民主义而提出的口号其实并无新意。事实上，以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并根据时势做出不同解读，以支撑新党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现实可行性。

一是从民族主义来讲，现在国民党的“不排斥统一”与民进党的拒绝接受“九二共识”，都不支持统一，新党提出的“反独促统”有很鲜明的号召力。这就可以用民族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为什么要“反独促统”呢？其一，两岸都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统一是符合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二，两岸敌对状态最初是国共内战的结果，但持续至今主要是受美日等外部干预阻挠的结果，是美日不愿看到中华民族崛起所采取的伎俩。其三，大搞“台独”的分裂分子数典忘祖，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字，却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二是从民权主义来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台湾地区虽以民主制度自诩，但民进党现在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尊重人民意见。民进党不顾民意的反对，推行“一例一休”和修改《劳基法》；为迎合“台独”分子而破坏两岸关系，阻碍两岸交流；为打击统派人士而滥用公权力侵害人权。作为“绿色恐怖”的受害者，新党正好可以借此宣扬自己的理念，提出新的政策。

三是从民生主义来讲，台湾现在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蔡英文当局却不顾大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转而去东南亚“寻根问祖”，使台湾地区经济雪上加霜。曾大力支持蔡英文的青年人现在只能纠结于微薄的月薪。新党应积极支持同大陆开展经贸往来。大陆巨大的市场能够为台湾商人和青年人提供重要的发展、就业机会。大陆强大的消费能力对台湾的旅游、农业、渔业等都能带来强大的增长动力。这些才是改善台湾民生的最直接助力。

（三）组织建设

一是发展党员。成立之初，新党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柔性政党”，即“参加新党只要登记不必宣誓，不必缴党费，不必开小组会议。人人因理念相同而加入，人人也可以随时因理念相异而离开。新党允许跨党，并欢迎精神党员。凡不便登记为新党党员，但认同并支持新党者，都是精神党

员”^①。从这些规定来看，党员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甚至允许跨党参与。这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兴趣小组。诚然，这些要求是有原因的：新党最开始从国民党脱离出来，为吸引那些想要加入又不愿得罪国民党的人而采用了这些柔性方式，以使自身获得认同和帮助。但这带来的显著缺点是党员没有向心力。党员人数可能会很多，但在选举过程中，这些加入和退出都有限制的党员就不太可能会对选举提供帮助。此外，新党成了个别政治明星的垫脚石，一些在国民党或民进党受到排挤的政治人物会借由新党来实现其政治抱负。由于党员既没有门槛又没有束缚，新党就成了这些人的工具。当新党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这些人就过来投靠；一旦新党遭遇困难，这些人就会很快离开。更有甚者在新党内大搞权力斗争，将新党的资源转换成个人资源，从而打击了想要加入新党的仁人志士。新党后来察觉了这样的问题。经过 2004 年和 2007 年的两次修改之后，新党党章规定：“党员违反党章、党规、党纪或委员会决议者，得视其情节轻重，由全委会做成警告、纠正、停止党权或开除党籍处分。”^② 尽管这对新党的组织建设或许还不够，但已有很大进步。

二是建立党的组织。新党委员会一直以来都是新党最主要的权力机构，决定新党的一切事宜。但广大党员没有发声渠道。在最初的时候，无论是推举候选人，还是选举召集人都由委员会来决定。本该作为主体的党员只能被动接受委员会的安排，这也使很多本来对新党抱有极大希望的党员纷纷退党。委员会成了各政治人物换票的中心，全然不顾新党的发展。同时，新党只设召集人而不设主席，全党没有一个政治核心，“群龙无首”带来的就是无休止的内斗。一开始的斗争使建党元老赵少康出走，后又批判从国民党转投新党的功臣许历农，以致最后出现了对新党打击沉重的朱高正“家变”事件。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新党，经过几次党章的修改，增设了党代表大会，作为新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增设了主席，对内综理党务，对外代表本党，由全体党员直选产生。尽管显得稍晚，但这些措施逐渐使新党重新具备了凝聚力。

（四）能力建设

学习能力是指政党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和选情，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和选举策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能力。这是新党在过往的选举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时势的错误判断导致新党不时提出“反共”“反统”等与自身定位不符的昏招，不仅没能达到吸引更多选民的目的，反而致使一些比较坚定的支持者选择离开。政党的学习能力并不是要其朝令夕改、时刻变化，而是要审时度势，随着时势变化而做出适当调整。最关键的是，不论怎样调整变化，政党都不能改变自己的最初定位，不能改变自己的核心主张。

组织能力是指组织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帮助本党发展的能力。它既包括如何招募得力人才，如何吸引资金支持的能力；也包括如何最大效率地使用人才、使用资金的能力。一是招募人才。从全盛时期拥有超过 60 000 名党员的第三大党沦落到如今不足 1 000 名党员的“最老小党”，人才流失是新党的最大问题。如何吸引人才，找准发展对象很重要。目前来看，青年人才应成为其发展重点。青年人是台湾社会未来的希望，更具理性的青年人更有可能被新党动员起来。二是吸引资金。现代选举政治是一项资金耗费巨大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宣传、组织、人力都需要资金投入。新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党员所交的党费、零星捐款以及不到 5%投票率所获得的政党补助款。新党既不像国民党那样有大资本家的支持，也不如民进党那样有外部势力的青睐。主张统一、又代表小老百姓的

① 参见新党宣言，<https://new-party.org/%e5%ae%a3%e8%a8%80/>。

② 参见新党党章，<https://new-party.org/%e9%bb%a8%e7%ab%a0/>。

新党尽管在岛内得不到太多资助，但是在海外却有一大批支持者，曾经被称作“海外第一大党”。如果新党能够坚定自己“反独促统”的鲜明立场，海外华人将会是其重要支持者。

政治参与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如何打赢选战的能力。当一个政党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的时候，要赢得选战还需要有合适的选举策略。这就包括如何推出和布置参选人，如何进行选前宣传动员，如何应对对手的挑战等。长期以来，新党由于人才资金的缺乏，既难以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也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活动，但是作为小党也可以有依托自身优势的选举策略。其过去在金门的长期“主政”就是其很好的经验。

四、结论与展望

2018 年元旦，新党青年委员会发布《为和平立基，为苍生立命——新党青年军致全球中华儿女书》，以“战争无情 和平无价”“人民求生 发展有道”“反独无罪 促统有理”三个段落表明了新党要和平、求发展、“反独促统”的坚定立场。这表明新党的定位变得更加坚定、明确。新党青年军立足台湾，通行两岸，放眼全球，对现实、对历史都有更加客观深刻的认识，使新党在沉寂多年后再次成为台湾地区社会舆论的常客。这批青年人既能坚持传统，又有新的思想，目前正在构建新的理论，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在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新党青年军的代表、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成功当选台北市“议员”，其他青年军代表林明正、苏恒虽未当选，但也获得了较高票数。历经岁月磨砺的新党在新时代终于展现出新生机。以新党青年军为代表的新党新一代将会给台湾社会带来更重要的转机。

参考文献：

- [1] 王猛. 台湾新党、亲民党“泡沫化”现象探析 [J]. 现代台湾研究, 2011 (4): 21-26.
- [2] Fell 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new party: Ideology,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East Asia, 2006 (1): 47-67.
- [3] 宁滢. 新党的空间及国民党所受的冲击 [J]. 海峡评论, 1993 (33): 59-60.
- [4] 茅汉. 成也新党, 败也新党——论新党的败选与改造 [J]. 海峡评论, 1999 (97): 52-55.
- [5] 叶笃初, 卢先福. 党的建设辞典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20.
- [6] 孙国栋. 新生代爱新党 [J]. 海峡评论, 1993 (33): 38-39.
- [7] 陈孔立. 新党的国家认同 [J]. 台湾研究集刊, 1998 (3): 40-47.
- [8] 王瀚, 张遂新, 陈超. “好评”会带来“好感”吗?——基于台湾青年的实证研究 [J]. 台湾研究集刊, 2018 (4): 20-30.

责任编辑: 孙德魁

统一战线与人的全面发展

——关于统一战线功能的哲学反思

贺善侃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当今中国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宗旨在于破除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统一战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最终将指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战线在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为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统一战线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来发挥功能优势。“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构建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统一战线；人的全面发展；哲学反思；统一战线功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66-06

在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作用归根结底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把统一战线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是对统一战线功能的哲学反思。这种哲学反思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统一战线功能的认识。

一、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质：人的全面发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发展的实质即是人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的自觉活动。对此，我们可以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进行理解。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点在于人是不断超越“现成性”的、面向未来的特殊存在者；人能通过生产劳动实践，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身，不断创造出新的世界和自我，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一部社会历史无非就是人类自觉的、不断追求自身目的的实践活动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是属于人特有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活动，是一种人的“合目的性”活动，也是人追求特定价值性的活动。可见，发展必然内含着人文向度。离开人的自我超越、自我扬弃和自我实现，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07

作者简介：贺善侃，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市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引用格式：贺善侃. 统一战线与人的全面发展——关于统一战线功能的哲学反思[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66-71.

就无所谓发展。依据对发展的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的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互为前提和条件：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和保障；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目标和动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人越是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发展的直接结果是社会全面进步。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是人的自由实现程度和解放程度。从历史上看，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以人的一定程度的解放为标志。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发展总要通过人的解放程度表现出来。人的解放程度标志着社会进步的性质和水平。人在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得到的自由越多，解放的程度越大，社会进步也就处在越高的水平上。这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相对应的。社会发展到什么水平，人的素质也相应地发展到什么水平。从人的素质的发展水平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从宏观角度分析，人类素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整体、笼统的原始性素质和分析的理性化素质、综合的多层面现代化素质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分别映照了古代农业社会、近代工业社会及现代社会三种社会状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揭示了人的素质丰富性、多层面性的思想，代表了人类长久的奋斗目标。丰富的、多层面的人的素质代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代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

其二，社会形态演进的实质是个人形态的演进，表现为从依附型到独立型、从片面型到全面型人格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史就是个人发展史。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1]据此，马克思在创立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个人形态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一方面，历史是个人的历史，另一方面，个人是历史的个人。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新陈代谢的历史，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的生成、发展的历史。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个人形态。在原始社会，社会的基本组织是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的氏族公社，与氏族共同体和公社所有制形式相适应，个人的形态表现为依附于自然血缘共同体的个人，这是人类个体的最原始形态，因为处于这种形态的“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3]。在这种形态下的个人自我意识还未最终形成，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消极被动的适应关系，人际交往也仅仅局限于狭隘的氏族公社内部。随后，当社会演进到私有制社会后，与土地私有制和宗法的或等级的政治共同体相适应，就产生了个人对家族、国家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于宗法的政治共同体的个人形态由此形成。这是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形态相对应的个人形态。这种个人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狭隘性以及个人对特定社会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逐渐替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所有制所取代，农民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之相适应，就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独立的个人形态。与这种个人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相关联的是个人自主性的增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利益发生分化，活动自主性加强。凡此种种，无不为人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此时的个人形态还未完全摆脱片面的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个人的普遍、全面的关系还未最终形成。按马克思的说法，只有到了“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才能获得全面

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4] 89}。此时，人类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个人形态——全面发展形态。这是全面把握劳动和享受、物质和精神、类和个人等关系，全面占有自己本质力量的完全的个人；个人成为普遍的社会化的个人，打破了一切人的依赖纽带、血缘依附关系，确立了真正平等自由的观念和意识；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性地域性束缚，建立起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总之，社会发展的归宿正是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也是全面发展的个人形态的普遍形成。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归宿——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二、统一战线功能之一：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一是受制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马克思在谈论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注意的是社会的经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生产还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孤立地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各种血缘、宗法等级关系的制约，人们的社会联系也是极其狭隘的，因而此时人的发展必然是孤立、片面的。在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交换价值为媒介的普遍的依赖关系，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依赖关系虽然打破了以往那种受地域、血统、等级等种种关系制约的狭隘人际关系，但却是对商品交换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显然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不可能是全面的。马克思描述的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自身发展的高级形态，只能是社会高级形态——“自由王国”的产物。生产力在高级社会形态中高度发展，超越了商品经济阶段，创造了人普遍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二是受制于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以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基础。民主制度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政治环境。马克思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考察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批判了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观点，主张国家从属于市民社会，并明确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一种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包含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形式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因而，市民社会必然提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国家政治制度应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而建立。个体自由的社会本质决定了民主制的合理性。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规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5]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能仅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外在环境。三是受制于社会文化即意识形态环境。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人的自由程度的提高除从自然束缚、社会经济剥削和社会政治压迫下获得解放以外，还包括从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身的精神状态下获得解放。这就是说，社会文化包括文化体制、价值观念等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共同构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在环境。

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宗旨在于破除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统一战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最终将指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统一战线在“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6]，从而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目标与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吻合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进入新历史发展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7]。新时代，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没有变。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与党的统一战线主题、任务的结合，可集中于奠定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文明中公民的一项重要政治行为，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需要一种组织和协调机制。而在对政治参与有影响的所有政治变量中，政党的影响是最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就是为适应公民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产生和兴起的，政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公众意志带到政府系统中去。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建立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党的统一战线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即按照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要求，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奠定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创造。此种民主形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保证来自各界的政协委员在选举活动之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平等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整合各方的意见和利益。可见，统一战线在为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其次，统一战线在经济体制改革、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众所周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统一战线的最大资源优势就在于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研究方面；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方面；在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等方面，统一战线无不具有明显优势。

再次，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在为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方面至关重要。统战工作离不开文化工作，文化工作不能脱离统战工作。以先进文化为手段的统战工作必将产生更显著的社会效果，吸纳了统战工作内容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将更为丰富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统一战线始终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8]统战文化的作用在于通过文化统一战线，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新时代的统战文化以“团结、合作、互助、关爱、和谐”为基本准则；以党际合作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宗教和顺文化、新的社会阶层信义文化、海内外同胞同根文化等为基本内容；其精髓是“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其目的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构筑和谐共融、团结友善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保证。这样的文化环境正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

三、统一战线功能之二：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人际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与主体结构有密切关系。对主体的结构性可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一是单个主体的内在结构；二是个体主体与外在客体相互作用的外在结构；三是把所有主体视为一个整体，从各主体的交往结构中考察主体的社会构成。社会主体的构成体现了主体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内涵取决于主体内在结构的复杂系统性；人的全面发展的外在环境取决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外在结构及其各主体交往结构中形成的主体的社会构成。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以主体内外结构的统一为基础。正因如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全面发展，与主客体之间以及内外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和谐程度紧密相关。这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①。

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乃至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凝聚在党的周围，汇聚起强大的力量，通过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共同为落实党的治国理政方针而努力。统一战线重点围绕妥善处理包括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来发挥功能优势。服从共同利益、形成合作格局、坚持协调发展和凸显和谐主题是统一战线处理好各种政治关系的艺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是统一战线处理好各种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所谓协调，即统筹各方面社会力量，兼顾各方面利益。伴随社会个体化、分层化的强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更趋复杂。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复杂的关系，其实质是利益关系，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文化利益。于是，统一战线的利益协调作用日趋重要。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就要充分发挥好统一战线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作用，即兼顾各方、求同存异，求同化异，把大家所思、所想、所做都集聚到党的战略目标、中心任务上来，形成最大同心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含义之一。“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构建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人际关系的最好途径。它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拓宽多党合作渠道，画出政党合作的最大同心圆。我国的历史证明：形成“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我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内涵。画出政党合作的最大圆圈，就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实现共同繁荣，把冲突、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以推进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其二，拓宽民族工作渠道，画出民族团结的最大同心圆。民族工作是一项全局性工作。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确保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的根本，也是促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

其三，拓宽宗教工作渠道，画出信教群众工作的最大同心圆。宗教工作与民族工作一样，都是全局性工作。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信教群众的工作，是要团结

^① 这里是指构成社会主体的各层次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各种群体（如阶层、政党、群团组织等）之间的关系。

和教育信教群众为祖国富强和民族振兴积极贡献力量。”^[9]信教群众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增添新力量的历史背景下，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争取、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和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纳入宗教工作的重点，最大限度地把信教群众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上来。这是对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拓展和延伸，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四，拓宽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渠道，画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直接关系到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程度。目前，我国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人员也更为众多，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和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其五，拓宽港澳台、侨务工作的渠道，画出团结海内外同胞的最大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一国两制”深入实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大陆内和大陆外统一战线两个范围联盟中的成员流动更加频繁、联系日趋紧密，要适应新形势，切实做好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和侨务工作。以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为切入口，争取人心、做好“一国两制”实施的基础性工作。在对台问题上，要从实现祖国统一、对一个中国的认知这一“最大公约数”入手，争取更多台湾民众参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通过经贸交流，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增强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把两岸同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对台工作的主要目标。要从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个视角出发，构建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人际关系。

总之，妥善处理好五大政治关系，画出五个最大同心圆，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在构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际关系方面所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6.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99.
-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7.
-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 [9]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3.

责任编辑：孙德魁

“培根”与“养心”： 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研究

钱再见

（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自身建设中，思想政治建设是核心，组织建设是基础，制度建设是关键。民主党派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需要在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中进一步厘清方位和目标，拓展内容和渠道，丰富方式方法，构建动力机制。

关键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统一战线；新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72-08

王守仁说：“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这就是说要想种一棵大树，必须从树根培育，修养品德则必须从培养心性开始。现代政治社会中的思想政治建设其实是在“政治人”的精神家园中进行的一种培根、养心工作。无论是执政党或是参政党，其思想政治建设无疑都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意义。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既要求执政党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也要求各民主党派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的总体要求。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来说，民主党派的政治素质直接关乎其存在与发展，关乎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和说服力，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中，思想政治建设始终是核心，是带动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

一、我国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多年来，民主党派始终高度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在“培根”与“养心”的实践中不断探索

DOI：10.13946/j.cnki.jcqi.2019.01.008

作者简介：钱再见，南京师范大学强化培养学院院长、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研究”（ZK2018022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政务诚信建设研究”（17ZZA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委托项目“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研究”（18TJB002）

引用格式：钱再见，“培根”与“养心”：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研究[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1）：72-79.

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可行性路径，形成了许多有益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建设内容规范化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支持和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是不断提高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主要是帮助民主党派巩固和发展组织，倡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首先是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发扬自我教育传统，加强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1]。中共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发〔1989〕14号）首次正式确认了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其中第二十三条指出：“民主党派应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对成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国情教育以及民主党派同中共长期合作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同时，该意见要求：“办好中央和省一级的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列为社会主义学院的必修课。政府应从师资和经费上给予切实支持。”通过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帮助成员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以适应其作为参政党的需要，这是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发〔2005〕5号）第二十八条指出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2012年2月2日，《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发〔2012〕4号）第二十八条要求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帮助优化队伍结构、选好配强领导班子，为他们开展教育活动、搞好学习培训、进行实践锻炼创造必要条件，支持民主党派发展和培养符合各自特色的代表人士。2015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其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建设，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同样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专门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思想政治建设的意义、内涵、任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二）建设形式多样化

从各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实践来看，思想政治建设的形式多样^[2]。具体说来，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其一是各种类型的主题教育、专题讲座、研讨班等集体学习和培训活动；其二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代表性人士积极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其三是不断加强各级各类新型智库建设，积极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其四是积极组织竞赛类活动；其五是树立典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其六是组织各种形式的思想讨论活动。此外还通过线上线下交互活动，凝聚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如，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突破传统工作方式，结合新媒体发展，努力构建包括“微信号”“微动漫”“微电影”“微阵地”“微活动”在内的“五微一体”统战工作思想政治建设新模式，通过强化线上平台建设与线下阵地建设，在思想政治建设中进一步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夯实基础。调研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坚持以民主党派工作品牌创建工程，强化品牌意识，推动党派工作理念创新，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建设。如民革连云港市委、九三学社连云港市委积极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民革“中山读书苑”与读书基地，“九三读书会”已形成较成熟的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品牌，取得了较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三）认识进一步深化

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对思想政治建设的认识不断提高，通过完善自身教育机制调动民主党派

成员参与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参政党成员的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他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抱有充分信心;社会责任感强,对社会政治问题敏感。此外,各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开始向制度化轨道迈进^[3]。各民主党派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加强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和自我教育,通过深入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形势政策任务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进政治认同,深化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总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仍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数量和结构都已发生深刻变化,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的政治思想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各项具体政策,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普遍增强,但也存在思想意识多元化、政治共识和政治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4]。在新时代,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其一是实效性有待提高。与参政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相比,思想建设相对滞后,实效性不足,具体体现在:方法的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的可行性较差,思想建设成果的可靠性偏弱^[5]。思想政治建设由于政治性、政策性强的特点,不但不易取得明显成绩,而且稍有不慎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往往重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而淡化思想政治建设。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形式单一,趋同性强,缺乏创新性。有的领导干部甚至认为思想政治建设是一项虚的工作,缺少主动抓的积极性、责任心和紧迫感。

其二是覆盖面有待拓宽。由于受时间和经费限制,一些活动的参与主体大多为骨干成员,致使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活动集中在小部分成员上,覆盖面有限。一些新加入的民主党派成员对统战历史的了解不多,统战理论欠缺,政治敏感度和政治鉴别力有待提高。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在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中没有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应用^[6]。离开系统化的学习内容和常态化、信息化工作机制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是不深入不全面的。

其三是评价标准有待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成果评价标准单一,缺乏科学性。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人的思想是无形的。因而相对于其他工作来说,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绩难以量化,难以选取合适的指标予以直观呈现。因此,写文章、办会议、学文件这些指标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衡量标准,但这也只能说明工作量而非工作成效。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出“虚空”的特点。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逐渐成为“表面工作”。此外,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联系实际不紧密,“吸引力”不足;工作欠方法,“感染力”不强;重视和发挥广大成员整体作用不够;部分党派成员对参政党作用的发挥缺乏信心^[7]。实际上,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具有自身规律性。只有尊重这种规律性,遵循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加具有实效性。

其四是学习机制有待强化。政党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人类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影响着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先进的政党更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政党推动政治发展的方式也是多样的。通过政治动员,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社会化是其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功能之一^[8]。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无疑要在政治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进步性,在持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推动政治发展。然而,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学习机制不够完善,在学习内容上缺乏足够的系统性、计划性和科学性。个别基层组织“收发室式”地机械落实上级的学习指示、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少有创新和反思,忽略了对党派成员自身的思想反映,导致思想政治学习的盲目性和重复性,缺乏主动性、规范性和整体性。个别地方组织缺乏强有力的政工队伍,部分党派成员对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缺乏深刻认识。

二、“培根”：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支撑

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思想政治建设的分析框架既可以借鉴中共党建的理论和经验，也要在吸收 1999 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加强自身建设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成果和精神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新时代，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筹，进一步整合和拓展具体内容，以理论建设为先导、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能力建设为重点、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形成集基本理论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和政党文化建设等为一体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体系。

（一）厚植政治理论根基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立足于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和发展的需要，着力于构建能够解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政党政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而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建设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社会科学虽然也有科学性，实际上主要是观念学，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来自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总结，说到底是一种地方性知识。”^[10]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地方性知识，因为西方兴起，就变成一种所谓的“全球化知识”。我们观察问题、观察新经验的角度和出发点，通常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形成的新经验与既有理论完全不相符，在既有理论坚持者看来，这个新经验大概就被认为是没有生命力的。从国家安全角度看，话语权其实就是以政治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权力^[11]。丧失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意味着要“挨骂”，甚至还要“挨打”。可以说，世界上任何政党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民主理论和政党及政党关系理论，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根基^[12]。民主党派理论建设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着力构建不同于西方反对党理论的中国参政党理论框架、核心概念和话语体系，从而为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中，理论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理论是思想的先导，而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和动力，指引着行动的方向。在新时代，理论建设的重点是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理论体系。

（二）筑牢政治理念基础

2006 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被认为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中具有主导作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建设的灵魂工程。同样的，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13]。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构成要素和政治灵魂，必然反映一个政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发展，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共同历史任务，是巩固多党合作思想基础的客观要求，是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进步性、正确履行职能、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参政党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14]。价值观是现代政党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核心价值观代表了政党广大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在政党意识中处于最深层、最本质的地位^[15]。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遵循者和实践者，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独具特色^[16]。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基础，使其成为思想

意识中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生活实践中的行为准则。

（三）完善政治理论体系

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其实就是对政治现象如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政治理念、政治意识、政治行为等的一种理性认识。换句话说，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项“培根”过程，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确立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应有的政治理性认识、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一部分，是各民主党派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思想道德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等手段，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政治意识和理论水平、树立参政党意识和提升参政党能力的过程。其目的是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因此，要不断完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相应政治理论体系，引导民主党派成员形成正确的政治理性认识、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价值观念，从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学者认为，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教育应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以及方针政策开展，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使党外人士深入了解中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政策，在思想价值取向上更加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共的领导，更好地促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一是对政党制度的学习，二是对重大理论的学习，三是对方针政策的学习，四是对先进人物的学习^[17]。可以说，不断完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政治理论体系，也就是要在理论上把握好多党合作的政治理论发展方向。

三、“养心”：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路向

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是一个“种德”和“养心”过程，需要引领、交心和涵育。

（一）厘清方位和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与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目标具有某种同构性，它们所回答的都是民主党派建设的方向与目标问题。

一是明确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以及方针政策不断强化学习，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政党协商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增强新时代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认同感。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是不断增强广大成员对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历史也是不断增强政治认同和政治共识的历史。在新时代，要运用文化的力量在增进民主党派对爱国主义传统、国土意识、国家至上理念、国家象征符号及礼仪庆典等的认同上下功夫^[18]。基于文化的政治认同具有深层的影响力，实际上是使这种认同嵌入人的存在内核。

三是提升新时代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这就要结合现实形势和任务，加强多党合作理论与政策的教育、本党派的党纲党章教育以及历史传统教育，提高党派成员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使其明确自身作为参政党一员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方面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现代社会中一切政党都应履行的基本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还需要激活民主党派的政党特性，提高政党意识，为强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供思想政治动力。激活民主党派的政党特性，提高政党意识，有利于纠正那种把中国的民主党派看成“参谋党”“建议党”，甚至是“卫星党”^[19]“花瓶党”等等的错误认识。提升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还需摒弃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消极影响，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点和特点，澄清对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些模糊认识，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拓展内容和渠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整合和拓展具体内容。

一是在多党合作优良传统教育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各自党派的历史和章程，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风雨同舟、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划清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界限，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认清西方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虚伪性和反动本质，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为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二是在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中扩大政治共识。统一战线因其致力于解决“人心”问题，而被认为是最大的政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只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好统战话语权，讲好统战故事，才能真正有效地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不断完善协商式治理^[20]。在统一战线中加强形势、政策和任务教育，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其基本任务是引导民主党派成员从大局出发，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中共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理顺情绪，扩大共识，增强信心，服务大局。西方敌对势力往往把矛头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多党合作制度，竭力歪曲和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指责我国的统一战线“法宝”^[21]，企图用西方民主取代社会主义民主。对此，我们要结合参政党的时代特点，建立层次清晰、权责明确、信息通畅、对话及时、反应快速的思想政治动态处理机制，确保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定力。

三是在政党文化建设中涵育同心意识。政党文化建设是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基础工程，其重点是培养参政党意识，形成民主党派成员共同的价值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激发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热情。在政党文化建设中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侵蚀，坚定正确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同时，要强化成员联络机制，及时了解党派成员的思想变化情况，倾听党派成员的各方面呼声，主动协助其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其合法权益，寓政治建设于办实事之中。

（三）丰富方式和方法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民主党派成员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这就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22]，需要在丰富多样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中推进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

一是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201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第一部党内法规。《条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依托好社会主义学院这一主渠道和主阵地。

二是发挥网络平台在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远程辅助功能。民主党派成员大多工作繁忙，很难挤出时间参加定期集中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但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是动态的，随着形势变化，新的任务或要求将陆续提出，这就要求民主党派成员必须时时关注并及时回应。网络的远程沟通功效因其不受时空限制可以使一些常见问题迎刃而解，因而它也成为当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是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态势分析制度。这就要定期就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态势分析，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掌握思想政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权。

四是发扬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自我教育是民主党派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自我教育就是提倡各民主党派在思想政治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增强积极性、主动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切实做到自

己发现问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四) 强化动力机制

内外动力相结合形成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这是提升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实效性的根本所在。

一是在学习平台上增强动力。要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和交流活动,从理论上提高和加深对参政党地位、使命、作用的认识^[23],全面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坚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政治信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共识,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导入牵引力。

二是在宽松氛围中增添活力。这就要营造宽松氛围,在思想政治建设中解放思想、尊重规律、坚持原则和大胆创新。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有自身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掌握和遵循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把握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面临的新挑战,并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以不断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在联动机制中增加合力。建立民主党派纵向联动、横向互动机制,共同做好思想建设工作。建立与民主党派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的联动互动机制,积极主动同中共党组织加强联系,争取中共党组织的支持,共同做好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时代,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与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必须进一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拓展网络统一战线工作^[24]。只有把线上和线下两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适应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四、结语与讨论

在新时代,面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面对成员结构和观念、意识的变化和复杂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新”^①“三好”^②的新要求,进一步增强政党意识和责任担当,准确把握新时代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的着力点,切实做好“培根”与“养心”工作,真正做到“浇花浇根,交人交心”。

第一,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以执政党为师,结合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以进步性教育推动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不断增强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治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加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

第二,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寓思想政治工作于各项活动之中,努力做到育导结合、情理相济。通过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和党史教育活动,如“观故居,增共识,继承与发扬民主党派优良传统”等形式,结合“一次座谈会、一次媒体集中刊发纪念文章、一次专题培训班、一次现场教学”等活动和解放思想大讨论,不断增强“四个意识”,把思想统一到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第三,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结合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这三大职能,在发挥职能过程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使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与善议政、会协商的职能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

第四,以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带动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推动民主党派能力建设和能力提升,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过程中加强内部监督,切实发挥民主党派内部监察委员会的

① 即多党合作要有新气象,思想共识要有新提高,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参政党要有新面貌。

② 即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作用，不断增强自我监督与自我净化能力，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无缝对接，促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

第五，健全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动态分析机制，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及时收集和反映思想政治动态信息，对苗头性、倾向性思想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必须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的同时，不断拓展网络平台和互联网渠道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

第六，新时代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由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队伍引领。需要加强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这一基础性工作，培养既懂得统一战线基本规律又熟悉统一战线实际工作的专业化队伍。

参考文献：

- [1] 张献生.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3): 4-13.
- [2] 于洋. 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J]. 大连干部学刊, 2018(9): 23-27.
- [3] 王彩玲. 参政党思想建设研究[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2: 196.
- [4] 胡建兰. 民主党派新生代成员的政治思想特点研究[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99-103.
- [5] 姚俭建. 参政党思想建设的实效性与其路径选择[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2): 5-9.
- [6] 李其春. 参政党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及对策研究[J].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1): 18-19.
- [7] 张韶华. 影响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研究[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2): 18-23.
- [8] 戚洪国. 政治发展的组织保证——论亨廷顿的政党政治思想[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1(1): 29-33.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9.
- [10] 杨光斌. 构建解释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3): 17-22.
- [11] 杨光斌. 思想话语权事关国家安全[N]. 人民日报, 2018-03-08(7).
- [12] 王小鸿. 新型政党制度的根与魂[J]. 紫光阁, 2018(4): 9-10.
- [13] 王可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主党派思想建设中的运用[J].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2): 53-56.
- [14] 宋村珠. 参政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任务与途径[J].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3): 11-13.
- [15] 李仁质. 关于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考[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6): 3-6.
- [16] 廖继红. 民主党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特点及路径[J]. 民主, 2011(2): 11-13.
- [17] 严丽娟. 试论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思想教育[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1): 33-36.
- [18] 刘菊香. 以文化认同增进民主党派成员的国家认同[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5): 45-47.
- [19] Seymour, James D. . China's Satellite Parties Today[J]. Asian Survey, 1986(9): 991-1004.
- [20]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68-76.
- [21] Marcel Angliviel de la Beaumelle,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Magic Weapon" at Home and Abroad[J/OL]. China Brief. 2017, 17(9), Jamestown Found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595f4ec84>.
- [22] 聂志平.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探析[J]. 党史文苑, 2010(5): 65-67.
- [23] 钱再见.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能力及提升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4): 58-67.
- [24] 林华山.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图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1): 19-26.

责任编辑: 孙德魁

将民营企业家 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

蒋德海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不断加强。但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险仍较高。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险成为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之一。这与我国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治模式即以刑法为主导的控制型经济管理模式有关。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下，刑事法律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最大风险。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计划经济传统的惯性影响；有的刑法条款高含风险；从众心理增加了刑事法律风险；对中国刑法特点的不重视加大了刑事法律风险；违法和犯罪没有严格区分，违法问题极易变成刑事问题；刑事司法实践的问题加大了企业的法律风险；相对于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相对宽松。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中确立以民法为主导的市场模式。

关键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企业家犯罪；刑事法律风险；法治模式；市场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80-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法律保护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2]当前，由于中国市场法律和法治仍有待充分完善，也由于企业家自身的法治素养有待提高，中国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仍较高。

DOI: 10.13946/j.cnki.jcqls.2019.01.009

作者简介：蒋德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党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检察学基础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立法学会常务理事。

引用格式：蒋德海. 将民营企业家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80-87.

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多重矛盾问题碰头的结果^[3]。法律风险是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稳定预期，弘扬企业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纪检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时需要企业经营者协助调查，这种情况下，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我多次强调要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最近人民法院依法重审了几个典型案例，社会反映很好。”^[3]

学界对企业家的法律风险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有一定研究。有的研究以相关个案为例研究了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法律风险问题^[4]。有的研究梳理了企业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刑事法律风险所涉的主要犯罪类型^[5]。还有的研究分析了我国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成因^[6]。这些研究对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险）的聚焦不够充分，对成因的分析缺乏完整性，关于对策的指出缺乏系统性。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聚焦和分析。新时代，破解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既要引导民营企业家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又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为民营企业家营造公正完善的法治环境，依法使民营企业家免于不必要的法律风险特别是刑事法律风险。

一、民营企业家的最大风险是刑事法律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民营企业家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作出了重大贡献。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全国工商联2018年10月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共同推荐宣传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对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者进行表彰。受表彰对象中，民营企业家是入选的主力群体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一批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受到刑事司法的制裁，他们创建的庞大企业也往往随之瓦解。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民营企业家个人和企业发展中法治的遵守状况有关，也有我国法治发展完善程度和模式有关。一批有影响的、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从企业家成为罪犯，既有个人法治素养因素，也有整体法治发展程度因素。特别是，这与我国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治模式即以刑法为主导的控制型经济管理模式有关。在这种控制型的经济模式之下，刑事法律风险已经成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最大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理解法律风险，减少法律风险，避免不合理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般来说，企业的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预见但没有预见所导致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对企业来说，只要不违法，就不存在风险。从这意义上，法律风险是可控的。学习法律、了解法律就是为了防范法律风险。不仅如此，法律还是企业安身立命的保障，严格依法经营，不但不会有法律的风险，反而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现阶段企业家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刑事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以刑法为主导的经济控制模式导致的，具有较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加上一些法律条文的模糊性、空白性以及合理性、正当性的缺乏，我国市场经济中不少经济行为不具有可预见性，加大了经济活动的法律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在企业的法律风险主要是来自传统经济控制模式下的刑事法律风险。

通常情况下，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涉及的是民法。刑法一般不轻易介入市场。当代世界，凡是涉及到经济犯罪的立法都极为慎重。因为市场有基本法——民法存在。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即使是刑法也不能触犯民法，要以保障民法的有效实施为前提。市场经济是以民法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民法对市场经济的主体及其市场的运行，有极为规范化的制度引导和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中就没有刑事责任。如美国伯纳德·麦道夫金融诈骗案，堪称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骗局”。伯纳德·麦道夫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行骗 20 年之久，欺诈金额累计 650 亿美元。由于其公司奉行“赢者通吃”，诱使高级管理者在投资和会计程序方面冒更大的风险，其结果是虚报收入和隐瞒越来越多的债务，最后破产。2009 年 6 月 29 日，纽约联邦法院判处伯纳德·麦道夫 150 年有期徒刑。为什么一个金融骗子能够行骗 20 年之久？法律包括刑法的谦抑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市场经济中不是不能有刑法的介入，而是刑法的介入在立法上必须极为慎重，在司法上必须有严重的后果和确凿的证据。

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企业最大的法律风险应当是民事风险。真正的企业家都会把企业的信誉视为企业的生命。信誉全失是企业家、企业最大的法律风险。美国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为伯纳德·麦道夫做假账。2002 年美国休斯敦联邦地区法院对其罚款 50 万美元，并禁止它在 5 年内从事业务。这次裁决使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大型会计公司。但 2005 年美国最高法院撤销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妨碍司法的判决。即使如此重大的问题，包括做假，该公司后来也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企业信誉全失，2002 年 8 月 31 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宣布从即日起放弃在美国的全部审计业务，正式退出了其从事 89 年的审计行业。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没有比彻底丧失市场更为严重的惩罚和责任。

中国市场经济仍处于转型之中，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理念和机制还未充分形成。企业守法水平有待提高、权力寻租、法律模糊不清等因素交叉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法律风险。

二、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高的原因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计划经济传统的惯性影响。

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格局。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仍对当前我国经济活动留有惯性影响，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来加以消除。计划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对经济活动进行深度控制，与之相应的是刑法发挥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涉及市场经济及企业活动的条文有 50 多条，几乎贯穿企业设立、注册、终止和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尤其在 1997 年颁布实施新《刑法》以后，国家加大了对经济领域的刑法调整。

主要用行政管制和国家控制的方式来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应该主要靠刑法来调整。这涉及我国刑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目标。我国有的市场经济罪的刑事立法仍可商榷。其中，非法集资罪就是一例。集资、融资是企业的基本市场行为。规定只有通过银行或政府认可才是合法集资，虽有利于防范债务风险，但不符合市场的基本原则。企业凭自己的信誉集资，公众凭自己对企业的信誉和发展前景的认可而投资，双方的经济行为建立在市场的诚信之上。真正的市场要靠诚信来引导。可能会有不诚信的企业，但它承受的只能是市场风险，而投资者作为投资行为，同样要承担风险。对集资、融资行为轻易以刑事介入，对企业家和投资者都不公平，不仅扩大了企业家的法律风险，增加了公权寻租的机会，也大大增强了公众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经济上一些非法行为也不一定就是犯罪，不一定要

用刑法来调整。企业集资是市场行为，应更多地通过经济规律、公平竞争、诚信来引导。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引导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比如，政府要让公众放心，可以率先投资某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公众看见政府投入就会积极响应。这既能够保证企业有充分的集资机会，又能够让公众建立基本的投资风险意识，政府与公众一样承担的也是投资风险。既然是投资就有风险，正常风险不等于欺诈，绝对不能因为集资目标没有实现就按照欺诈来对待。

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但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靠控制形成。市场控制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没有厘清。市场投资什么，市场如何运行，市场的方向在哪里，这主要是市场的职责，是市场中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企业的职责，当然也是一种风险。属于市场的应该还给市场，政府只做自己应该做的。政府在市场中的切作为，都必须有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此外，由于法律和制度仍有完善空间，政府的扶持也很容易造成骗取国家补贴的现象，这对埋头干实事的企业不尽公平。由于外部环境的差异，现在市场经济和 19 世纪下半叶的市场经济相比，不是更加需要自由，而是更加需要公平。控制型市场是不公平的，不仅容易产生公权寻租的机会，也增加了企业的法律风险。

第二，有的刑法条款高含风险。

比如，《刑法》中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就有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我国《公司法》对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注册门槛。假设一家经营性互联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 万元，如果其在注册过程中欺骗了主管部门（比如让注册代理公司垫资），就会涉嫌此罪。但公司应该不应该有注册资本，有多少注册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注册资本的目的之一是对外明示公司的经济责任。没有注册资本意味着不能以明示的经济义务对外承担责任，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责任。欧美国家对注册资本基本不设门槛，就是这个道理。同时，法律规定必须有注册资本，欺骗主管部门就是犯罪，更有一个正当性问题。设立公司的目的是进入市场，如果法律对设立公司的注册资本设定过严，会将一些没有经济实力的主体排斥在市场之外，但也会让不少人铤而走险——如果这些人需要市场生存。据非官方统计，中国企业有 90% 注册资本不实^[7]。这本身说明了我国注册资本立法的问题。实践中触犯这个罪名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依托代理公司垫资后撤回垫资款，办理假验资，或者是验资完成后将资金撤出等。从市场经济的活力看，开放注册资本更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个主体有多少资本就注册多少，没有资本，只要有愿意也可以成立公司。市场法治更要关注的是市场运行中的规范性问题，比如如何保障和维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在多大的程度上保障市场主体的自由，让企业家有更大的安全感等。我国正在推进的自由贸易，就是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由，而自由贸易包含自由设立公司。

第三，从众心理增加了刑事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2 700 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 6 500 万户，注册资本超过 165 万亿元^[3]。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 以上的企业数量^[3]。伴随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的问题是，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有各种各样的不合法行为。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合法行为具有一定普遍性，并且产生一定的从众效应。民营企业的这类行为包含着极大的法律风险，其结果通常要由企业承担。某地 2017 年曾经面临大规模的企业拆违动迁。不少企业入驻已经 10 多年，当年是该地区招商引资，让他们“先上船后买票”。这些企业由于现实的原因，房产、地产证等均没有办出。虽然这些企业手上都有与政府的相关合同，但由于普遍存在程序问题，最后都选择了撤离。还有一种现

象，有的企业越做越大，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企业家也成为当地名人。当地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分享上市红利的考虑，推动本地企业上市。在上市后，随着曝光度和信息披露程度的提高，其违法行为往往就会暴露，也可能带来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

第四，对中国刑法特点的不重视加大了刑事风险。

部分企业家只关注赢利，对《刑法》不重视、不了解，增加了犯罪的可能和风险。刑事法律对人的行为具有禁止、允许和授权自行约定的规定，当行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违反这些刑事法律并按律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从法律风险来说，我国企业家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刑事风险。中国企业家必须充分意识到目前中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刑事风险的特点。一是中国规范经济生活的刑事法律极多，仅《刑法》中就有 50 多条，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这些罪名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等。二是我国《刑法》的一些规定不太明确，给刑事司法部门的公权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比如经济合同和经济犯罪，赢了就是经济合作，输了就可能是经济犯罪。A 省一家企业和 B 省一家企业合作，合作不成，B 省企业老板状告 A 省企业老板欺诈，A 省警方介入后，认为是经济纠纷，对当事人予以取保候审。但即使在取保候审期，B 省警方把 A 省企业老板抓到 B 省，后来判处无期徒刑。三是除《刑法》以外，我国不少单行法律中也设定了许多刑事法律规范。比如，《商标法》《专利法》《土地法》《文物保护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均有关于经济生活的刑事法律规范。

第五，违法和犯罪没有严格区分，违法问题极易变成刑事问题。

以集资诈骗罪为例，法律规定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就有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法律规定的量刑起点是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但把主管部门批准及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确立为刑事犯罪的两个要素存在不合理之处。募集资金是企业最基本的市场活动。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家，募集资金本身是一种市场的自由。而募集资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如果企业募集资金以后，企业经营的目标没有实现，那属于投资的风险，应该由民法来调整，不应该属于犯罪问题。刑法把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确立为刑事犯罪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刑法和民法的界限。

从法理来看，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募集资金的行为完全属于企业的经济活动。企业需要募集资金，社会公众愿意投入，风险由双方承担。同时，企业不能向不特定的社会人募集资金的问题，有待于在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中解决。此外，即使需要经过政府或有关部门的批准，则批准不批准的问题，也只是合法和不合法的问题，不应该由刑事法律来调整，更不应当把不合法的问题和犯罪问题等同起来。有的地方因 P2P 问题引发的金融上访案也是这个问题。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少金融企业纷纷开展 P2P 业务。但企业一旦不能兑付，往往变成金融诈骗，企业法人甚至一些业务员也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国际社会上 P2P 业务也很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创新和创业，但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如果创业失败就变成犯罪，就可能会大大遏制社会的创新激情。

第六，刑事司法实践的问题加大了企业的法律风险。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堡垒。由于司法体制的问题，司法公正始终是我国社会的热点之一。我国刑事司法不断完善，但在实践中仍有薄弱的地方。刑事司法实践发展中的问题客观上加大了企业的法律风险。我国经济生活中也有这方面的案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坚持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全面保障司法公正。

第七，相对于民营经济，国有企业的刑事风险相对宽松。

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宪法虽然规定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国有资产的刑法规制上却相对宽松。如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等，均存在不少需要明确的问题。现有法律规定相对宽松，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法目的难以体现，刑法的威严没有显现出来。这三个罪名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并主要涉及国有企业管理者。由于国有资产是人民共有的财产，这三条的立法显得不够严厉。笔者认为，比如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即使公开地低价折股也不合理。低价折股不是针对所有的公民，仅仅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这对国有资产的神圣性是一种挑战，涉嫌私分公共财产。本条严格意义上不是徇私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公平地低价折股的问题。国有资产的折股应当具有开放性，对每一个公民都有效。但现行相关立法倾向只要公开就是合法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这也是近年损害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法对“私分”的界定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不管是否经过国有企业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同意，瓜分国有资产都是不合法的。把罪与非罪的界限确定为领导的同意，违背法治的原则。这些法条的公平性和正义性都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三、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必须确立以民法为主导的市场模式

中央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也都表示，不能动辄用刑法对待市场经济行为。这为我们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的法律风险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进一步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加以正视。

第一，发展民营经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超越“剥削”的原罪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民营经济“剥削”的原罪观念和习惯仍然还有很深的影响。新时代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从“剥削”的原罪观念中解放出来。必须明确，在依法的前提下，利用资本创造价值和利润不是剥削，而是具有正当性。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理论，钱有生钱的功能^[8]。利息具有正当性，不是剥削。同时，资本创造利润是一种迂回生产。企业家运用资本的力量创造利润，也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种表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9]而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加以改变。通过资本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都能创造更多的价值。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融资增资就是为了提高回报率、创造更多更好的价值。当然，强调企业家通过资本创造价值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剥削。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剥削主要是一种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现象：“劳动为富人产生了奇迹般的东西，但为工人产生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为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使工人变成了畸形。”^[10]因此，民营企业投资办企业的行为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光荣劳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继续解放思想，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的社会舆论和法治环境。

第二，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发展市场经济应当以民法为主导。

经济活动是民事活动，市场经济是民事经济。市场经济应该主要靠民法调整。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规范市场活动的主要法律应该是民法，而不是刑法。用刑法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落后的法治理念。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认为，刑法作为调整社会的主要形式是法治发展的低级阶段。近代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民法的大发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世界各国民法的繁荣就是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经济和民法的繁荣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往往民法越繁荣，市场经济就越发展。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还意味着，市场经济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通过民法的方式来解决，绝不能动辄以刑法来解决经济纠纷。刑法、民法不分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应重新审视我国的市场立法，尤其是关于市场的刑事立法，刑法介入经济纠纷必须极为慎重。大多数社会、经济纠纷不需要用刑法来调整。社会、经济纠纷反映的是人性的缺点。克服人性的弱点应当主要靠教育、引导和宣传。刑法解决的是人性恶的问题，恶行必须依靠刑法来调整。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可能会有一些缺点，但如果没有充分的必要性，一般不应用刑法来调整经济纠纷。刑事立法不得与民法相抵触。民法能够解决的，不应动用刑法。经济纠纷动辄变为刑事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以民法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理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必须看到，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民法问题，近年经济领域中有的大案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民事纠纷，有的甚至还没有构成纠纷。

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要关注市场经济的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是人民的事业。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改革目前不合理的以刑事立法为主导的市场管理模式。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要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已经有 400 多年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功的制度。我们应结合国情进行借鉴，调整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刑事控制型市场立法导向。尤其是争议极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等，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安定、创新和活力，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加以修改。

第三，属于市场的要还给市场，改变对市场的控制模式。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对如何发展市场经济，西方一直有所谓凯恩斯和哈耶克之争。前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后者强调要保障市场的自由。但即使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强调的也是通过政府的调控进一步促进市场的公平。这是因为社会公平建立在市场公平的基础上。没有公平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平的社会。从这意义上说，国家通过立法限制市场的自由，正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市场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市场管理中还有强烈的计划控制习惯，而不恰当控制的结果会影响中国市场的自由和公平性。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民营企业开放。但是必须看到，即使在今天发展民营经济仍然有很多障碍。新时代，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变市场控制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3〕}

第四，完善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责，加大公权限制和违法成本。

法治政府就是执法政府。市场之所以需要政府，就是要政府通过严格执法，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行政严格意义上的职责就是执法。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政府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保障市场的公平，是法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定位。而唯有严格执法才能保障市场的公平正义。政府执法以外的功能都为了或必须有利于执法。政府部门是不是严格执法，执法是不是能够有效体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不仅是法治彰显的标志，也是法律有权威的象征。通常讲的行政管理，其实就是执法。行政机关通过执法来实施管理，保障宪法和法律完整和统一的实施。而一般管理是社会的使命，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是社会。一般经济管理则是企业家包括行业

协会的事。李克强总理指出：凡是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凡是市场能做的都要由市场来做^[11]。市场是企业的“战场”，属于企业。企业的发展包括开拓创新要由企业自己决定。政府不能当企业的家、做企业的事，更不应当动辄对企业的事务包办代替。政府过多地介入市场，不但有可能导致寻租机会的增加，而且有可能影响市场公平程度。

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明确政府的职责，要限制和规范权力，减小权力寻租的机会。权力越多，市场的成本就越大。除非必要，权力不能介入市场。市场自己能够解决的，就不需要权力。市场上如充斥着大量的权力，必然扭曲市场。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红顶商人”现象。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恶俗，也是中国宋以后市场经济始终未能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权力不恰当介入市场的运行，必然破坏市场的公平。明确政府职责的目的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只有政府的权力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企业才能有经济的自由。限权的目的是给企业更大的自由。企业有自由，才会有更大的创新。限权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明确和加大政府的责任，尤其是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责。

第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公正的司法保障市场经济。

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司法对民营企业造成冤案，要求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是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防范法律风险，对企业家来说还有一般层面的学法用法问题。企业家要通过制度建设知法懂法，在经济活动中不要犯低级法律错误。企业家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要对本行业及相关行为的法律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对比较模糊的法律，要尽可能明确其界限，防止不自觉地坠入违法犯罪。对于重大的法律问题，可以引入专家意见，做到心中有数。此外，建立制度，理顺流程，将合同引入企业内部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协助管理层制定科学合理的公司管理制度、授权制度、制约和监督制度等，都有助于在一般层面防范法律风险。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EB/OL].（2013-11-12）[2019-01-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3455.htm.
-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EB/OL].（2014-10-23）[2019-01-01]. <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3/c64094-25896724.html>.
- [3]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N]. 人民日报，2018-11-02（2）.
- [4] 赵军.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控制困局透视——以2013年若干“影响力个案”为例[J]. 法治研究，2014（3）：71-77.
- [5] 刘昕. 企业家面临刑事法律风险所涉犯罪的主要类型[J]. 法制与社会，2016（7）：261-263.
- [6] 余家骏. 试论我国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成因及防控对策[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50-54.
- [7] 杨涛. 注册资本取消了，虚假出资罪何时休[N]. 中国青年报，2013-10-29（1）.
- [8] 庞巴维克. 资本与利息[M]. 何崑曾，高德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
-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50.
- [11]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 释放投资潜力发展活力部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助力创新创业升级“中国制造”[N]. 人民日报，2014-11-06（1）.

参政党网络影响力研究

——基于 796 家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天舒 张栩栩 蒋 锐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1)

摘 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主党派在“互联网+”时代如何运用新技术更好履行其政治职能与社会职能, 对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促进新型政党关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选取了八个民主党派及其中央、省、市三个层级的 796 家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数据, 聚焦民主党派的网络功能的特点与差异, 采用社会实验法、内容分析法和多层回归分析法, 分析了各民主党派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各一周的微信影响力指数(WCI)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民主党派网络功能与影响力存在层级与区域差异; 提升民主党派网络功能的互动性与实时性, 加强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建设, 有利于增强其网络影响力。

关键词: 参政党; 民主党派; 网络影响力; WCI 指数; 互联网+; 新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9) 01-0088-07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各民主党派通过党内民主和参政议政的发展, 充分吸纳各社会阶层和各功能界别群体的政治参与, 进行政党维度的利益整合、“众意”提炼和公共表达, 日益发挥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和好同事”^[1]功能。对民主党派功能的研究始于 2007 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该白皮书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命题。其后, 有的学者从“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视角, 分析了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等功能; 有的学者对我国民主党派功能的定位与开发进行了研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10

作者简介: 张天舒,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张栩栩,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蒋锐,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参政党网络能力建设与评估体系研究”(19BYSJ03)

引用格式: 张天舒, 张栩栩, 蒋锐. 参政党网络影响力研究——基于 796 家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 88-94.

究；有的学者对“政党功能”与“参政党职能”进行了辨析。但对民主党派的功能研究并未形成完整的“面”^[2]。本文主要将民主党派的功能分为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政治功能包括政治参与功能、政治监督功能，社会功能包括社会服务功能和社会表达功能。文中阐述的民主党派的网络功能是指在网络环境下，民主党派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综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4]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于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以微博、微信与手机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兴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中国已经步入新媒体时代。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已经超出单一社交范畴，成为平台级入口。八个民主党派^①顺势而为，创建了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目前，经过一定时间的维护，民主党派的官方认证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官微”）已拥有特定、稳定的粉丝群，成为网络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逐渐成为网络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关注各民主党派如何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整合资源，拓展网络政治空间，为网络统战工作贡献力量。党的十九大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是民主党派发挥职能作用的关键时间节点。选择各民主党派在党的十九大前后一周发布的官微数据，进行准社会实验的实证比较，可以集中衡量民主党派在党和国家重要时刻所发挥的网络功能状况。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民主党派网络政治参与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还没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研究脉络。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民主党派网络政治参与中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分析”，有的学者以民主党派的职能分类为切入点，研究了民主党派在网络时代如何履职^[5]；有的学者从个体视角出发，研究了网络时代民主党派成员应具备的素质、行为及态度^[6]；有的学者从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出发，研究了网络语境下民主党派面临的挑战^[7]。这些研究丰富了学界对民主党派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认知，但也存在过于偏重理论化、与现实脱节，理论总结多、具体论据少，结合特定网络载体数据的实证研究更少等不足。本文选取了微信公众号这一网络载体，从民主党派网络统战功能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民主党派在党的十九大这一重大会议前后所发挥的网络功能及其网络效应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采用清博大数据网站的“微信影响力（WCI）”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总阅读数（R）、平均阅读数（R/N）、总点赞数（Z）、发布文章数（N）、最高阅读数（Rmax）、最高点赞数（Zmax）、平均点赞数（Z/N）和点赞率（Z/R）八个指标计算得出，反映的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在网络上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受网民关注程度。R 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的阅读总数，Z 为评估时间段内所有文章的点赞总数，d 为评估时间段所含天数（一般周取 7 天，月度取 30 天，年度取 365 天，其他自定义时间段以真实天数计算），n 为评估时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数；Rmax 和 Zmax 为评估时间段内账号所发文章的最高阅读数和最高点赞数。具体计算公式如表 1：

① 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文中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文中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文中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文中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文中简称“农工党”）、中国致公党（文中简称“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文中简称“台盟”）。

表 1 WCI 指标计算公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标准化方法
阅读指数（80%）	日均阅读数 R/d	40%	$\ln(R/d+1)$
	篇均阅读数 R/n	45%	$\ln(R/n+1)$
	最高阅读数 Rmax	15%	$\ln(Rmax+1)$
点赞指数（20%）	日均点赞数 Z/d	40%	$\ln(10*Z/d+1)$
	篇均点赞数 Z/n	45%	$\ln(10*Z/n+1)$
	最高点赞数 Zmax	15%	$\ln(10*Zmax+1)$

$$WCI = \{ 30\% * [0.85 * \ln(R/d+1) + 0.15 * \ln(10 * Z/d+1)] + 30\% * [0.85 * \ln(R/n+1) + 0.15 * \ln(10 * Z/n+1)] + 30\% * [0.85 * \ln(Rt/d+1) + 0.15 * \ln(10 * Z/d+1)] + 10\% * [0.85 * \ln(Rmax+1) + 0.15 * \ln(10 * Zmax+1)] \}^2 * 10$$

2. 自变量：图文发布内容、图文发布形式与官微功能设定。图文发布内容以民主党派基本职能为依据，划分为“参加重要会议及活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社会服务”“自身建设”“联络工作”“党的十九大相关”“转载文章”和“其他”。图文发布形式分为“视频形式”“图文形式”和“文字形式”。功能设定主要包括“是否开通留言板”和“菜单层级”。

3. 控制变量：“官微认证时间”“所属党派层级”“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指数”等。

（三）研究假设

第一组：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官微影响力存在差异。假设 1：党的十九大对官微影响力（WCI 指数）有积极影响。假设 2：党的十九大对民主党派官微发文数量有积极影响。假设 3：官微的运营层级越高，发布党的十九大内容数量越多。

第二组：官微属性与特征对 WCI 指数有积极影响。假设 4：官微的认证时间越早，WCI 指数越高。假设 5：官微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指数（GDP）越高，WCI 指数越高。假设 6：官微的运营层级越高，WCI 指数越高。假设 7：官微文章发布形式对 WCI 指数有影响。假设 8：官微文章发布内容对 WCI 指数有影响。假设 9：官微的功能设定对 WCI 指数有影响。

三、数据与分析

（一）样本信息

本研究选取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官微样本 796 个，其中中央级民主党派官微 8 个，省级民主党派官微 155 个，市级民主党派官微 633 个。样本的具体信息如表 2：

表 2 样本信息

样本结构	个数	百分比	样本结构	个数	百分比
党派构成			党派层级构成		
民革	100	12.6%	中央	8	1%
民盟	161	20.2%	省	155	19.5%
民建	130	16.3%	市	663	79.5%
民进	114	14.3%	少数民族地区构成		
农工党	109	13.7%	是少数民族地区	44	5.5%
致公党	71	8.9%	非少数民族地区	751	94.3%
九三学社	101	12.7%	自定义菜单层级		
台盟	10	1.3%	无菜单	312	39.2%
关注是否回应构成			一级菜单	130	16.3%
回应	180	22.6%	二级菜单	353	44.3%
不回应	614	77.1%	三级及以上	1	0.1%

（二）各民主党派官微差异分析

1. 民主党派官微认证时间分布。从认证时间看，“阳江民建”公众号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率先开通并认证为官微。80.4%的民主党派官微的认证时间集中在 2015—2017 年间，且呈递增趋势。这与微信自媒体的发展有关，体现出各级民主党派愈发注重网络传播渠道。除台盟的官微认证个数较少外，其他民主党派官微在认证时间和数量趋势方面无明显差异。

2. 各民主党派开通官微数量的层级分布。目前，各民主党派中央均已开通官微；除台盟外，其他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开通官微个数均在 15~28 之间，仍有增长空间；民主党派市级组织开通官微数量差异明显，其中民盟市级组织开通官微个数最多，而且除致公党和台盟外，其他民主党派市级官微开通官微个数均超过 100 个。

表 3 所属党派与党派层级交叉表

所属党派	党派层级开通个数		
	中央	省	市
民革	1	21	78
民盟	1	28	132
民建	1	19	110
民进	1	21	92
农工党	1	24	84
致公党	1	15	55
九三学社	1	24	76
台盟	1	3	6
合计	8	155	633

（三）假设验证

1. 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官微 WCI 指数的差异分析。表 4 数据为党的十九大前后各一周，民主党派官微 WCI 指数的描述统计量。全部样本观察值在党的十九大前的 WCI 指数平均值为 73.02、标准差为 90.96；在党的十九大后的平均值为 94.18、标准差为 93.38。表中平均值差异检验的 t 统计量值为 4.580，P 值小于 0.001。这表示党的十九大前后一周民主党派 WCI 指数有显著差异，假设 1 获得证实。而且党的十九大后的均值大于党的十九大前的均值，这表明党的十九大召开对民主党派官微产生了积极影响。党的十九大召开后这一周内，民主党派官微较党的十九大前一周更活跃，影响力指数值更高。

表 4 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官微 WCI 的差异^①

时间	Mean	个案	SD	最大值	最小值	t 值	Eta
党的十九大前	73.021	796	90.969	692.95	0.00	4.580 ***	0.114
党的十九大后	94.181	796	93.381	586.46	0.00		
总和	83.601	1592	92.760	692.95	0.00		

2. 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官微发文内容的差异分析。由表 5 数据检验结果可知，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发布内容中，自身建设、党的十九大相关文章及转载文章均有显著性变化，假设 2 成立。其中“自身建设”内容在党的十九大后均值小于党的十九大前，而“党的十九大相关文章和转载文章数量”是党的十九大后的均值大于党的十九大前。这反映出，民主党派积极关注党的十九大，并对党的十九大会议进行学习和宣传，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相关内容。而“自身建设”内容的减少，可以理解为日常发文重点与重大政治事件后发文重点的变换。党的十九大后，民主党派加大了党的十九大学习交流内容，造成党的十九大后有关“自身建设”的发文数量减少。其他内容的

① 表中 *p<0.05, **p<0.01, ***p<0.001。

发文数量整体变化无显著性差异。

表 5 党的十九大前后民主党派官微发文内容的差异^①

变量	整体均值	党的十九大前		党的十九大后		t 值
官微发布内容		Mean	SD	Mean	SD	
参加重要会议及活动	0.08	0.09	0.339	0.07	0.306	-1.551
参政议政	0.50	0.51	1.143	0.49	0.947	-0.406
民主监督	0.06	0.06	0.273	0.06	0.327	0.171
社会服务	0.53	0.53	1.027	0.56	1.360	0.613
政治协商	0.05	0.05	0.238	0.05	0.288	0.095
自身建设	0.74	0.88	1.781	0.60	1.105	-3.754***
联络工作	0.04	0.04	0.227	0.04	0.232	0.437
党的十九大相关	1.13	0.23	0.698	2.03	3.023	16.437***
其他	0.13	0.16	0.776	0.10	0.504	-1.915
转载文章	0.45	0.33	1.185	0.57	1.669	3.308**

3. 党派层级与“党的十九大相关”内容发布数量是否有显著性不同。对“党的十九大相关”内容发布数量这一因变量而言，F 值达到显著性水平（ $F=2.213$ ； $P=0.031<0.05$ ）。这表明所属党派层级之间就“党的十九大相关”内容发布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假设 3 成立。而具体哪些组别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需要进行事后比较。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就“党的十九大相关”内容发布而言，中央层级显著高于省级和市级层面，省级层面又显著高于市级层面。

4. 微信公众号的功能设定（是否有留言功能、自定义菜单层级）对 WCI 指数有影响。在表 6 民主党派官微影响力指数（WCI）的回归结果中，是否开通留言板的 Beta 值在党的十九大前为 0.085（ $P=0.003$ ），在党的十九大后为 0.070（ $P=0.017$ ），显著性水平 P 值均小于 0.05。这表明民主党派官微的留言板功能对 WCI 指数具有稳定预测作用。进一步分析留言板开通与否的 WCI 指数均值发现，开通留言板的指数均值为 91.578 3，比未开通留言板的指数均值（60.974 5）高出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开通留言板功能对官微 WCI 指数具有显著影响。自定义菜单虽没进入回归方程，但通过均值比较发现，菜单层级设定不同，WCI 指数值存在显著性差异。一级菜单显著高于无菜单，二级菜单显著高于一级菜单。这显示出民主党派的官微菜单层级设定对其 WCI 指数有显著影响，具有一级菜单和二级菜单的 WCI 指数值更高。综上，假设 4 成立，这表明增加与用户互动渠道的官微更为活跃，更能吸引用户、增加用户黏性。

5. 微信公众号的认证时间对 WCI 指数没有预测功能。日常认知觉得，微信公众号认证时间越早，管理者的运营经验越丰富，积累的用户越多，微信影响力越大。但是从微信影响力 WCI 指数的回归结果看，认证时间变量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均未进入回归方程，这表明该变量对微信影响力不具备预测作用，假设 4 不成立。

6. 微信公众号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数对 WCI 指数有显著影响。Pearson 相关系数=0.379， $\text{Sig}=0.000<0.01$ ，表示经济发展指数（GDP）与微信影响力指数有显著正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微信影响力越高。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指数”变量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均进入了回归方程，表明该变量可以稳定预测微信影响力（WCI 指数），假设 6 获得验证。这表明高收入水平的公民更有政治参与意愿，对网络政治参与渠道的关注度比较高。处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的民主党派，更应发挥其网络平台功能。

7. 微信公众号发布形式对 WCI 指数有影响。为剔除重大事件对结果的影响，故选取党的十九大

① 表中* $p<0.05$ ，** $p<0.01$ ，*** $p<0.001$ 。

前的数据进行分析。民主党派文本形式的发布数量与 WCI 有显著性负相关，文本形式的发布数量对 WCI 指数具有显著性负向预测作用，Beta 系数为-0.280（P=0.000）。这表明文本形式发布数量越多，WCI 指数值越小，假设 7 获得验证。由此可见，民主党派官微发布形式为文本形式，其影响力效果差，拉低了 WCI 指数；而图文和视频更易吸引用户，获得较高的阅读量和点赞数，从而 WCI 指数就越高。

8. 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内容对 WCI 有影响。由表 6 可知，在党的十九大前的民主党派发文类型中，“社会服务”“政治协商”“自身建设”“联络工作”“党的十九大相关”文章均对 WCI 指数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表明官微发布以上类型文章数量越多，WCI 指数值就越高。党的十九大后，民主党派的发文类型中，仅有“民主监督”进入回归方程，且为负向，这表明发布此类文章数量越多，WCI 指数越低。假设 8 获得验证。

表 6 参政党官微 WCI 指数回归检验结果^①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WCI 指数（19 大前）		WCI 指数（19 大后）	
	Beta	Sig.	Beta	Sig.
控制变量				
认证时间	0.018	0.526	0.017	0.566
所属党派层级	-0.203***	0.000	-0.278***	0.000
经济发展指数	0.106**	0.004	0.097*	0.010
发布形式				
图文形式的发文数量	-0.270	0.305	0.223	0.498
文本形式的发文数量	-0.280***	0.000	-0.088	0.351
视频形式的发文数量	0.034	0.440	-0.005	0.899
发布内容				
内容-参加重要会议及活动	0.062	0.108	0.018	0.628
内容-参政议政	0.166	0.066	0.073	0.335
内容-民主监督	0.021	0.548	-0.083*	0.040
内容-社会服务	0.172*	0.050	-0.130	0.211
内容-政治协商	0.080*	0.019	0.018	0.609
内容-自身建设	0.444**	0.001	0.146	0.094
内容-联络工作	0.079*	0.031	-0.018	0.588
内容-党的十九大相关	0.174**	0.005	0.129	0.560
内容-其他	0.147*	0.018	0.015	0.745
互动功能设定				
自定义菜单	0.051	0.069	0.029	0.318
是否开通留言板	-0.085**	0.003	-0.070*	0.017
F	150.93	0.000	128.52	0.000
R2	0.406		0.375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民主党派的网络功能视角，对民主党派官微在党的十九大这一重大会议前后的网络影响力进行了测量与差异分析，进一步探讨了民主党派网络影响力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程度。通过实证分析，我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发现：

从民主党派的网络政治功能来看，民主党派对党的十九大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积极应对，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做了重点宣传，产生了良好网络效应，此类推文的微信影响力指数较高。民主党派的网络政治功能发挥良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亲密友党关系。从党派层级来看，民

① 表中*p<0.05，**p<0.01，***p<0.001。

主党派的网络政治功能发挥呈递减趋势,党派层级越低,其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网络宣传数量越少,影响力越低。从发文内容来看,参政议政等政治生活内容的微信影响力更高,这既体现出民主党派政治职能的履行情况,也反映了网民对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关注度较高。综上,民主党派运用微信公众平台,积极发挥网络政治功能,吸引了相关网民关注并参与了民主党派的网络政治活动,这也是网络民主的体现。层级低的民主党派组织应加强微信公众平台建设,层级高的民主党派组织应加强对其的指导和帮助,促进各层级民主党派组织更好地发挥网络政治功能。

尽管民主党派的网络政治功能发挥良好,但民主党派的网络社会功能有待全面开发。民主党派的网络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民主党派能够利用网络平台代表社会部分阶层成员的利益,融政党的代表性与社会的服务性、整合性于一体^[8]。数据显示,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的建设时间普遍较晚,虽然大多数民主党派官微都已开通留言功能,然而积极回应、与网民互动的官微较少。这反映出民主党派的官微定位,仅作为宣传手段的输出功能较多,利用网络平台汇聚民意并进行反馈的功能较少,更不用说利用官微进行网络治理。事实上,用户对设立反馈机制的官微更青睐,因此民主党派的官微要重新定位,尤其要开发其社会功能并切实发挥其作用,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同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与维护需加强,尤其要加强网络内容建设^[9]。官微功能设计与内容发布方面不同于传统纸质新闻,不仅要简明扼要地提供信息,还要做到图文并茂,语言风格需尽量轻松活泼,而不是宣传说教。这样更能吸引用户阅读,使广大用户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在发布形式上,官微要多以图文或视频形式发文;微信平台的图文形式在内容选择方面,应多选择与自身用户群体切身利益相关的文章,如“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此外,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政治参与愿望更强烈,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民主党派组织应因地制宜地加强官微的参与、互动等功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 [N]. 人民日报, 2018-03-05 (1).
- [2] 杨爱珍. 民主党派的政党职能和政党功能分析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3): 18-23.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10月18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4] 习近平: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 [EB/OL]. (2019-01-25) [2019-01-29].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125/c64094-30590946.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 [5] 王瑜. 网络舆论时代下民主党派如何履行职能 [J]. 前进论坛, 2014 (10): 36-37.
- [6] 张润锁, 樊金凤. 网络时代下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应具备的素质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11 (2): 22-25.
- [7] 张弓长, 郭晓明, 王新英. 网络民主语境下民主党派政治功能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3): 27-29.
- [8] 肖存良. 民主党派的功能开发与作用发挥: 试析民主党派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 (1): 7-14.
- [9] 吴凡, 张天舒. 网络统战视野下民主党派微信公众号影响力研究——基于优质推文的内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6): 84-90.

责任编辑: 孙德魁

新中国 70 年对外援助理念的发展、继承与创新

屈彩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对外事业来长期推进。在对外援助初期，中国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倡导平等互利、不附加条件等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的理念。但这一时期，中国步入了援助规模过大、脱离中国国情的误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发展、丰富对外援助理念，推动对外援助工作深入发展。21 世纪初，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不忘初心，加大对外援助力度，提出了合作共赢的理念，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紧抓时代发展机遇，共享发展与繁荣。步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总结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等新理念，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同舟共济、和谐繁荣、共赢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70 年来的对外援助实践中，中国不断发展、继承、创新和完善对外援助理念，逐渐形成反映中国对外援助本质、目标、利益、功能、方式、力度等不同层面的援助理念体系。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先进性，体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国际责任感。中国树立了在国际援助舞台的独特地位，成为国际援助体系的一面崭新旗帜。对外援助在增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友谊和信任，推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及周边环境的构建方面发挥着积极效应。

关键词：对外援助；援助理念；八项原则；实事求是；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1-0095-11

一、引 言

对外援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推进的重要外交实践。从 1950 年到 2016 年，中国对外援助总额达到 4 000 多亿元，开展了 5 000 多个援助项目，举办了 11 000 多期培训班，培训了 26 万多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1]。2017 年，中国共援助 128 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新开展 309 个对外援助项目，为受援

DOI: 10.13946/j.cnki.jcquis.2019.01.011

作者简介：屈彩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2017QQYA01）

引用格式：屈彩云. 新中国 70 年对外援助理念的发展、继承与创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1）：95-105

方培训各类人才近 15 万^①。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对外援助历程中，中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援助理念不断发展。在对外援助初期，中国提出了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等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先进理念。但在冷战阴霾笼罩的特殊时代，加之缺乏援助经验，中国经历了援助规模超越本国经济承受能力的深刻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提出了许多新的援助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实现再次创新、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中国历届政府、历届领导人的努力探索、坚定继承、勇于创新下，中国对外援助理念逐渐发展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契合受援国实际需求、适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理念，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独树一帜的新理念。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人物研究的视角，如周恩来、邓小平援外策略及思想；二是基于时代研究的视角，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及理念；三是基于区域研究的视角，如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等。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直接涉及或间接涉及中国某个或部分对外理念，其中对“不附加条件”的原则关注较多，但对该原则的深刻意涵、其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关系等研究仍不够。总的来看，学术界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研究呈碎片化特征，对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提出、发展与演变，中国对外援助的本质、目标、利益、规模、功能等内容仍有待开展更加系统化的研究。在中国积极推进对外援助，努力在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西方国家不时掀起“中国威胁论”“债务陷阱论”等质疑、曲解、抹黑中国的论调，试图混淆视听，破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此，向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清楚阐释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体系尤为必要。

一、对外援助理念的形成确立：“八项原则”（1950—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内百废待兴、贫穷落后，所处国际环境复杂而险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推行遏制战略，构筑围堵、封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浪潮不断高涨。中国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和追求民族解放及民族独立的事业。1956 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强调：“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应该给予积极支持。”^[2]当时中国虽然国力贫弱，但仍克服重重困难，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亚非拉国家伸出援手，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并将此作为长期的外交事业来持续推进。在对外援助的具体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提出了自己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和理念。

1950 年，中国向朝鲜和越南提供物资帮助，开启了对外援助的漫漫历程。在冷战背景下，国际援助领域呈现出美苏激烈竞争态势。不论是美国推行的以“马歇尔计划”为模本的援助模式，还是苏联推行的以“莫洛托夫计划”为雏形的援助模式，都表现出干涉、控制受援方的特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中国强烈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在开展对外援助中，中国推行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模式，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模式。1953 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是中国倡导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国际准则，指引着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1956 年，周恩来总理就对外援助提出三项要求，即帮助受援国建立独立的工业；相互援助而不附加任何经济、政治条件；以技术教给其他国家，使其获得独立，而不是代替^[3]。这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援助基本理念和目标。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初期，明确强调不以援助为筹码来干涉他国内政，真诚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自力更生与独立。随着对外援助的逐步开展，中国对外援助理念日渐清晰。1961 年，周恩来总理在与瑞典驻华大使的会谈中提出了辨别是否真正帮助落后国家还是新殖民主义的“三条分界线”：是否要求特权和控制，是否真正帮助落后国家建立独立的经济，是否真正帮助落后国家建设得快些，并表示应以此为标准进行考察^{[3] 402-403}。1964 年 1 月 15 日，

① 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的统计。

周恩来总理在加纳共和国回答记者提问时首次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表示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4]：一是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是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是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三是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四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五是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六是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其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七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1月21日，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正式写入中国与马里共和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同时，周恩来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再次表示：“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4] 394}“八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明确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立场、本质与目的，反映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

（一）平等互利

中国始终坚持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彼此互相尊重。在开展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本着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而不是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单方面对受援方进行施舍与怜悯。对外援助是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互动的一个过程，也是援助方与受援方双边关系构建的一个过程。平等互利的理念体现了援助主体与客体之间对等、自主、互利的互动。中国本着平等互利的理念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做出国际贡献，并且与受援方构建积极的双边关系。比如中国派遣专家到受援方进行建设时，不允许其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二）不附加条件

中国对外援助充分尊重受援国意愿、诉求和合理关切，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将本国意志强加于受援国，不干涉受援国内政，为受援国带来便利和实惠，促进受援国发展。“不附加条件”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本质，彰显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最鲜明特色，是中国对外援助区别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最根本理念。西方国家对外援助是一种干涉型援助。通过援助，西方国家强加其意志于受援国，干涉受援国内政，扶植亲西方的政权甚至是傀儡政权，导致许多受援国政局混乱、政治不稳；掠夺受援国的资源与能源，导致受援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利益严重受损；传播和输出西方价值观，增加对受援国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控制，影响受援国对世界和他国的认知。相比之下，中国对外援助理念具有世界先进性。

（三）帮助受援方自力更生和经济独立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浪潮的高涨，许多民族国家摆脱殖民者的统治，获得了独立。但是，这些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落后，面临发展的困境和国家存亡的紧迫威胁。获得援助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应对困难、缓和危机的重要凭借和依托。但是发展中国家依靠援助摆脱困境，也面临被援助国控制、严重依赖援助国的风险。有的发展中国家已陷入遭受西方国家干涉、严重依赖西方国家的困境中。帮助受援方应对困难和危机，走向自力更生和真正独立是中国对外援助追求的根本目标。1969年，周恩来总理与几内亚代表会谈时表示：“我们只赞成援助你们建设和发展民族经济。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方向是逐步帮你们达到自力更生。”^{[3] 281}在对外援助实践中，中国不仅通过援建项目帮助受援方增加资金累积，而且在提供技术援助的同时帮助受援方人员掌握相关技术，积极推动受援方走向自立。中国提供的大量物资和贷款援助对阿尔巴尼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有效帮助坦桑尼亚、赞比亚突破了殖民主义的封锁与围堵，成为推动这两个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自由之路。中国为越南提供了长达28年的巨大援助，对支持越南进行反法、反美战争，实现民族独立发挥了不可估量的

作用。中国对外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困难、发展经济、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枷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

（四）充分照顾受援方利益

在对外援助中，中国本着真诚与无私的精神，充分考虑受援方的切身利益。中国不仅向受援方提供本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物资与设备，而且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定价，严格保证援助质量。一方面，中国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向受援方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中国以无息、低息贷款的方式向受援方提供援助。事实上，对很多处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时候难以如期偿还贷款。对此，中国予以充分考虑，从受援方的切实处境出发，采取延长还款期限的灵活方式来减少受援方的后顾之忧，尽量减少受援方的负担。延长还款期限的办法为急需资金援助的受援方提供了便利，使其能够将援助资金快速投入实际需要和建设中。

平等互利、不附加条件、帮助受援方自力更生、照顾受援方利益是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折射出的基本理念。它体现了中国无私慷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深入中华文明精髓的道义感，展现了中国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和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定践行。尤其是“不附加条件”这项原则，清晰而又明确地体现了“援助”这两个字最本真的内涵和追求，将中国对外援助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彻底区别开来。1964 年底，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按照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低息及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今后，我们还将在实际工作中补充和发展这些原则。”^[5]周恩来总理不仅总结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而且指出要不断发展、补充和完善中国对外援助原则和理念。“八项原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开展对外援助提出的基本指导方针和理念，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在发展中国家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随着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浪潮的高涨，中国扩大援助范围，加大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力度，积极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倡导与推行，对中国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信任，提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方面，发展中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在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中，中国对外援助处于弱势。但是“八项原则”的提出和实践，使中国在国际援助体系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援助中赢得主动性提供了重要契机和支撑。中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与亚非拉国家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对中国缓解反美反苏战略下的外交困境和战略压力，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和处境，推动中国对外战略的布局与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八项原则”是指引此后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准则和理念，标志着中国开创了不同于西方干涉型援助、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援助模式。

二、对外援助理念的调整发展：实事求是（1978—2000 年）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进入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与摸索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呈现出新变化，美苏冷战对抗趋缓。中国逐步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围堵，与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的关系逐步缓和。中国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原则，在客观分析和认识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对外援助方面，新中国成立 20 多年以来的援助实践得到了深刻总结与反思。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中国在对外援助的初期实践中出现援助规模过大、承诺任务过重而脱离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内现实、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受能力的问题。这令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动荡、原本脆弱的中国经济不堪重负。为此，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对外援助进行新的考虑和调整，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援助理念。

一方面，中国继续坚守援助的本质，发挥大国责任感，积极推进对外援助。1977 年，邓小平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表示：“我们对朝鲜和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6]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提供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内政的援助模式。虽然在开展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面临一些

批评和质疑声音，但中国仍高度重视对外援助并坚定推进。1979 年，邓小平提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我们还得拿出必要数量的援外资金。……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7]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的重重困境，但仍努力克服困难，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和坚定的意志开展对外援助。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代表团时表示：“我们希望若干年后，在下个世纪不长的时间，作为社会主义的、比较富裕的中国，能够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尽到符合我们自己身份的国际主义。”^[8]不论是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还是将来实现经济富裕的中国，都要坚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是中国欲长期推进的事业，也是中国欲肩负的义不容辞的使命。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本国国情出发开展对外援助，并在继承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援助理念。1978 年，邓小平提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9]中国充分考虑本国国情，明确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对外援助方面形成客观的认识。同时，在援助方式和援助理念方面，中国逐渐调整并不断创新。邓小平指出：“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个八条，具体方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7]1983 年，中国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把其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方针。在继承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探索新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受援方实际需求的援助理念。

（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1983 年，国务院主要领导在接见第六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很穷，但是个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这是我们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指钱，尽力而为是指精神。”^[7]中国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理念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从新中国成立 20 多年以来对外援助的教训来看，中国在对受援方采取有求必应的援助的同时，忽略了本国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从而使原本面临重重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对外援助不仅应符合受援方的实际需要，而且应结合援助国的实际国情。偏离了客观情况、脱离本国经济实力的援助，不仅加重援助国的经济负担，造成资源浪费；也面临难以兑现援助承诺而招致受援方误解的困境，从而影响援助方和受援方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更直接导致援助自身难以得到持续、有效发展。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将援助方客观国情与受援方客观需要紧密结合，才能确保对外援助的可持续性，才能真正发挥对外援助的多功能性。“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是中国对外援助走向理性化和科学化的标志。

（二）讲求实效、形式多样

中国在推进对外援助的初期实践中，援助形式较为单一化，成套项目援助和一般物资援助等硬实力的援助占了很大比重，人力资源培养、技术培训、文化交流等软实力方面的援助较少。其中特别是在成套项目援助方面，中国考虑到受援方人才资金不足、物资缺乏而采取了“交钥匙全包”的方式，付出了大量人力、物资和资金代价。然而从援助的长期效果来看，有的项目援助收效甚微。“交钥匙全包”的援助方式虽然有助于减少受援方负担，推进项目顺利进展和有效生成，但由于没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受援方人民的能动性，对受援方的能力培养和提升作用有限。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比重很大，低息贷款式的有偿援助很少。低息贷款虽然要偿还，但相对于无偿援助更能调动受援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促进受援方发展经济和加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建设。1978 年，邓小平在与尼泊尔首相会谈时表示：“我们总结经验考虑后，有点利息比没有对受援国更好，有利于受援国搞经济核算。”^{[6] 391}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在西方国家的封锁下，中国对一些受援方的实际情况缺乏充分了解，对援助资源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一些援助资源没能发挥更大效益。1979 年，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着眼于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不要让它躺在援助国身上。”^{[6] 532}对之前已建成的援助生产项目，中国以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方式与相关受援方开展合作，在改善受援方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受援方生产水平方面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效。在援助资金方面，中国不断拓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1993

年,中国根据受援国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建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资金”,旨在支持中国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经营领域的合作。1995 年,中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中国不断推进对外援助方式的多样化和灵活化,确保援助真正惠及受援方。

(三) 平等互惠、共同发展

自开展对外援助以来,中国一直本着平等互利的理念积极帮助受援方。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以无偿援助为主,呈现出单边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双向流动的合作缺乏;援助的政治效应和战略效应比较鲜明,而援助的经济效应微乎其微。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对外援助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中国加强与受援方的经济合作,在帮助受援方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发展。冷战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94 年,吴仪提出“大经贸战略”,扩大和拓展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对外援助在实践中贯彻“大经贸战略”,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这一时期,传统的无偿赠予援助比重有所减少,推进国际经济合作的经营性援助比重逐渐增大^[10]。相较于无偿援助,合作性质的援助推进了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互利互惠。中国基于本国国情,一边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走向自立,一边采用多种援助方式加强与受援方的合作,促进双方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国,中国将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视为职责和使命。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面临发展中的重重问题与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接受来自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以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援助与经贸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经济效应,推动双方共同进步。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援助规模有所缩减,援助布局重新调整,加大了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不仅关注对外援助的短期效应,而且更关注对外援助的中期和长期效应。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式更趋灵活化,援助结构突破单边化,援助领域走向多样化,援助模式得到进一步改善,推进了援助的有效化。如中国在援建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圭亚那纺织厂的同时,还以政府奖学金的方式援助对方人员来华留学,为受援方培养管理与技术人才。在加强对受援方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硬实力领域建设的同时,中国加强对受援方教育、医疗、技术、人力资源等软实力领域的建设。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和困境,结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国际局势,不断调整对外援助政策和理念,发挥对外援助的多重功能,以更持续、有效地开展和实施对外援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援助,推进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共同发展,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关系与合作。这一时期,中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不断探索更适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援助模式。

三、对外援助理念的继续发展:合作共赢(2000—2012 年)

21 世纪初,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特征日益鲜明,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化浪潮持续高涨。中国紧抓时代机遇,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进一步加大援助规模,在帮助受援方的同时,积极促进与受援方的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同时,中国加强对外援助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加强学习与借鉴,推进对外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对外援助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2011 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首次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对外援助政策。中国在坚持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援助的目的、本质及效应。

一方面,中国坚持不附加条件的原则,追求援助的本真,并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该理念。2000 年,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应切实减免发展中国家所欠的债务,增加对它们的不附加条件的官方援助。”^[11]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践行并倡导不附加条件的援助,给予发展中国家切实有效的帮助,帮助他们提升自力更生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附加条件是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守的原则。《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再次强调:“决不把提供援助作为干涉他国内政、谋求政治特

权的手段。”^[12]

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本国国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逐渐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特别是 2004 年以来的对外援助规模显著增大。从 2004 年至 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平均年增长率为 29.4%。2009 年，胡锦涛提出：“要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根据我国国力增长逐步扩大援助规模，创新援助方式，提高援助有效性和针对性。”^[13] 中国发展起来了，不忘初心，加大国际贡献的力度，积极实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期望。同时，中国客观认识本国国情，虽然实现了经济崛起，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一些发展困境和挑战。根据我国在 2010 年确定的 2 300 元的新贫困标准，我国仍有许多人口没有脱贫。中国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际竞争力仍需进一步加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但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需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仍是中国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也反映了中国对实事求是原则的遵循。

此外，中国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结合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在继承原有理念的基础上，把对外援助的目标、效应等相关理念作了进一步拓展。

（一）促进受援国的自主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对外援助过程中不仅帮助受援方应对迫在眉睫的困难和短期困境，而且帮助受援方发展产业和经济，实现自力更生和经济独立。这是中国对外援助长期以来追求的根本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自给自足能力，但是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同层面的瓶颈问题，面临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对此，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不仅关注受援方自力更生能力的提高，而且着重增强受援方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11] 109}。中国在对外援助时，加强了技术援助和人力资源援助，尽力为受援方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本国资源，打好发展基础，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12]。同时，中国加强在气候、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2009 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并表示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非洲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13] 267}。这种培养人才、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援助方式，不仅是推动受援国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受援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柱和长期动力。中国通过帮助受援国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加强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社会民生建设，增强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能力。中国除向受援方提供以无偿赠予为主的利他性援助外，还提供以互利互惠为主的合作性援助，加强双方经济合作，帮助受援方走上经济良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合作共赢

21 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援助不仅追求援助方与受援方的互利互惠，而且重视追求多方利益的合作共赢。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进一步推进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然而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加强双边合作，而且需要团结起来，凝聚智慧和力量，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共同利益。2010 年，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将保持优势地位，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正在快速上升，我们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合作和务实合作，形成整体合力，拓展共同利益，共享发展成果。”^{[13] 458} 发展中国家应充分把握时机，加强多领域、多层面、多方位、多平台的合作，追求多重利益的延伸和共赢。中国在对外援助中进一步扩大援助领域，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多重合作，追求共赢。通过合作共赢，中国不仅推进与受援国之间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而且携手受援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化进程，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提升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建立更加紧密的新型伙伴关系。通过对外援助，中国不仅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自立和自主发展的道路，而且携手广大发展中国家

共同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共享发展与繁荣。合作共赢理念不仅仅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互赢,更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追求多方利益的共赢,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追求的多重效应。

中国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丰富、发展对外援助理念,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高质量、高效率、广范围、大规模援助,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繁荣,实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和谐共生。中国本着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加强对外援助交流,发挥对外援助的效应和功能,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倡导和谐世界,为中国持续崛起构建良好的周边与国际环境。

四、对外援助理念的创新丰富:命运共同体(2012 年至今)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既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期待,也要面临西方发达国家遏制和围堵的严峻环境。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对外援助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对外援助理念发展创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公共产品”等新理念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大国风范,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事业,助推发展中国家发展,为中国发展创造了良好周边与国际环境。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当今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逐渐形成彼此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置身其外或独善其身。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多个场合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中国愿与东盟、非洲、拉美、中亚、太平洋岛国等构建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从“双边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的不同视角全面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提出以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以共建共享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以合作共赢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以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以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14],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路线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新思维,指导着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深刻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15]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与共,始终积极支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在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权益。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利益,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风范,推进对外援助,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外援助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中国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困境的积极应对。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议通过了“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11 月 2 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第七十二届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在世界秩序急剧变化的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不断传播。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作为一种关于世界秩序或国际格局构建的理想,还是呈现为一种社会建构性力量的潜在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理由成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战略与外交策略的核心理念基础^[16]。

(二) 正确义利观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出访非洲时首次提出的。他指出:“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17]此后,他在多个场合进一步阐述“正确义利观”,积极向国际社会倡导“正确义利观”。2014 年,他在韩国首尔大学演讲中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18]。他再次深刻阐释“正确义利观”的辩证内涵,将提倡“正确义利观”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和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守与发展中国家的情谊、积极发扬国际道义,充分照顾受援方的利益与关切,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正确义利观”正是对中国对外援助优良

传统的高度总结,也是中国对外援助长远发展的基本指导。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9],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援助应坚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指导。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14] 444}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表示:“中国将继续秉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原则,同各国一起为实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作出努力。”^[2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基本理念和传统,积极开展对外援助。

“正确义利观”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义利观和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处理援助方与受援方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开创了新的思路和指导,是体现中国外交风格、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核心价值观。它既注重国际正义的建构与维护、国际道义的倡导与追求,又主张维护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并致力于推动各国和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奠定了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和全球伦理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石^[21]。

(三) 真实亲诚

2013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待非洲朋友,我们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我们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我们讲一个‘诚’字。”^{[19] 306-308}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时表示:“我们愿同各岛国一道努力,求友谊之真,务合作之实,结共赢之果,共圆发展繁荣和谐之梦。”^[22] 中国本着“真实亲诚”理念,与太平洋岛国建立真诚、相互尊重的朋友、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23] “真实亲诚”是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在对外援助中始终贯彻这一理念。

1. 坚持“真”的理念。中国本着相互尊重与平等原则,真诚对待发展中国家,坚持向对方提供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不论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在摸索前进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尽最大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进一步增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与规模。特别是在西方国家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而不断减少国际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增大援助规模无疑是对发展中国家最真诚的情义。中国正积极履行援助承诺,不断加快落实援助措施。

2. 坚持“实”的理念。中国在对外援助中非常重视“实”,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如在援助非洲方面,中国一方面加大援助规模,加强对非洲发展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提出中非合作十大计划、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加强与非洲的合作,构建紧密的经济纽带,拉动非洲经济不断发展。在援助南太平洋岛国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与建交的 8 个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强调,中国主动向太平洋岛国开放市场,扩大对岛国的投资,增加从岛国的进口规模;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岛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帮助受援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土资源,改善受援国人民的生活环境;积极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人才、发展技术力量,增强受援国人才建设与技术创新,帮助受援国加强硬实力和软实力双重建设,提高自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3. 坚持“亲”的理念。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彼此在反殖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有并肩战斗的历史记忆;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困境;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等各种全球问题的挑战和威胁;在推动经济增长,应对全球问题,追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政治秩序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不论是历史上曾经历的共同遭遇,还是现实中面临的共同困境与追求的共同利益,都在无形中拉近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距离,增进彼此的亲近感和认同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面临危机、陷入困境时,中国总会积极、及时地伸出援手,向对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对方渡过难关,解对方燃眉之急。中国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灾害、危机和困难,不断调整援助方式,持续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走出危机和困境。

4. 坚持“诚”的理念。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与受援国坦诚相待,加强对受援方的了解和认知,提供对

方所需要的、急需的援助。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认知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坦诚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和情况,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的原则妥善解决问题,摆脱困难,推进对外援助更好、更有效地惠及受援方人民。针对部分最不发达国家、背负重债的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国家等无法按时偿还到期的政府间无息贷款,中国根据具体情况多次进行债务减免。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再次宣布对部分非洲国家无法偿还 2019 年到期的政府间无息贷款进行了债务免除。

(四) 公共产品

对外援助具有公共产品特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搭建共享平台,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贡献中国发展经验、成果和机遇,提供公共产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会议上表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实现共同发展。”^{[19] 525-526}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方案。在开展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不仅向受援国提供资金、技术、人员支持,而且向受援国提供中国减贫经验和方案等公共产品,推进受援国减贫事业的有效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助于克服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固有缺陷,而且有助于应对反全球化的新挑战,是中国向亚洲乃至世界提供的一项制度性公共产品^[24]。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意愿和决心。2018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共 172 家参与了此次博览会,境内和境外 40 多万名采购商参会并进行洽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国际贸易史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览会。这不仅是中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对外经贸合作的标识,而且是中国为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创举。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搭建的推进世界各国及地区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平台。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公共产品”等是反映中国现实、时代特征与世界潮流的新理念,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助模式与援助体系的新理念。这些新理念不仅是对中国对外援助优良传统与战略思想的继承、发展,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五、结 语

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反映中国对外援助的本质、目标、利益观、功能、方式、力度等不同层面的丰富理念体系。在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理念不断发展、创新和完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性与世界先进性,成为矗立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一面崭新旗帜。尤其是“不附加条件”的援助理念是中国对外援助最显著的标签。虽然在援助的实际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受援国由于缺乏相关约束而不能有效运用援助资源、甚至腐败现象等问题的挑战,但并不能因此而采取附加条件、背离援助初衷与本质的干涉型援助。况且,即便是西方干涉型援助模式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些问题。这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援助管理政策、制度和机制,尤其要建立前期调研评估、中期运作评估与后期效应评估等机制,促进援助效应的充分发挥。

在这些援助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有效地推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大力推动了南南合作的进程,增强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和关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开创了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新局面,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姿态,展现了中国勇于担负大国责任的风范,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南南援助与合作的典范。在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摩擦,拉动日澳印等国推进印太战略,并从经济、政治、安全等多维度阻遏中国崛起的境况下,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周边与国际环境挑战。这需要中国进一步增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增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与感情,构建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筑的围堵圈,打破中国崛起的困境,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良好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

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开展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同发展中国家结成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是我国一项重要外交战略,我们要积极推动和巧妙运用^[25]。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仍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努力奋斗的目标。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文章中呼吁:“要照顾发展中国家关切,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26]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加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合作,积极推进对外援助事业。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构建中国特色援助体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共建平等、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杜尚泽,吴刚.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2017-01-18 (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18.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76.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88-389.
- [5]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N]. 人民日报,1964-12-31 (1).
- [6]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17.
- [7] 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0.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34.
- [9]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2.
- [10] 肖佳灵,唐贤兴.大国外交:理论 决策 挑战(下册) [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50.
- [11]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0.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 年 4 月)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
- [13] 胡锦涛文选: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2.
-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7:541-544.
- [15] 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 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N]. 人民日报,2015-10-17 (2).
- [16] 郇庆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重要层面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12): 13-20.
- [17] 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 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N]. 人民日报,2013-09-10 (7).
- [18] 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2014 年 7 月 4 日,首尔) [N]. 人民日报,2014-07-05 (2).
- [1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99.
- [20] 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纽约) [N]. 人民日报,2015-09-27 (2).
- [21] 王泽应.正确义利观的深刻内涵、价值功能与战略意义 [J]. 求索,2014 (11): 25-30.
- [22] 杜尚泽,颜欢.习近平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 构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 共圆发展繁荣和谐之梦 [N]. 人民日报,2014-11-23 (1).
- [2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0.
- [24] 李向阳.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缺位”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 [J]. 中国社会科学,2018 (8): 33-43.
- [25]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14.
- [26] 习近平在阿根廷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 [N]. 人民日报,2018-11-29 (1).

责任编辑:孙德魁

非政府论坛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论析

——以世界华商大会为例

林逢春

(广东工业大学 应用数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 世界华商大会等涉及侨务的非政府论坛为中国提供了与华侨华人及其住在国进行信息与思想沟通的平台, 有助于推进中外经济合作共赢, 提高华侨华人对祖国形象的认知程度, 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但是, 当前世界华商大会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受到华商民族文化认同走低、西方“锐实力”的舆论围攻、民粹主义与贸易摩擦等因素制约。中国应增强非政府论坛的侨务公共外交效果, 树立大数据管理理念实现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信息互联互通, 以合作共赢理念来推动中国与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企业的共荣发展, 推动“双创”政策理念融入非政府论坛的议程与项目推介。

关键词: 非政府论坛; 侨务公共外交; 世界华商大会; 海外华商

中图分类号: D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19) 01-0106-07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侨办”)提出的侨务公共外交一直是“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的重点, 也是当前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历来重视利用多种平台来拓展侨务公共外交。近些年, 有关侨务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持续升温。许多学者在探讨侨务公共外交理论基础、运作机理、对象及前景的同时, 注重从以色列等侨务资源大国汲取可资借鉴的经验, 尤其是立足中国(侨乡)、参政党及海外侨务资源探寻因应的实践策略。在相关策略分析中, 个别学者已经意识到世界华商大会在侨务公共外交中的作用, 将华商视作“一带一路”下侨务公共外交实践的理想目标群体^[2]。事实上, 早已有一些学者立足世界华商大会的发展脉络, 关切中国借由该平台所集聚的海外华商为民族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 重点强调该盛会在

DOI: 10.13946/j.cnki.jcqi.2019.01.012

作者简介: 林逢春, 广东工业大学应用数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经济师, 博士。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侨务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研究——以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广东)夏令营为例”(GD15YHQ01), 广东工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省级立项“海外华商在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参与效果及对策研究”(GG201711845248)

引用格式: 林逢春. 非政府论坛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论析——以世界华商大会为例[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1): 106-112.

展示华商形象、弘扬中华文化及推动中国、华商居住国与大会东道国经济合作的意义，并将世界华商大会等非政府论坛视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总体上看，学界对世界华商大会与侨务公共外交给予了持续关注，相关成果也提出了世界华商大会在侨务公共外交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但对世界华商大会等非政府论坛与侨务公共外交的内在联系，非政府论坛推进侨务公共外交的作用机理等问题的研究还较不足。

一、侨务公共外交与非政府论坛的内在关联

随着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及新时代中国对国家利益的全方位诉求，中国在大幅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同时，也受到个别西方国家的猜忌。当前，“中国威胁论”加剧了中国崛起的结构性压力。据此，中国急需借助公共外交来实现战略突围。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模式，侨务公共外交是中国借助侨务渠道来开展的公共外交。它涉及三个不同而又紧密相连的行为体——中国（施动方）、海外华侨华人（媒介）及其住在国公众（受动方）^[3]。中国试图有效调动华侨华人目标群体的认同力量，借由该群体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途径在其住在国民众间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以此实现侨务公共外交的预期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活跃在各行业领域的海外华人精英更接近高质信源、更具活跃度和具有更高的公共事务参与度，而且其言论在当地华人社会乃至主流社会公众舆论中具有较强公信力，能够在多级传播中产生重大反响^[4]。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将海外华人精英视为侨务公共外交的中坚力量，通过授意或委托民间团体借由论坛、学术会议、圆桌会议、考察访问等方式来联动海外华侨华人精英，借以发挥该群体在其住在国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中的沟通桥梁作用。其中涉侨论坛，尤其是各国华人精英所参与的非政府论坛，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非政府论坛通常是在某一个（些）非政府组织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立足自身宗旨而发起动议，号召相关跨国非政府组织围绕某一中心议题共同以会议形式进行对话的平台，是相关机构宣示政策理念、展开公开讨论、实现信息共享、凝聚共识，及推进各行为体或成员间交流合作的管道。一般而言，随着参与方与相关议题的扩展，这种公开讨论和意见表达的沟通方式将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并凭借某种集体观念与合作行为而易于达成预期目标^[5]。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社会，非政府论坛通常借助发达的媒体宣扬各方发展诉求和共同愿景，增进公众对东道国和参与国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近些年，中国重视借助世界华商大会、（博鳌亚洲论坛）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世界华商国际投资论坛、全球华商组织高峰会议和世界华侨华人企业家南沙自贸区圆桌会等非政府论坛来联动华侨华人精英，通过领导主旨讲话、专题研讨会、发行出版物、文艺汇演、科技项目路演和座谈等形式来发挥华侨华人在当地华人社会乃至主流社会中的作用，在其住在国民众间传递中国国家正面形象，借以提高中国产业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世界华商大会是华裔商人之间实现商业信息互享和文化联谊的世界性论坛。它关切各阶段华人经济重大问题，将经济交流、学术文化活动有机统筹运作，是以交流讨论为主要手段，以会议为主要平台，以振兴华人经济及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沟通纽带的一系列持续性活动^[6]。

其一，世界华商大会由华人精英群体发起和组织，主要以会议的形式为华商、各国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要等多元主体提供交流合作平台。面对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海外华商重视利用中华文化纽带构建以经济利益为向导的民间经济合作关系。对此，华商有识之士希望建立一个族群经济网络来推动华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199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泰国中华总商会等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召开“世界华商大会”，并于新加坡举办了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尔后，在各国中华总商会的推动下，世界华商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每届盛会都得到了来自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众多华商（组织）的积极参与^[8]。同时，东道国的中华总商会也会邀请当地政府、工商界和学者列席并通过主题演讲与考察活动来实现多元主体的信息共享^[9]。在过往的14届大会中，华商与

各国政要、专家学者形成平行关系，主要借由会议研讨来增进自身与各国工商界精英的经济交流与合作。

其二，世界华商大会以共同议题为导向，通过商业信息交流与文化联谊，谋求华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自成立之日起，世界华商大会便以“在商言商 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以各阶段华商共同的经济文化需求“框架化”各届论坛的主题议程，进而在华商网络内部谋求市场信息共享与民族文化交流。一方面，历届世界华商大会先后围绕“知识经济”“科技创新”“一带一路”“东盟区域一体化”与“海洋合作发展”等热点议题^[10]，并借助会上华商、专家学者等权威人士的信息与知识，在把握华商经济转型发展的行动方案的同时，拓展社会资本，实现东道国、华商及其住在国的共赢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华商大会以民族文化为沟通纽带，关切华商的文化权益，主要借助主题议程探讨华人企业精神、海外华文教育的振兴等重要议题，辅以文艺汇演和文化产业参观等形式，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持华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养料。

可见，作为华商商人的世界性论坛，世界华商大会既是华商网络信息互动、文化沟通及经贸合作的加速器，也是参与国政府借助华商网络来提高国家品牌的重要平台^[11]。对中国而言，世界华商大会有效架起中国、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政府与企业等多元主体进行信息与思想沟通的桥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良好载体。因此，中国将世界华商大会视为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先后在南京和成都举办了第六届和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此外，全国工商联、贸易促进会等组织精心组织或积极参与历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系列活动，适时组织内地知名企业代表团参加盛会，希望借此加强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互动，发挥这些跨国华人精英在推动中外经济与人文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二、非政府论坛的侨务公共外交功能

（一）推进中外经济的共赢合作

围绕“在商言商”的大会宗旨，世界华商大会下设各种主题论坛、洽谈会，汇集各国政要、商务精英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相关议题展开研讨与对话，或者安排政府精英与（新兴）产业领军人物作经济科技形势与企业战略管理的专题演讲。相关安排加深了各国华商的交流，使华商更加明确了新时期本行业发展趋势与因应策略，并能寻获合适的投资机会、融资渠道与合作伙伴。尤其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华商从历届大会上中国政要、企业家代表的政策宣传和信息分享，获知了中国的发展战略、政策规划与商机，为寻求合作共赢的路径提供了便利。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世界华商大会上多元行为体的信息共享与技术交流将给华商带来预期收益和抗风险能力，使该群体意识到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加强与中国和住在国各界的信息沟通是其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和源头^[12]。印尼中华总商会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华安表示，广大华商不仅要寻找在中国发展的机遇，还要在交流中发现全球商机，因为这对华商自身发展而言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优势^[13]。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给海外华商带来的辐射源效应，中国政府官员、智库专家和商界精英在世界华商大会上所作的有关“一带一路”宣讲动员，更易使海外华商发现与中国合作的利益连接点。在第十三届大会上，中国侨联副主席许荣茂号召海外华商把握历史机遇，扮演“中国经济与世界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14]。浙江大学周谷平和陈建教授等基于该校在海上丝路指数等项目研究方面的成果，为广大华商阐释了“一带一路”下华商创新发展的路径^[15]。对此，世界华商联合总会主席韩健光表示：“世界华商大会成功举办，这是全球华商交往中的一件盛事，为全球华侨华人提供了加强沟通交流、促进经贸合作的宝贵平台，在推动中国及华商所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华侨华人国际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

（二）增进海外华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积极认知

在历届世界华商大会上，中国综合利用专题论坛、研讨会、展览及商务考察等环节来提高海外

华商的“中国认识”，妙用致辞、贺信、座谈、宴会及捐赠等公共关系方式来展示亲和力和感召力。一方面，中国政府高层的政策决心和企业家、学者们的政策诠释与项目推介，以及会议组织的各种展览会与商务考察活动，有助于全球华商及时了解中国营商环境、新兴产业状况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中国政企在大会期间对海外华商的公关社交活动，增进了海外华商与中国各界的情感联系，有助于海外华商对中国树立起正面的国家形象认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广大华侨华人功不可没”，“华侨华人发挥在资金、技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有力推动了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17]。在广大华商看来，国家领导人对海外华商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所扮演角色的褒扬，尤其是与华商的合影、握手慰问，是一种释放情感礼遇与“合作共赢”的信号，是海外华商获取象征性资本的重要标志。国家领导人对海外华商的亲善与优待，以及表达的中国与海外华商合作共赢的政策取向，赋予了该群体一种想象中地位的提升^[18]。广大海外华商对中国树立起一种积极的国家形象认知。此外，主题演讲和实地考察是中国借助大会展示儒商形象及国家真实图景的绝佳机会。如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期间，主办方安排海外华商对坐落在郫县的中国软件空间技术产业园等项目进行实地考察。通过考察，这些海外华商精英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器，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长期发展的实力^[19]。在第十四届大会上，缅甸中国企业商会中国侨商联合会企业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和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员企业广东恒兴集团分别向缅甸政府捐赠2 000万缅币^[20]。中国政府的政策号召与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活动，增进了中方企业与海外华商企业之间的信任，在海外传递了中国国家正面形象。

（三）加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秉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宗旨，世界华商大会自首届以来便十分重视象征华商身份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展示与传播。主办方注重从建筑文化与行为文化两个层面去传递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借由主题论坛、文艺汇演和艺术展览等形式来增进华商的民族文化情感。这成为世界华商大会期间，华人社团自发性组织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庆典活动来拉近东道国民众与广大华商间心理距离的典型做法。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筹委会特别在闭幕式增设中秋大联欢活动，让海外华商重温“思亲团圆”的文化符号，强化自身的祖籍记忆^[21]。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运用三千年古蜀遗迹“太阳神鸟”、蜀绣“芙蓉锦鲤”，辅以翠竹和熊猫等符号以及川剧变脸等文艺表演来展现中国作为中华文化母国的气派^[22]。会务组还设计了“大熊猫之旅”和“礼佛之旅”等8条主题观光路线供华商进行实地考察，提高该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对华亲近感^[23]。作为华人民族文化赓续的直接载体，华语在构建、传扬中华文化话语体系时成为维持、巩固跨文化传播体系的主体^[24]。现实中，海外华商普遍将海外华文教育传承视作民族文化兴盛的象征及华裔商人文化资本的标志。在历届世界华商大会上，与会华商都会立足海外华文发展现状，以专题论坛的形式探寻在海外传扬中华文化的良策。比如，在第十四届大会上，民晋集团董事长郭杰与广大华商探讨了“一带一路”下文化影视、中华文化遗产和华文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机遇及推进民心相通的因应路径^[25]。伴随“一带一路”的全面实施，来自中国高校、智库的专家学者成为与海外华商文化互动及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如在第十四届大会期间，浙江大学代表团和校友企业家代表团拜访了缅甸浙江商会及当地华商企业，相关人员围绕教育技术服务、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展开了交流与合作^[26]；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从文化视角提出了中国与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实现共赢合作的对策建议^[27]。

三、非政府论坛彰显侨务公共外交功能的限制因素及对策

（一）限制因素

1. 海外华商新生代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偏低，更注重利益的理性选择。作为当前海外华人

社会的主体力量,华商新生代的民族文化认同远不如老一辈华侨华人。随着“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海外华商极为关切在与中国“丝路”项目合作的市场前景及利益分配机制,并防范中国出口产品对其企业经营产生的挤兑效应^[28]。换言之,海外华商以个人利益为优先项来考虑自身与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互动程度,而非单纯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是中国与海外华商良好互动的“共有知识”和情感纽带。如果世界华商大会所召集的海外华商新生代的民族文化认同总体走低,那么中国借助世界华商大会推进公共外交的成效必将大打折扣。

2. 中国与海外华商的跨国往来受到西方“锐实力”的舆论围攻。中国在世界华商大会等国际性华人论坛上对海外华商所作的动员,如类似“建设侨乡”等宣传方式时常引起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商政治认同的猜忌。譬如,新加坡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曾在各种国际场合批评中国对属于当地国籍的华商所作的政策动员。随着近些年中国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国家政府与智库热炒所谓的“锐实力”,指责中国试图借助侨务工作等手段对他国的政界、媒体和学界进行政治渗透和舆论分化的行径^[29]。如《纽约时报》就污蔑中国利用“侨务服务”“海外联谊”等形式渗透新加坡的华人群体,阻碍当地华人国家认同的构建^[30]。这种子虚乌有的非议在西方国家一直大有市场。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摘中国政府涉嫌利用当地华商以政治献金的方式“渗透澳机构和培植政治人物”,并且干预当地学术自由^[31]。可见,一些国家对海外华商与中国的跨国互动仍抱有警惕心理,且在西方舆论的操弄下,发酵成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这对中国借助海外华商推进公共外交形成一定掣肘。

3. 部分海外华商经受经济民粹主义和“贸易战”的两面夹击。近些年,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不断,中国的出口产品在西方国家不断遭遇当地经济民粹主义的打压。这对那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和跨境电商的华商经济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一方面,海外华商借助中国相对发达的跨境电商合作和物流技术,在欧美国家市场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并在同行中具有价格优势。这对后经济危机时代欧美国家同类中小企业产生较大冲击,给当地中下层劳工带来了就业难题,从而引起了当地民粹主义的反弹。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采取的“高压”措施,客观上给“一带一路”贸易畅通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不管是欧盟发起的“反倾销”,还是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都对中国企业出口造成极大障碍,也给那些穿梭于中外经贸市场的海外华商带来巨大的挑战^[32]。这也将削弱华商支持侨务公共外交的能力。

(二) 对策思考

1. 在“大侨务”观统领下借大数据技术来实现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信息互通互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借助大数据的技术手段,了解海外华商新生代的经济文化需求,借助服务号和公众号为他们设计和推送有关国学、中国商务文化和跨文化沟通等知识技能,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大侨务”观统领下,推动国内外涉侨智库、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资源积极参加各类非政府论坛,综合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论坛上为海外华商新生代提供国际企业战略管理与行业形势分析等信息服务,使华商及时了解全球经济走向和中国最新发展动态。在此基础上,建立海外华商(组织)信息库,与本国“一带一路”产业分析形成数据匹配,并从物流、区域产业和风险评估等方面来提高对沿线国家华商的信息服务质量^[33]。

2. 以“合作共赢”理念来推动中国与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企业的共荣发展。基于海外华商的政策环境和族群关系,中国在世界华商大会等非政府论坛上要避免使用“乡亲”和“爱国”等词汇;在公开场合及相关文化联谊等互访过程中,应秉持“合作共赢”的话语来纾解海外华商在交往进程中的身份困境,在非政府论坛举办期间适当增设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增进与海外华商的社会交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携手海外华商推进“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和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理顺各种合作项目对接和收益分配机制,通过加强有关项目的普惠性宣传,改善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

3. 推动“双创”政策理念融入非政府论坛的议程与项目推介。凭借发达的新媒体和物联网技术,中国应积极推动“双创”理念融入非政府论坛议程,透过专题论坛、主题演讲和沙龙等形式,提高海外华商对我国“万侨创新”行动的政策认知。我国各地侨办应组织海外华商到创业园区进行实地考察和项目合作,使海外华商更立体地把握中国的创新创业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鼓励海外华商以共建实验室、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来参与中国各地的创新创业项目,并将合作成果及时推广到其住在国。凭借自身先进新媒体、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带动华商及其住在国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及附加值,从而在华商住在国树立起中国国家正面形象。

四、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论断,推动我国对外工作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基于华侨华人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中国各级政府深入推进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的侨务工作,更加广泛地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服务海外统一战线和国家对外开放工作大局。对此,中国政府明确将“侨务公共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大侨务”观的统领下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来推进侨务公共外交,助益大国成长。聚合海外华商、涉侨智库与专家学者等多元主体、保持信息与思想沟通的非政府论坛,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有力载体与重要媒介。考虑到西方国家发起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贸易争端、经济民粹主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侨务公共外交造成的掣肘,中国必须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诸多非政府论坛上回应海外华商及其住在国民众的利益关切乃至全球治理问题;借助本国较发达的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媒体与物联网技术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与公共产品,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 [1] 何亚非: 侨务公共外交是“十三五”侨务重头工作 [EB/OL]. (2015-11-13) [2019-01-01]. <http://www.chinaqw.com/sqjg/2015/11-13/70446.shtml>.
- [2] 谢婷婷. 侨务公共外交在海丝建设中的实践策略——以华商为例 [J]. 太平洋学报, 2017 (11): 38-45.
- [3] 刘宏.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 政策机制、实证分析、全球比较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42.
- [4] 胡百精. 公共关系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58-265.
- [5] 卡伦·明斯特. 国际关系精要 [M]. 潘忠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78-182.
- [6] 刘丙婷. 论坛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超越 NGO 的视角 [J]. 理论与现代化, 2007 (5): 28-32.
- [7] 廖小健, 刘权, 温北炎, 等. 全球化时代的华人经济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96.
- [8] 陈永胜. 世界华商大会初探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6 (1): 67-72.
- [9] 周聿峨, 李亚. 世界华商大会: 连接世界的网络 [J]. 公共外交季刊, 2012 (4): 29-33.
- [10] 第 13 届华商大会在印尼举行 共谋华商新发展 [EB/OL]. (2015-09-28) [2019-01-01]. http://phtv.ifeng.com/a/20150928/41483188_0.shtml.
- [11] 李丹. 超民族国家经济网络的运营——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7 (3): 17-24.
- [12] 刘少杰. 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37-340.

- [13] 廉丹.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成都发现“中国机遇”[EB/OL]. (2013-09-25) [2019-01-02]. <http://news.hexun.com/2013-09-25/158304889.html>.
- [14] 许荣茂太平绅士出席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EB/OL]. (2015-10-08) [2019-01-09]. http://house.chinadaily.com.cn/2015-10/08/content_22133435.htm.
- [15] 浙江大学应邀参加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EB/OL]. (2015-9-29) [2019-01-10]. <http://www.cawd.zju.edu.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17&id=4022&m=content>.
- [16] 第十三届世界华商大会印尼巴厘岛举行[EB/OL]. (2015-09-30) [2019-01-10]. <http://www.sj-hs.com/hsnews/20150930687.html>.
- [17] 习近平致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的贺信[EB/OL]. (2015-09-25) [2019-01-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25/c_117506805.htm.
- [18] 刘文正. 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关系中的穿梭者：华商的跨国角色与作用[J]. 南洋问题研究, 2018(2): 85-96.
- [19] 王晋, 廉丹, 牛瑾, 刘畅.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闭幕之际——携手再创“中国奇迹”[EB/OL]. (2013-09-27) [2019-01-14].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9/27/29953214_0.shtml.
- [20] 第十四届华商大会圆满闭幕 各国华商代表依依惜别[EB/OL]. (2017-09-17) [2019-01-17]. <https://www.mmcpmedia.com/local/24285-2017-09-17-17-24-00>.
- [21] 顾时宏. 印尼中华总商会举办第 13 届世界华商大会推介会[EB/OL]. (2015-05-06) [2019-01-17]. <http://roll.sohu.com/20150506/n412527564.shtml>.
- [22] 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J]. 国际公关, 2014(4): 68-69.
- [23] 中国发展 华商机遇——第十二届世界华商大会 9 月 24 日将在成都举行[EB/OL]. (2013-06-24) [2019-01-18]. <http://www.cnena.com/news/bencandy-htm-fid-54-id-45843.html>.
- [24] 孙英春. 跨文化传播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9.
- [25] 民晋集团董事长郭杰受邀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华商大会[EB/OL]. (2017-09-23) [2019-01-18]. <http://www.minjingroup.com/html/news/2017-9-23/569.html>.
- [26] 罗卫东副校长率团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华商大会[EB/OL]. (2017-09-18) [2019-01-18], <http://www.zju.edu.cn/2017/0918/c502a639667/page.htm>.
- [27] 2 200 多家商界代表参加世界华商大会, 唯一一家中国智库受邀主讲“一带一路”[EB/OL]. (2017-09-17) [2019-01-18]. http://news.ifeng.com/a/20170917/52030885_0.shtml.
- [28] 饶兆斌. 经济高于地缘政治: 马来西亚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观点[J]. 南洋问题研究, 2016(4): 53-66.
- [29] 赵可金.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 新在哪?[EB/OL]. (2018-02-02) [2019-01-18]. <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8/0202/c345437-31252294.html>.
- [30] 中国侨务工作被美媒炒作成“渗透” 新加坡人打脸[EB/OL]. (2018-08-08) [2019-01-18]. <https://new.qq.com/omn/20180808/20180808A0T9W0.html>.
- [31] 分析 | 这个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为何比美日还凶?[EB/OL]. (2017-06-10) [2019-01-18]. https://www.sohu.com/a/147628173_774205.
- [32] 文峰, 赵健. 欧洲华商与中欧经济关系发展: 角色、挑战与应对[J]. 亚太经济, 2018(4): 12-16+25+149.
- [33] “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创新工程暨全球智慧供应链公共平台建设[EB/OL]. (2018-01-15) [2019-01-18]. http://www.sohu.com/a/216657464_532369.

责任编辑: 孙德魁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 卷(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 55(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 52(6): 6-12 [24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1>.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a.org/IV/if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19年第1期 总第13期 第3卷

双月刊 2019年1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何晓栋

执行主编：汪守军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15.00 元